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 卷二 /

天主教史



穆啟蒙 / 編著
Joseph Motte, S.J.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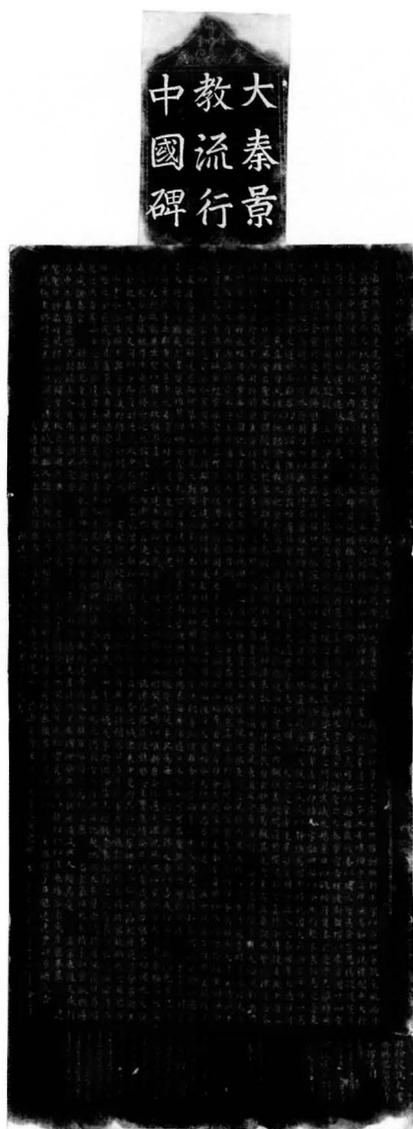
侯景文 / 譯





▲亞味農教宗行宮

克勉五世（Clement V, 1305-1314）在位時，由於當時的義大利情勢混亂，而教宗又有事需和法王面談，因此便在其出生地亞味農的道明會修院中建了行宮。不尋常的是，教宗在義大利境外久居不歸，有七位教宗相繼在亞味農居住了七十年之久，以致於教廷陷入無政府狀態，使得要求整頓教會的呼聲四起。（參閱第十章）



◀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景教」約於唐太宗貞觀年間傳入中國，但在唐武宗時消失無蹤，是基督宗教在中土流傳的開端。碑文約一千七百字，作者以佛教及道教的術語說明了基督宗教的教義，該碑現藏於西安碑林博物館。（參閱第六章）



▲ 哥德式建築代表作——沙特大教堂內部

高聳的教堂屋頂，彷彿擺脫了地心引力的束縛。尖拱、飛扶壁、四葉飾和玫瑰花窗，哥德式建築就像是經過數學精密運算的成果；空間和光影的交錯，讓人不得不對「上帝的屋子」肅然起敬。（參閱第九章）

★ 首頁圖說：羅馬式建築

羅馬式建築幾乎都是由教會所興建，以單純簡潔的造型，散發出樸實無華的古典氣質，給人一種厚實穩重的感覺，圖為德國 Maria Laach 本篤會修道院。（參閱第九章）

天主敎史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 卷二 /

穆啟蒙 Joseph Motte, S.J. / 編著
侯景文 / 譯

 光啟文化事業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Vol. II

By Joseph Motte, S.J.

Translated by Joseph Tarc Hou, S.J.

Chinese Copyright © 1965, 2015 by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Taipei,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目錄

第二期：中古世紀教會

概觀	0
1	3
第五章 蠻族入侵時的教會	
壹 蠻族入侵	0
貳 蠻族的歸化	1
參 教會對文化的影響	7
肆 教宗	0
4	3
6	6
第六章 教宗與西方新帝國加洛林王朝（七二四至八一四）	
壹 教宗與加洛林王朝	0
5	3
貳 聶斯托里異端的傳播	0
6	1

第七章 封建時期教會的衰頹與改革（九至十一世紀）

壹 教會與封建制度.....	0
貳 教會的改革運動.....	6
參 教會向北歐及東歐發展.....	7
參 教會向北歐及東歐發展.....	4
參 教會向北歐及東歐發展.....	0
參 教會向北歐及東歐發展.....	8
參 教會向北歐及東歐發展.....	2
第八章 六至十一世紀的東方教會	

概觀.....	0
---------	---

壹 查士丁尼時的東方教會.....	0
-------------------	---

貳 穆罕默德與伊斯蘭教.....	9
------------------	---

參 對敬禮聖像的爭執.....	0
-----------------	---

肆 東方的大分裂.....	4
---------------	---

第九章 中古文化的全盛時代

概觀.....	1
---------	---

壹 基督宗教信仰的一致.....	1
------------------	---

貳 教會.....	1
-----------	---

參 教會與政權.....	2
--------------	---

參 教會與政權.....	3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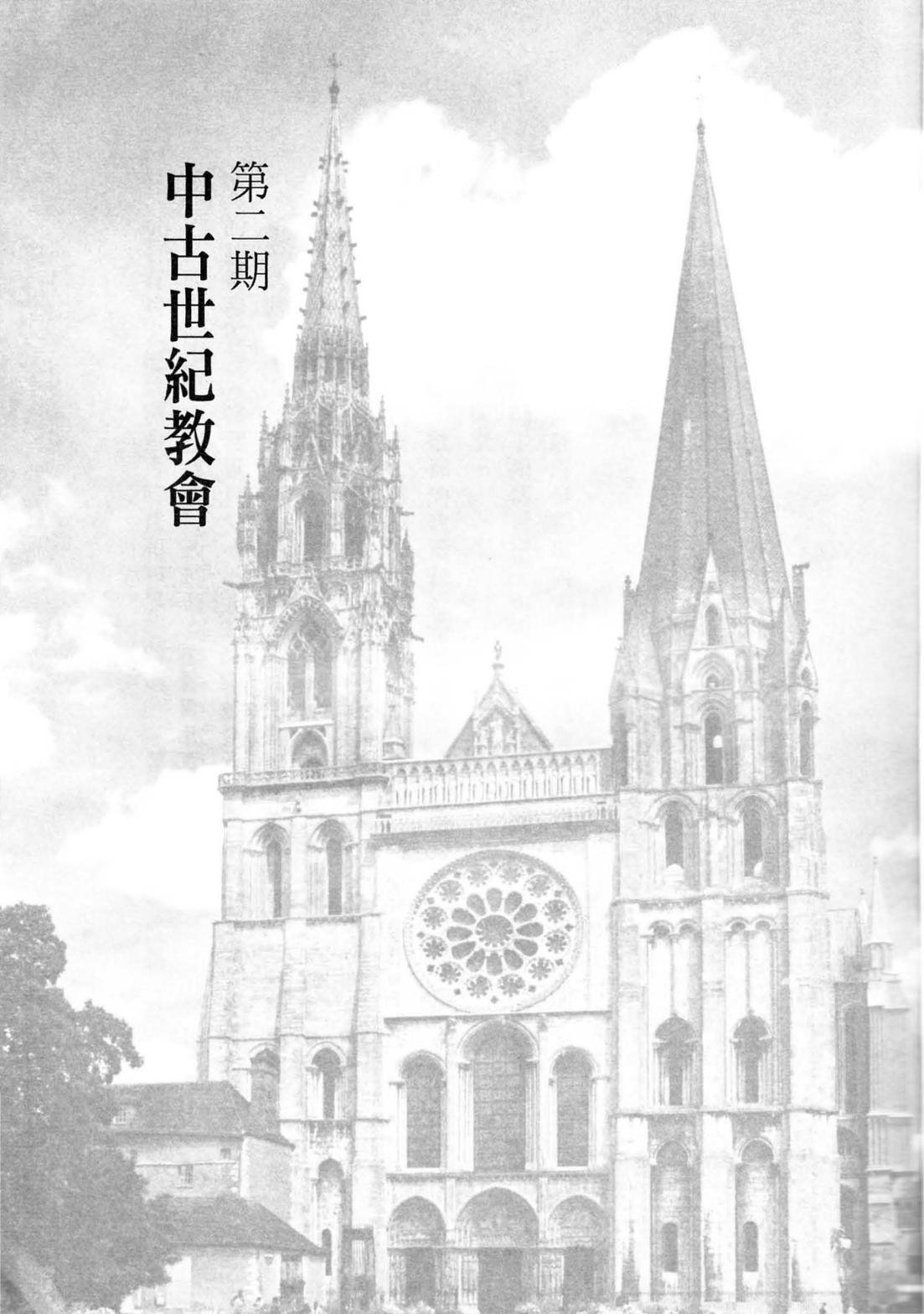
參 教會與政權.....	1
--------------	---

參 教會與政權.....	3
--------------	---

參 教會與政權.....	5
--------------	---

肆	教會與教育	143
伍	聖殿	148
陸	十字軍	151
柒	十三和十四世紀的傳教事業	161
捌	異端及宗教裁判所	175
第十章	中古文化的衰落 （自教宗博義八三六—二九四年即位至一四五三年君士坦丁堡淪陷）	
概觀		183
壹	教宗博義八世和「美男子腓力」的衝突	184
貳	教宗寄居亞味農	187
參	西方教會的大分裂	190
肆	中古世紀的結束	194
結論		198
人名中文索引		203
人名英文索引		215

第二期
中古世紀教會



前頁圖片說明：

法國沙特大教堂堪稱十三世紀最偉大的藝術結晶，更是哥德式建築中的代表作；透過建築本身，彷彿可以使人望見天堂的美好，忘記世上的一切罪惡，也在天主面前重拾謙卑之心。

概觀

天主教誕生於羅馬帝國境內，有利於她發展的環境，也有嚴重的阻礙。她面對政府的壓迫，奮鬥了兩個世紀，殉教者的英勇終於獲勝，羅馬皇帝皈依聖教，羅馬帝國也成了公教國家。

第五世紀時，歐洲的政治和社會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以前是羅馬帝國把地中海沿岸地域統一起來，形成了一個西方的文明世界。但社會秩序的混亂和風俗的敗壞種下了遠因，後來又歷經日耳曼各民族的襲擊，西羅馬帝國終於崩解。從此以至近代，天主教成了歐洲各國在形成期間的教育者。她的精神，逐漸浸入人民的思想 and 一切制度，成為歐洲一致的精神，直到那些國家成長以後，才開始漸次脫離教會的扶持和監護。這種進展到十五世紀末葉始告完成，而成為近代的曙光。

西方歷史學家稱這段漫長的時期為「中古時代」。

有些人把歐洲中古時代和「黑暗時期」(The Dark Ages)混為一談，這種看法未

免太過簡單。西方的中古時代綿亙千年，相當於中國的南朝劉宋至明初；這時期東西方的歷史都相當錯綜複雜；思想和藝術上既包含衰落的時期，也有極繁榮的時期。

中古時代可分為三個時期：

一、過渡及形成時期（五至十世紀）¹

（一）無政府的戰爭，導致了蠻族的入侵和文明的衰退，道德以及理智的生活也隨之低落。蠻族的歸化（五至八世紀）奠定了中古時代後期歷史的基礎。聖教會不顧時代困難，耐心從事蠻族的教育；不只傳授宗教信仰，也傳授她自前時期所挽救的文化遺產。於是蠻族以熱烈的心情接受這些新奇事物，並使之適應各國國情（詳見第五章）。

（二）查理曼（Charlemagne, 742-814）聯合了羅馬人和日耳曼人，再度統一起來，包括前羅馬帝國大部分的地域；他在公元八〇〇年由教宗加冕而稱帝，他的帝國是教會領域和文化領域復興的標誌（詳見第六章）。

（三）查理曼死後（公元八一四年），他所建立的帝國又行分裂，歐洲再度陷於無政府狀態，封建制度於是形成。不過教會仍繼續發展，她的影響逐漸浸入各種制度，她的傳教運動也進入歐洲東部和北部——羅馬帝國從未征服過的地區（詳見第七章）。

這段時期，未遭日耳曼民族侵略的東方教會，繼續維持她以往的生活，無重大

變化。但在第七世紀遭到了回教徒嚴重的侵擾，再加上內部的紛爭（對敬禮聖像的紛爭等）和過分的守舊，使其終告衰弱。那些從很久以前就反對拉丁教會的人，誤解日益加深，終於在公元一〇五四年不幸與羅馬分裂，直至今日（詳見第八章）。

二、中古文明的極盛時期（十一至十三世紀）

聖教會和中古文明的光明時期，確實在十一世紀末葉開始，維持了一百五十年。教會在困苦的奮鬥中面對政治，贏得了自主的權力，教宗的權威超越了帝國。教宗對教會內的影響以及與各國政府往來的權力，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教會統治著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並在文化領域中，成為無與倫比的領導者。神職班的革新、宗教生活在日新又新方式下的奮進、十字軍與回教徒的戰爭、重要的傳教事業、神學的傑作、羅馬式（*romanesque*，或譯羅曼內斯克）及哥德式教堂的興建等等，都表現了西歐民族在教宗領導之下聯合起來的充沛活力。雖然理想和事實之間的對比往往有很大落差，但教友的精神卻成了人民的共同精神，它滲透一切事物，而使之更加豐富（詳見第九章）。

三、中古文化的衰落時期（十四至十五世紀）

十四和十五世紀時，歐洲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各國競相獨立，互爭領土，逐漸突破了教會在公共生活上的影響。教會也因西方的分裂而發生動搖。教會愈來愈需

要面對新精神、現代精神；人們已看出，基督宗教的宗教改革已露出了端倪（詳見第十章）。

註釋

- 1 「黑暗」之名正好用來稱呼這段時期（五至十世紀）。還應該注意加洛林王朝的文藝復興（*Carolingian Renaissance*），就如近代一位歷史學家曾這樣寫道：「應當記住，一個最高級的理智工作，是多年在生活不安定和惡劣環境中的特殊人物所完成的。形成中古時代歷史前奏的時期，如果同以後的時期比較，可說是黑暗的；不過中古時代文化的根基，卻是建立在這黑暗混亂的世紀之上的！」（《大英百科全書》卷七，頁六〇）

第五章 蠻族入侵時的教會

壹 蠻族入侵

日耳曼民族

當羅馬帝國因內戰而分裂，受到敗壞風俗的侵蝕而逐漸衰退時，萊茵河及多瑙河彼岸謠言大作，震撼了生活在東歐和北歐的民族。羅馬統稱的「日耳曼人」其實包括幾個不同的民族：多瑙河以北的哥德人（Goths）已受過一些羅馬的影響；萊茵河以東的法蘭克人（Franks）、阿拉曼尼人（Alamanni）、勃根第人（Burgundians）等更近乎原始的蠻人。他們共同之處，就是還度著半游牧的生活；他們擁有龐大的牲畜，但對農業缺乏興趣，只讓奴隸從事耕作；他們人人都是戰士，民族就是軍隊。

日耳曼人很早就想在羅馬帝國境內定居。除了他們先天的好戰個性和剽掠的嗜

好以外，帝國土地的肥沃、水土的溫和、城鎮的富庶，樣樣都吸引著他們。羅馬皇帝不斷與試圖越過萊茵河和多瑙河的部隊交戰。當帝國強盛時，對入侵的蠻族自然不難擊退；但自第三世紀以來，羅馬人的愛國心和尚武精神已日漸衰退，加上連年內戰，精力日見萎靡，政治腐敗的城市對戰爭已不感興趣，鄉村居民也日漸減少。帝國既然日漸衰弱，軍隊便招募了不少蠻族；連以前只操控在羅馬人手中的指揮權，也逐漸轉移至蠻族手中了；同時，許多日耳曼移民定居在羅馬境內；這種滲透運動到第四世紀更形尖銳化，不久，皇帝明令准許蠻族的整個部落占領那些人煙稀少的省分。

在國境的另一方，大批的入侵也逐漸增長。這是東進不成轉而西進的反應：原來在公元初期，中亞、東歐和北歐的半游牧民族，開始了廣泛的遷移運動，好戰的匈奴（Huns）部落被中國漢朝的皇帝驅逐，轉而西向，於是他們就把當前的民族驅走，被驅逐的民族又被迫往西推向駐在羅馬帝國邊境の日耳曼民族；這樣一來，日耳曼民族便加強入侵帝國。

日耳曼人大舉入侵

公元四〇六年，好似大堤潰決一樣，防守萊茵河及多瑙河的羅馬軍隊全面敗退，

蠻族的浪潮大舉湧進。公元四一〇年，西哥德人（Visigoths）的一支軍隊，在阿拉利克（Alaric）率領下侵入義大利，攻陷羅馬，洗劫全城。法蘭克人、勃根第人、西哥德人侵入高盧；不久，西哥德和汪達爾人（Vandals）又越過庇里牛斯山脈向西班牙轉進，汪達爾人更由西班牙渡過直布羅陀海峽入侵北非。他們圍攻希坡（Hippo）三個月，聖奧斯定（St. Augustine）在公元四三〇年去世。此時羅馬軍隊也自大不列顛撤回，盎格魯人（Angles）和撒克遜人（Saxons）遂乘機占領該島。

聖業樂（St. Jerome）感嘆地說：「一想到我們這時代的災難，我的心就感到悲傷。在君士坦丁堡和亞平寧山之間，羅馬人的血傾流了二十年之久，各省均遭蹂躪洗劫。多少貴婦、貞女，多少高貴而纖弱的身體未遭那些野獸的戲弄？主教被擄，司鐸及各級神職人員被殺，聖堂被毀，戰馬繫在祭台旁如同在馬廄一樣，殉教者的遺骸被拋置地上。各處舉喪，各處悲嘆，各處呈現死亡的氣象。羅馬的世界傾頹了……」

聖業樂痛苦的呼聲，使我們明白人心對羅馬毀滅的悲哀，以及對蠻族的痛恨是多麼深。眼看羅馬帝國所代表的秩序、穩定、文明、人道及生活的甜蜜均在野蠻人所燃起的戰火中覆沒。

實際上，各處因占領所遭受的暴力並非一樣。普遍來說，蠻族的目的並非毀滅

所驚奇羨慕的帝國，而是想插足其間；他們攜妻帶子傾巢而來，企圖占領征服的地區；占領自然免不了屠殺搶劫。其中汪達爾人最為殘暴，他們仇恨羅馬所有的一切，不惜四處破壞；而且他們還是亞略異端（Arianism）的狂熱信徒，在北非所建立的王國中，對天主教徒的迫害最為激烈，致使多人殉教。

日耳曼人中的亞略異端

第五世紀初葉，的確有不少日耳曼民族信奉了基督宗教，可惜都是亞略異端。事情是這樣的：有一個哥德人名叫烏弗拉（*Wulfila*, 311~382）來到東羅馬帝國，在那裡受了良好教育，且受祝聖成為神父，並在公元三五一年被祝聖為君士坦丁堡主教。不幸當時亞略異端在東方占上風，烏弗拉自然很容易受感染。當時哥德民族還沒有文字，他發明一種字母以便書寫。於是他把聖經的大部分內容翻成了本國文，為給同胞宣傳福音。他在聖經的譯本中加上了亞略異端的解釋，哥德人就這樣信奉了亞略異端。因著他們的遷徙，便幫助了亞略異端在其他日耳曼民族中的傳播。

匈奴的入侵（公元四五年）

第五世紀蠻族再度入侵時，不少土匪到處滋擾；匈奴發動大規模遷移，出現在

帝國邊境，文明人視之如蛇蠍，驚恐害怕，歷久不忘。今日西方學生閱讀當日歷史時，猶有餘悸。一位拉丁文歷史學家曾這樣描述：「他們的野蠻殘虐實在出人意料之外，他們身體短小精悍，上肢特別寬大，頭大無比，為了阻止鬍鬚生長，把臉上弄得滿面疤痕，真不知他們是人還是野獸！他們在馬上生活，在馬上開會，在馬上買賣吃喝，連睡覺也是伏在馬頸上。他們沒有農具，不耕稼，也沒有固定的房舍；妻子兒女都生活在他們到處遊牧或出征的車上……他們不起火燒飯，只是將肉放在馬鞍上以臀蹂躪，然後帶血啖食。他們能以高超的技巧向極遠處射箭，箭頭用獸骨所製，同鐵製的一樣堅硬，也有同樣的殺傷力。」他們神出鬼沒，疾馳如飛，簡直無法捕捉；他們好像生來只為了擾亂破壞一樣；他們誇稱自己的馬蹄過處，草木不生。

其實，在第五世紀中葉，匈奴很早就與文明世界接觸了。他們的領袖名叫阿提拉（Attila），他設在匈牙利的營壘內，便把原始的野蠻和東方最奢侈的細膩冶於一爐了。他聰明絕頂，幼年曾在朝廷為質。公元四三五年作了匈奴王以後，時用恐嚇或詭計，把生活在萊茵河和裏海之間的各民族，團結於其麾下。他夢想以蒙古帝國代替羅馬帝國，作為征服世界的第一步。

公元四五一年，他率領一支龐大的軍隊渡過萊茵河，到處焚燒擄掠；他自稱是「天鞭」——即天主的鞭子——真是所向披靡，無人敢當。巴黎的居民同樣為恐怖

所懼，正想棄城而逃……但一個名叫熱諾維五（Geneviève: 425～512）的少女反對逃亡，她說：「誰願意逃亡，誰沒有作戰的勇氣，任他逃亡吧！至於我們，卻要熱切祈求天主，祂要俯聽我們的懇求。」結果阿提拉沒有進攻巴黎，卻去圍攻奧爾良（Orléan）。聖阿尼盎（St. Anianus）主教鼓舞民眾的勇氣，他們奮勇自衛；正在城要陷落的時候，遠遠地看見一支援軍前來，那是羅馬和日耳曼人因共同的敵人當前，而同仇敵愾；一位羅馬大將把羅馬最後的軍隊同龐大的日耳曼軍隊聯合在一起，並身先士卒地迎戰匈奴；阿提拉被迫後退，在沙龍（Chalons）附近香檳大平原上展開了決定性的大戰，戰況劇烈，死亡無數；阿提拉大敗，退回萊茵河彼岸。

阿提拉在義大利

次年，阿提拉又率軍侵入義大利北部，向羅馬前進，如入無人之境。皇帝和元老院除了派人去求和以外，想不出更好的辦法。這項使命艱難，且極度危險，遂請求教宗聖良一世（St. Leo I.，在位期間 440～461）擔任。教宗欣然允諾，他依恃天主的助佑，由幾位有聲望的人陪同前去，與阿提拉在義大利北部曼土亞（Mantua）相遇。教宗用什麼理論折服了這位「天鞭」呢？他曾向他提起阿拉利克屠殺羅馬後所遭遇的後果嗎？我們不得而知；也許是答應給他納貢，阿提拉就放棄原先的計畫而

返回了匈牙利。次年他就突然死去，他的兒子紛為國土而爭，結果四分五裂了。

兩年以後，汪達爾人自非洲渡海入侵義大利，向羅馬推進。這次又是教宗聖良一世前去說服，但未能阻止他們搶掠，只答應了不殺人放火而已。

西羅馬帝國滅亡

阿提拉的進侵好似一陣颶風，所過皆成廢墟；反之，日耳曼的進侵卻在西羅馬帝國各省建立了許多王國；只剩義大利表面還保持獨立，但不久也歸消滅。狄奧多修大帝（Theodosius）的繼承者都是些軟弱無能的公侯，他們都讓蠻族領袖奪得了統治權。直至公元四七六年，一個名叫奧刀瑟（Odoacer）的日耳曼人，迫使最後一名傀儡皇帝——一個十五歲的少年——退位，把皇帝的衣冠文物給東羅馬帝國的皇帝送去，表示西方已不需要皇帝了。但不久東哥德（Ostrogoths）王狄奧多里（Theodoric，在位期間 493～526）代替了奧刀瑟，他極欣賞羅馬的文物制度，在義大利組織了一個昌盛的國家，並維持著和平。

新世界

第五世紀末葉，西方的局面與前一世紀完全不同。羅馬帝國已如一株被蛀空的

大樹，經大風一再搖撼便傾頹了。帝國的官吏不復存在，有共同語言和文化的民眾雖還仍舊，但身旁已住進了新的民族；勝利的蠻族為數不多，但已喧賓奪主。羅馬的一統不復存在，現在成了各個王國的五色圖案：義大利是東哥德人的王國，非洲是汪達爾人的王國，西班牙和高盧南部是西哥德人的王國，今日法國的北部和比利時是法蘭克人的王國，盎格魯和撒克遜人占據了大不列顛。他們彼此間的交通愈來愈困難，大道已不能保存；羅馬的文化本來是城市的文化，此時多數人已由城市的廢墟中遷出，逃到鄉間去了。大部分的學校都已關閉，教育和文化水準也大大降低，進入了黑暗時代。

蠻族入侵時的教會

天主教會雖與帝國緊密結合，但她有特別的組織，因此在這場浩劫中能繼續存在。主教仍管理他們的教友，雖然身處極混亂的時期，但一有喘息的機會，他們就會召集會議，共同商討並制定紀律和敬禮的規則。

在蠻族入侵時，主教們常協助保衛城池；不只一次他們同羅馬的軍官共同組織起來抵抗蠻族，因此減低了不少民眾的損失，如聖奧斯定在非洲，聖阿尼盎在奧爾良，聖良一世在羅馬等都曾這樣做過。

當蠻族已在地方上定居，羅馬帝國不復存在時，只有主教仍保持他們以往的權力；他們多數出身望族，都受過良好的教育，因此很快就獲得了蠻族的佩服。人們不免要問：教會在此浩劫中如何能繼續生存？然而這卻是事實：她不但能生存，還建造了許多新堂。正是在此時期，主教們贏得了「城市保護者」的美名，他們的確當之無愧。

他們最大的功勞無疑是總不敗與失望，然而教友卻遭受了失望的絕大誘惑。他們愛國絕不遜於外教人，對祖國的災難感到更強烈的痛心。他們也和其他同時期的人一樣，相信帝國能永垂不朽；他們愛慕帝國統一的其他理由，就是更容易把基督的教會傳於普世。他們絕想不到在羅馬的秩序和文明以外，還有其他文化。如果我們同現在相比，就不難了解他們的想法：現在的人也絕不想今日的文明會消滅；他們不能想像原子大戰能把我們的城市、工廠、學府、博物館、圖書館、戲院和電影院等消滅，使人重返野蠻；第四世紀的羅馬人也有同樣的看法，為他們而言，所謂現代文明就是羅馬帝國的一切。在同樣的觀點下不難明白，羅馬人眼看蠻族真毀滅了帝國，侵略者一天比一天多起來，都是些粗暴、赭色頭髮的巨人，衣衫襤褸、鬍鬚叢生、滿身腥羶、粗俗無知，連拉丁話都不會講，只會說生硬的土語……看著他們到處亂闖，喧賓奪主，對羅馬的文明毫不關心，只尋求粗鄙的享受。這就是他

們的生活。

不少主教繼承聖奧斯定的思想，把偉大聖師的教訓踐諸實行。他們提醒人民把那些災難視為天主的懲罰，教導他們不必悲傷過去，當舉目瞻望未來。羅馬的毀滅並非世界末日，乃是一種浩劫，正如歷史上其他許多災難一樣；文化能夠喪失，建在磐石上的教會卻不會消滅。最後更向他們說明，蠻族也是基督寶血所救贖的人類，他們也該領受福音。因此教會決心歸化那些新民族，慢慢施以教育。

貳 蠻族的歸化

聖教會在第五世紀蠻族入侵西羅馬帝國的浩劫中，仍屹立不搖，她先前對文明的民族做了什麼，現在對野蠻民族也照樣去做，就是向他們宣傳福音，使他們皈依基督。

然而教會也遭遇了重大的困難：大多數的日耳曼人已經受洗成了亞略異教徒；對他們而言，天主教是戰敗者的宗教，因此加以輕視。那時只有一種定居在帝國境內的民族還是外教，就是最倔強不馴的法蘭克人；他們居住在比利時和現在法國的北部。然而他們卻是最早信奉天主教的蠻族。

法蘭克人的歸化 (第五世紀末葉)

當時法蘭克人有一位青年領袖，好勝、聰明而且驍勇善戰，名叫克洛維（Clovis）。他以連續的征服，占領了整個高盧的北部。

公元四九三年，克洛維與一位名叫克勞帝德（Clotilde）的天主教公主結婚。克勞帝德勸克洛維非信奉天主教不可；他起初不聽，說：「我所出身的國家不容許我放棄它的神明，再說，誰能給我證明妳的天主是真神呢？」

三年以後，克洛維同另一支日耳曼阿拉曼尼人交戰。在一次關係民族存亡的戰役中，眼看他的軍隊漸漸不支，於是他想起了王后的話，遂高聲喊道：「克勞帝德的天主啊！如果你使我戰勝，我就信服你而受洗！」他的兵士果然勇氣大振，敵王戰死，敵軍敗逃。

克洛維榮獲勝利，便實踐前言；於是在公元四九八年聖誕節，於理姆斯（Reims，或譯蘭姆）堂內，在燈燭輝煌中，由聖勒彌爵（St. Remigius）主教手中領受了聖洗，當時有三千戰士同他一齊受洗。

這位號稱「新君士坦丁」的歸化引起很大的反應；克洛維贏得了國內最有影響力的主教們信賴。從此法蘭克人同高盧原先的居民，排除了信仰上的差異，彼此更

加團結。反之，占據高盧另一部分的日耳曼人，勃根第和西哥德人卻是亞略異教徒。克洛維把他們一一征服；那些民族在信仰上習於追隨自己的領袖，因此亞略異端遭受了嚴重的打擊。自萊茵河至庇里牛斯山脈，所有的土地都歸這位天主教領袖一人統治。因著蠻族入侵的混亂和羅馬帝國的崩潰，產生了一個新民族，這個民族很早就正式皈依了天主教，就是被稱為「教會長女」的法國。

西班牙境內西哥德人的歸化

(第六世紀末葉)

西班牙境內的居民，在蠻族入侵以前已信奉了天主教，但新來的主人卻是亞略教徒。此處西哥德人的歸化，也導源於一位婦人。六世紀中葉，國王良維日德(Leovigild)企圖統一全國的信仰，想強迫天主教徒接受亞略異端。但太子赫買日德(Hermengild)已與一位天主教公主結婚，而她也說服了丈夫皈依天主教。父王軟硬兼施，企圖使太子信奉亞略異端；但太子堅決答稱：自己既三生有幸識得真教，絕不肯中途背棄；父王一怒之下，將他廢為庶人，剝奪他所有的財產，但他毫不動搖。於是，良維日德便把他押監，頸手繫以鐵鏈。無奈這位青年太子，敝屣世榮，一心希望天國，熱切祈求天主賜給他忍受世苦的勇力。復活節來到，在深夜的靜寂中，父王差遣了一位亞略異教徒的主教送聖體給他。這位忠於天主教青年毅然拒絕他

的詭計，聲言自己雖身繫縲紲，心靈卻平和地仰望天主。父王大怒，立即派遣侍衛在獄中結束了兒子的性命。

「殉教者的血是教友的種子」這句話又獲得了事實的驗證，一年以後良維日德去世，次子黎喀得（Recard）承繼了王位。新王一反父王的暴行，效法了殉教的長兄。公元五八九年在托雷多（Toledo）召開大會，新王和王后及八位亞略教徒主教，連同多位貴族放棄了異端重回天主教的懷抱；於是西哥德人也隨之集體歸化。

從那時起，西班牙的信仰生活非常濃厚，在多次的會議中都有顯著的表現。

愛爾蘭的歸化（第五世紀）

當日耳曼人入侵的狂濤在西方各奉教國繼續肆虐時，一個新的地區接受了福音。愛爾蘭因地處孤島，距離遙遠，從未受過羅馬的影響，也沒有受過日耳曼人的侵略。

對愛爾蘭的歸化，聖博第（St. Patrick，或譯巴特里爵）當居首功。聖人生於大不列顛的教友家庭，十六歲時被愛爾蘭海盜擄去。他度過六年的奴隸生活，終於逃回故鄉。他由故鄉渡海前往歐陸，在那裡作了隱修士。但他覺得自己被天主召回，要他去曾被擄的地方宣傳聖教，他說：「我聽見還沒有出生的嬰兒聲音，從愛爾蘭呼喚我。」於是他在公元四三二年被祝聖為主教後，前往愛爾蘭開教，差不多三十年

之久，完全致力於傳教工作。他除了講道以外，還以奇蹟證明他的道理。他給人授洗，祝聖司鐸主教，在各處建立隱修院。在這個沒有城池的地方，隱修院長同時也是周圍地區的主教。每座隱修院都在自己四周維持信仰的熱忱，並成了傳教的中心；以致聖博第去世時（公元四六一年），愛爾蘭已贏得了「聖人島」的美稱。

在愛爾蘭教會史上最值得注意的一點，就是它剛剛歸化便成了一個熱烈傳教的中心。愛爾蘭人一領洗就願作隱修士，這些隱修士又感化別人受洗作隱修士。在聖博第所建立的隱修院中，隱修士的數目驚人地增加，他們還渡海到大不列顛去傳福音，到歐洲大陸使在蠻族入侵時凋零的信仰復興起來。

這些傳教修士中最著名的就是聖高隆（*St. Columban, 540~615*）。他在三十年之間走遍了高盧、瑞士和義大利。他好似厄里亞再世，到國王們面前指斥他們的罪行。凡他所經過的地方，都有隱修院建起，在那裡有大批的門徒投入嚴厲的會規去修行。他於六一五年，在義大利北部保比約（*Bobbio*），一座自己建立、最出名的隱修院內逝世。

英吉利的歸化

大不列顛在蠻族入侵之前，福音就已傳入。侵入英土的是日耳曼人中最野蠻的

盎格魯和撒克遜兩個民族，他們對天主教的一切都特別懷恨，因此對教友發動了殲滅性的戰爭，逃到西部的才能免於一死，也不敢對迫害他們的敵人宣傳福音。直到第六世紀末葉，法蘭克人歸化後百年，盎格魯和撒克遜人才接受了基督的信仰。

直到現在，向蠻族開教的不是主教就是修士；這次卻是由羅馬的教會中央來發動。公元五九〇年，教會歷史中偉大的教宗之一聖國瑞一世（St. Gregory I，在位期間590～604）登上了聖伯鐸的寶座。相傳他被選以前是羅馬的一位隱修士，一日行路望見被擄的奴隸，其中有三名美少年，褐髮碧眼，在那裡拍賣。他問拍賣的商人說：「他們屬於什麼民族？」——「他們是盎格魯人（拉丁文是 Angli）。」——聖國瑞說：「我看不是盎格魯，簡直是盎傑利（Angeli）啊！」（拉丁文 Angeli 是「天使」之意。）他就把他們贖去，在自己的隱修院中教育他們，從此下定決心要去歸化他們的民族。

國瑞陞了教宗以後，並未忘記他的計畫。公元五九六年派遣了四十位傳教士，由修士坎特布里聖思定（St. Augustine of Canterbury）率領赴英吉利。還沒到達目的地以前，有些人就想回來：聽說英吉利人挖敵人的心吃，而且他們的語言非常難懂，他們一聽就喪了膽；還得由教宗鼓勵他們、命令他們，他們才決定前去。

其實結果遠比他們所希望的還好；他們在泰晤士河口下船登陸；國王肯特（Kent）

已與一位天主教的公主伯爾達 (Bertha) ——法蘭克王的女兒結婚，他因此答應接待傳教士。

國王受到朝臣護衛坐在一棵樹下，眼見四十位羅馬修士唱著禱文向他前來。國王聽了他們的演講後說：「言詞固然美麗動聽，但所說的一切，為我而言都是新鮮可疑的，我絕不能馬上相信。你們既是遠道而來，為把你們信為真理且視為無上幸福的好消息通傳給我們，我們絕不難為你們。反之，我們要供給你們住處，你們去歸化你們所能歸化的人吧！」事實上，國王被修士聖善的生活感動，不久便請求受洗；追隨他善表的人很多，聖思定在公元五九七年聖誕節竟給一萬人付洗。國王把自己在坎特布里的宮殿賜給了聖思定，這就是英國第一個主教座堂。

教宗聖國瑞一世從羅馬的病榻上遠遠注視著那些傳教士，給他們寄去對傳教方式所當遵循的訓示；那些訓示的確合情合理，而且穩妥易行；直到現在，仍不失為對外教民族傳教當遵循方式的撮要。他說：「如果邪神的廟宇建築得良好，與其把它拆毀，倒不如為它祝聖，安放祭臺，改為敬禮天主的聖堂。要在民眾習慣敬拜偶像的地方和日子，准許他們以另外的方式慶祝天主的瞻禮節日；如果外教人有以筵席慶祝節日的習俗，就可以在殉教聖人的節日舉辦公宴。准許他們舉行外表的歡樂，心靈的歡樂也就容易獲致了，對那些粗野的人，絕不可把他們的一切舊習一筆抹煞。

人不能一躍而登山，需要一步一步爬上去。」

傳教事業雖如此順利開始，卻不能毫無困難地完成；瓜分英吉利的七個王子並非對天主教都懷有好感，他們常彼此交戰。坎特布里聖思定來此一世紀以後，歸化的事業已有了相當進展；許多興盛的隱修院成了教育的中心，在其中培養了中古時代盎格魯撒克遜的文化，也陶冶了將來去日耳曼開教的宗徒。

日耳曼的歸化（第八世紀）與聖博義

當時占據日耳曼的民族，大致在萊茵河和易北河（Elbe）之間，包括現在的荷蘭、西德和奧地利的一部分，是最難歸化的民族；他們還保留很粗暴的性格，異教的思想也很興盛，尚武的精神很不容易使他們了解天主教教義的良善謙和。

但是日耳曼人已經聽見人宣講天主教，愛爾蘭的修士聖高隆和他的門徒已在瑞士宣傳福音，一位英吉利修士歸化了荷蘭北部。但那些努力都是東鱗西爪，沒什麼次序。真正在日耳曼建立教會並把它正式組織起來的，乃是一位名叫文弗里（Winfrid）的英吉利人，他更為人所熟悉的拉丁名字是聖博義（St. Boniface, 680~753，或譯波尼法爵）。他是一位本篤會會士，在隱修院內已獲得了廣泛的修養；三十歲以後，他感覺有一股吸引力，使他到先祖的故鄉去宣傳福音。他在荷蘭北部第一次的嘗試沒

有多大收穫；他認為單獨一位傳教士不能擔負這樣的工作，必須請求教宗支持。於是他起身前進羅馬（公元七一九年）。教宗國瑞二世（Gregory II，在位期間715～731）熱誠接待他，並正式委任他為日耳曼的開教宗徒。三年以後，教宗把他召回羅馬，祝聖他為主教，並非為管理某一教區，而是擔任聖座的直接代表。他常同幾位和他一樣熱誠的修士一起巡行各地，起初是幾位英吉利修士，後來也有日耳曼修士，他們的生活很貧苦，有時連購買衣服的錢都沒有；三十年的工夫到處講道，冒著各種危險。他按照各地進步的情形，把已歸化的組織起來，復興了以前的隱修院，也創建了新修院。這樣他所建立的事業，才不像他的前任那樣未能持久穩固。

在聖博義宗徒事業上最動人的一點，就是他常和祖國保持聯繫。他不斷給朋友寫信，向他們訴說自己的困難和不安，他依恃他們的祈禱，他由他們接受道義和物質的援助；最重要的是，他有意讓英吉利的修女們前來這剛從敬拜邪神的黑暗中救拔出來的日耳曼國，以她們的善表光照他們，用她們的祈禱求天主降福、幫助他的傳教事業，他對其中一位修女，懷著一份純潔而崇高的精神友誼，那是他的親戚聖理奧巴（*St. Lioba*），他請她擔任一座修院的院長；這友誼給這位工作忙碌的聖人加上一層溫柔而細膩的美麗色彩¹。

聖博義就是在荷蘭極北部開始了他的傳教生活，也要到那裡結束。他七十五歲

時，偕同五十位修士重返那裡傳教，因為教會在那裡還沒有堅定地建立起來。某日他正與同伴們停留在一處為給一羣教友付堅振，忽然有些狂熱的異教徒向他們撲來，他們就一個繼一個地倒下去。聖人被攻擊時，手中所拿的經本現在仍保存著，因為聖人曾本能地用它防護頭部，書上面還留下了劍砍的痕跡。他的遺體安葬在富爾達（Fulda），常受德國教友敬禮。德國的正式歸化，實在該歸功於聖博義，其實他們不只獲得福音，就連文化也得力於他；因為他的每一項建樹，無論修院或主教公署，都成了中古時代協助德國文化發展的中心。只有一支口耳曼民族沒有獲得他的實惠，那就是撒克遜人，直到查理曼時，他們才被征服。

從克洛維受洗到聖博義去世，中間有二百五十年之久；這段時間，就歷史而言雖不甚長，卻獲得了廣泛的成績。只須把第五世紀末葉西方的情形，同第八世紀中葉的情形一比，就可明瞭。公元四九〇年，五光十色的蠻族國中，大部分還是亞略教徒，天主教在許多地方還是時常遭受迫害，羅馬帝國的四周還都是異教徒。公元七五〇年時，西歐的國家全都信奉了天主教，教會到處受人尊敬。這都是主教和修士們英勇奮鬥的成績。在奉教國中，土著民族正與日耳曼人相互混合，中世紀歐洲的居民便由此形成。

對聖教會而言，這些成績是她所受的那些駭人損失的一些補償；因為正當東方

修院到處林立的極盛時代，敘利亞、波斯和埃及淪陷於回教徒之手。當國瑞二世派遣聖博義去日耳曼森林樹立十字架時，北非和西班牙也遭受了同樣的命運。天主教世界的重心從以前的地中海周邊轉移到北方去了。

參 教會對文化的影響

蠻族入侵以後，教會所面臨的是四方雜糅的民族：一方面是舊習仍深的帝國遺民，另一方面是新歸化的日耳曼人。他們雖已受洗，卻無法立即成為完美的教友，他們暴烈的性格和迷信的習俗，不能在短時間內掃除殆盡，因為他們的教育水準太低。教友的信德固然誠懇而活潑，但程度終嫌低淺，精華總是太少，大部分摻雜著迷信。這些粗俗的心靈需要具體可接觸的事物，才能使他們領悟超性之事；他們對恭敬天主和基督，與敬禮聖人、聖女分不清。敬禮聖人，本身雖正當合理，但他們舉行的方式卻往往帶了迷信的色彩。當時對聖髑的敬禮更是熱烈得人難以置信。那些聖髑不僅是聖人的遺骸，凡同聖人或他們的墳墓接觸過的東西，他們都奉為至寶。人們往往對於聖人的衣服、頭髮，甚至指甲的雜屑起爭辯；有人以為把物品在聖人們的墳上一放，就染上了他們的德能。

為把這些民族形成真正基督化的社會，當做的事情實在不少。該教他們做事公

平、重視工作，推行精神的修養。不過教會並不敗興，她以固執的堅忍，從事這種須延續數世紀的艱苦工作，特別是主教和隱修士們毅然擔起了這份責任；他們對培養新社會所費的心血，真是一言難盡，他們的確是中古文明社會的創造者；歐洲國家之所以有今日，他們厥功至偉。

主教

自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歸化以來，主教在社會上的崇高地位，已為法律所承認。從第四世紀末葉，他們就有權力以政府的名義審判神職人員牽涉其中的幾種案件。蠻族出現時，主教們往往協力保衛民眾，在蠻族入侵產生的新社會中，民眾常是歸化外教人的有效原動力。外教人歸化以後，主教們常保持自己的威望和優越地位，尤其因為他們大部分出身名門望族，他們的威望連官吏和國王也莫可奈何，只有主教敢反抗他們，比方稅吏壓迫百姓時，主教常出面保護。當一位國王公然破壞教會道德的法律時，常有主教斥責他們的罪行，也有不少的主教因仗義直言而喪失了性命。

主教的地位在都市內是獨一無二的，他幾乎無所不管。第一自然是他靈牧的職務；他宣道施教，巡視各堂區；他也是鰥寡孤獨和弱小的保護者。當政府的權柄無

能為力時，主教就出面指導並支配公益工程的費用：如建造城垣、構築堤岸或溝渠等。主教也開設來往行旅的住處，為病人開辦醫院，特別是癲瘋病院。他掌管窮人名單，監督分施信友大量捐獻的救濟品。

按照大公會議的規章，主教由神職班和民眾選舉，由首席主教（總主教）祝聖。事實上國王往往干涉主教選舉，堅持派自己所選擇的人，難怪有時會有不稱職的主教出現。所幸這類不足為人師表的主教還不多，大多數的主教都生活純潔、愛德出眾，具有反抗強權的勇氣。現在歐洲還保存不少這些主教的住宅，教會對他們也多以聖人視之。

聖本篤與隱修士

在這混亂的時期，隱修士也協助主教們擔負了重要的職務。前文已經說過：聖安博（St. Ambrose，或譯盎博羅削）、聖奧斯定、聖瑪定（St. Martin，或譯瑪爾定）等人如何在西方創始了隱修生活。公元五世紀，在高盧南部很盛行隱修生活。公元四一〇年，聖郝諾拉（St. Honoratus）在地中海上的小島萊蘭（Lérins）建立了一座隱修院，不少修士在那裡度著半隱修、半獨修的嚴格生活。在這座隱修院的修士中，產生了許多聖善的主教。公元四一五年，一位東方人加西安烏斯（John Cassianus），

長途旅行拜訪東方和埃及的隱修士後，在馬賽建立了兩座隱修院，男女各一。因著他的著作，人們得以認識東方隱修士的生活、習慣和他們所遵守的規矩。不過，西方隱修生活的真正鼻祖還是聖本篤（St. Benedict, 480~547）。他出生在義大利中部諾西亞（Nursia）的一個顯貴家庭，在羅馬就學；不久自覺為曠野所吸引，遂開始到荒涼的蘇比亞高（Subiaco）山谷度隱修士的生活。他的生活非常嚴厲，有時為克制肉欲的誘惑竟在荊棘中翻滾。他富有聖德的名譽迅速傳開，不少人去請求收為弟子；他就為他們建立了一座隱修院，以後接二連三地在羅馬一帶竟建了十二座；最後他定居在羅馬和那不勒斯（Naples）之間名叫卡西諾的山上（Monte Cassino）²。

聖人在該院中寫了隱修「規條」後就去世了；此規條現今仍被全本篤會奉為主臬³。

最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規條中包含明智與寬猛相濟的節制。聖本篤的大功勞是使隱修的理想與西方民族的體質、需要和習慣相契合。沒有特別嚴厲的苦工，使祈禱與讀書、唱經與靜默、勞作與閱讀、睡眠與守夜，保持著適當的平衡。在普通的神貧與服從的聖願之下，聖人又加上了固定的誓願。修士自由地進入修院，並以誓願自行約束，一旦選定了這種生活後，也當矢志永留於修院。修院如同一個家庭，院長當以慈父的心腸對待修士。他給各個會院極大的自由，務使會規的原則能適應

各地的環境。

西方一致採用這項賢明的規矩，正如聖西略（St. Basil，或譯巴西略）的規矩風行於東方一樣，並且逐漸代替了其他難以適應的規矩：例如聖高隆的規矩過於嚴厲。西歐各處如法國、西班牙、英國、德國都有本篤會院；社會各階層的人大批投入這些靜默的地方，給人弟兄般的和樂善表，他們以決心把自己的生命奉獻給天主。

設想我們進入一個被沼澤遮蔽的樹林，在蠻族入侵時，歐洲大部分還是遍地荻苻沼澤。現在你可以看到在一片荒涼的中央有一塊耕耘的土地，蓋著綠油油的莊稼，中央有一片寬大的建築，那就是隱修院。最引人注意的是蓋有鐘樓的聖堂，修士們聚集在那裡，一天七次詠唱讚美天主。其次你所見到的，就是旅舍；因為在本篤會院中，無論何時何地，常免費招待來往的客人，如同招待基督本人一樣，尤其是窮人和朝聖的人。接待客人的地方是一個寬闊的大廳，由那兒可以進入專為客人使用的寢室和房間。一間寬大的廚房同修士們的廚房隔離，常準備著飯菜。病房和醫生的住室與旅舍是分離的，那裡還有種植藥材的園圃。修士的房間是在一棟圍繞著天井四周的方形建築，四面繞以走廊，其中有飯廳、寢室和圖書室；圖書室的書架上，滿是古拉丁作家的傑作抄本和神父們的著作；其次就是寫作室，修士們在那裡繕寫著作的珍本。再其次是各種工作室，諸如磚瓦、木工、鐵工、紡織、金銀細工等，

應有盡有，因為修士理當自給自足。至於田園、倉房和家畜棚等，更是不可或缺。此外還有附設的學校，修士們在其中教授兒童拉丁文，因為當時在西方，拉丁文是唯一供書寫的文字。

隱修院周圍有結實纍纍的果園，有供釀製彌撒酒的葡萄園，有供給蜂蜜和黃蠟的蜂羣——黃蠟是敬禮的必需品；山谷和池塘也供應不少的魚，也可利用溪流推動水磨。修士們有時也去荒地開墾，有的掌犁、有的伐樹，便增加了新的耕地。

本篤會對西方文化具有多方面的貢獻；他們不只拯救古抄本及其他富有學問和思想的一切寶藏，而且保存並推進了建築和農耕的技術，鐵、木、紡織等工藝，以及植物和製藥等知識；此外還開墾許多荒地以增進文化。他們離開城市，到偏僻的地方、森林或動亂時遭人遺棄的鄉村建立隱修院。許多居民被那些安靜的綠洲所吸引，也到他們的周圍定居。他們在那裡不但滿足了民眾在宗教上的需要，而且在患病或困難時，能獲得修士的友愛扶助、子女的教育以及文明生活的一切資源。因此歐洲有許多農村甚至城市，都起源於隱修院。修士們的善表比言語更能說服蠻族習修為他們很陌生的德性，如謙遜、友愛、貞潔、良善等。修士也使他們重視勞作，那是以前被他們輕視、委之於奴隸的事。這樣一來，傳教士所創始的工作，隱修士們卻把它完成了，信德也因此得以根深柢固。

教會對風俗的影響

蠻族粗野的習俗，也因天主教的投身努力和修士的以身作則，而逐漸軟化。聖教會認為，許多風俗習慣既然一時不能改除，便當予以容忍，不可深加斥責。例如：為認清一個人是否有罪，強迫他把手浸入滾水鍋裡；如果三天以後他的燙傷慢慢好起來，就可聲明他無罪。兩人爭執不下時，為明白誰有理，就會讓他們決鬥；他們認為有理者必得天助。諸如此類的惡劣風尚很多，聖教會既不能取締陋習，又不能禁止私下報仇，只好努力使之減少或減輕。比如使他們承認聖堂為「法定的避難所」：凡罪犯或負債者逃至聖堂，不能以武力強行押出。教會並非袒護罪犯，而是使報仇的怒氣由拖延而漸消，或給神職人員斡旋的時間，以便使他們就範。除了追緝的人先手按聖經發誓，保證不使罪犯受刑、殘傷或殺戮，修士便不放逃犯出去。這種避難的權利給教會招致多少麻煩，不難想像。國王眼看自己的仇敵逃脫，勢必要盡力把他拉出；天主固然能直接干涉，例如對破壞避難權利者施以顯罰，不過奇蹟是不常見的。

教會對遭難的人更是盡力保護。當時普遍把戰俘列為奴隸拍賣。教會雖不能馬上取締這種可詛咒的惡俗，但能盡力收買俘虜以減低它的惡果。她為贖回俘虜，犧

牲了大量的金錢；常見主教無錢贖虜時，就拍賣自己的聖器。所以在奉教的歐洲各處，恢復自由的奴隸很多。同時教會也鼓勵教友解放奴隸，視解放奴隸為一種神聖的行為。為此教會規定了特別的禮節，並引用超性理由來舉行：「吾主以聖洗所解放的人，不當以鐵鍊拘之，因為在祂眼中人人平等，沒有身分的區別。」

未能脫離奴隸羈絆的，聖教會就以教化的影響使他們受益。她制訂了許多法律減輕他們奴隸身分的痛苦。例如：她聲明奴隸的婚姻同樣有效不能解除，使他們有合法的家庭；禁止把他們賣給外國人，以保留他們在祖國；使他們在主日休息，恢復他們教友的身分。奴隸的身分既經提高，就不像往日被隨便當物品買賣或遭任意虐待了；之後奴隸制度漸漸取消，代之以農奴，已算大有進步。農奴不得離棄他所耕種的田地，如同分種田地的人一樣，得按時交付糧食或年金；但他有自己的家庭，能享受相當的自由；他所負的義務是由習慣法釐定的，主人不能任意擺布。

聖教會也致力使人尊重女權，不讓弱小者毫無保障。奉教的社會不再像往日一般怠慢婦女了。當時創建了無數的女隱修院，足以表示女子的貞潔如何受人敬重；在那野蠻粗暴的時代，有那麼多純潔溫良的聖女、聖婦，其中有王后也有平民，有普通教友也有修女，實為驚人的特殊現象⁴。

聖教會與知識生活

聖教會在道德方面推行教育工作，在知識方面亦然。蠻族入侵後的幾個世紀，知識水準顯著降低，教會保存僅有的知識文化。教育沒有完全在民間絕跡，是因為神職人員在堂區、修士在修院設立學校；我們能把古拉丁文學的寶藏保存下來，也是因為修士堅苦地把古文謄寫在羊皮紙上，飾以彩色鮮豔的花紋，使我們現在還能在歐洲圖書館中欣賞它們。我們所以能知道那時期的歷史，是因為主教和修士以拉丁文記錄在年鑑上。蠻族入侵後的三世紀，文學作品中甚少有傑作，那時期的作家都是教會中人，教會以外全是空白。

聖希道（St. Isidore, 560~636，或譯依西多）在公元六〇〇至六三六年是西班牙塞爾維亞（Seville）的主教。他是一位多產的作家，創作範圍很廣，很少人有像他那樣廣博的知識，在他百科全書式的著作中，中古時代的讀者能見到以前所有的各種學問。

聖伯達（St. Bede, 672~735）是一位英國的隱修士，也是當時學識最高的人，紐曼樞機（Newman）曾稱讚他說：「伯達是本篤會的英華，就如聖道茂（St. Thomas Aquinas, 約1225~1274，或譯多瑪斯阿奎納）是道明會的英華一樣。」他七歲時父母雙亡，寄養於隱修院。他自己對我們說，他一生都在隱修院中度過：「以全部精力

研讀聖經，遵守修院戒律，每日專心在聖堂中頌揚天主；他以學習、講授、寫作為樂。」他這樣生活一直到生命末刻；雖感筋疲力盡，仍不輟每日的工作，祈禱與讀書，更番輪替，直到斷氣時還誦念〈光榮頌〉……他留給我們的，不只是聖經的註解和他所講授的道理，還有天文、算術、文學、詩歌等許多著作。聖伯達的傑作是《英國教會史》，由此足以證明他是一位精確的歷史學家和偉大的作家⁵。

西方的教會藝術

西方的教會藝術，不如同時期拜占庭（Byzantine）的藝術輝煌。當時固然建立了不少的聖堂，或是因部分為木質，或是在蠻族入侵及後世的戰爭中被毀，留給我們的古蹟不多。最著名的是拉維納（Ravenna，在今日的威尼斯附近）大殿，有模仿拜占庭聖堂的富麗鑲嵌細工，還有幾座羅馬的聖殿。一般來說，此時內部的裝修比外面的建築更有價值，例如繪畫、寶石、鑲嵌的地面，包銀或古銅的作品，內部的富麗裝飾。在當時的裝飾品和其他藝術的表現中，金銀細工、精緻的手抄本等，都是各種藝術的合製品：有羅馬藝術、拜占庭藝術，還有日耳曼人帶來的一些成分，它們大概是受了波斯、印度或中國藝術的影響。

肆 教宗

教宗的權威雖然進展緩慢，卻仍不停地增長，這是任何人為制度內所未曾有的情況。伯鐸和他繼位者的權威，正如埋在地裡的一粒種子，起初無聲無息地好像死了，不久後卻長出了一棵細弱的樹幹，逐漸長大、分枝、繁盛，竟成了能抵抗風暴的大樹。

教外民族的歸化，亞略異端的消滅，都助長了教宗的影響力。拜占庭皇帝們的信德搖擺不定，不但多次袒護異端，甚至對教宗施加壓力；這樣反使西方依賴教宗的指導。何況羅馬帝國的首都羅馬，在君士坦丁堡取代以前，早已光芒四射，後來成為教宗的駐蹕地，有宗徒聖伯鐸及聖保祿的遺骸，獲得更燦爛的威望，遂成了教會最高神權的中心。

從幾位最著名教宗的歷史，更能看出教宗權威的進展。歷史曾贈以「大」(The Great)教宗「徽號的兩位教宗——聖良一世和聖國瑞——更是這方面最好的例證。

教宗聖良一世

聖良一世自公元四四〇至四六一年為教宗，他偉大的人格在第五世紀最為顯著。

我們已提過他挺身迎拒匈奴王阿提拉的大無畏精神，那只是他生命中的一段插曲而已，他已把全部的生命獻於公益，不只是為羅馬城和義大利的利益，更是為整個教會。

教宗聖良一世有高度的智慧，他的治績更達到了最高峰；他的思想及言談作風，都有領袖的氣派。他最注意的是，使聖伯鐸座位四周的教友保持合一。他對爭取聖伯鐸的繼位者——羅馬主教的權利，和保持自宗徒所接受信仰的純潔，都是無與倫比的。

他的權威，特別在爭辯降生奧蹟時，更加發揮了效能，那是當時震撼東方教會最激烈的爭辯。公元四五一年在加采東（Chalcedon）召集大公會議（有六百多位主教參加），幸賴教宗聖良一世得以正式確定降生的信條。聖良一世事先給君士坦丁堡主教寄去手札一則，將聖教會這端道理予以清晰而明確地闡明。此信在大會中一經公布，全體與會的主教一致喊出：「這是宗徒們的信仰！也是我們一致的信仰！伯鐸藉良的口發言了！」可見大公會議的主教（東方主教團絕大多數都出席了）都承認教宗以伯鐸繼承者的名義，為正道的最高監護人。

聖良一世還是一位出色的作家；有許多他講解聖經的言論和有關道理的信札留傳至今，為他贏得了教會聖師的榮銜。

教宗聖國瑞一世

國瑞一世出身羅馬望族，他由先人繼承了統治的天分；他在政府任職時，已發揮了這些才華。他感覺天主召叫時，正任職羅馬總督。他先當隱修士；公元五九〇年，羅馬的神職人員和民眾一致推選他為教宗，時年五十歲。他把在羅馬的住宅變作了隱修院，並用個人的財產建立了六座隱修院，可說度了一輩子隱修士的生活。

義大利當時的情形特別艱困，剛從哥德人入侵和驅逐他們的戰爭廢墟中掙扎起來，又被日耳曼和倫巴底人（Lombards）再次入侵所淹沒。拜占庭帝國的官吏無力驅逐侵略者，至多僅能守住幾座城市，象徵帝國還有一點兒力量，而它周圍各處都已被蠻族占領了。不幸於公元五八九年又遭逢空前的大水災，接著瘟疫流行，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

教宗目睹這種情形，憂心忡忡，在書信上說：「鄉民正瀕於餓死的邊緣，工作中斷，村鎮也成為廢墟，世界好像又重新墮入已往的沉寂！」政府既然無能為力，羅馬城的人民只好轉向教宗。於是教宗和倫巴底人交涉，他們同意休戰；他從蠻族手中贖回了俘虜，負責供給城市居民食糧，保衛他們，鼓勵他們重新拾起工作。聖國瑞毅然挑起了帝國首長拒絕接受的重擔，透露出聖座凌駕世權的先聲。在羅馬城

外，羅馬教會在義大利已擁有廣大的土地，或為捐獻，或屬遺贈，形成了「聖伯鐸的遺產」。教宗對那些土地無疑只是行使業主的權利，並未擺脫政府的法律，唯以所得的鉅額收入，維持足以擴展影響力的慈善事業。

教宗的權力雖然日增，聖國瑞卻仍忠實服從皇帝，並常叮囑教友服從。

這位當初拋棄世俗退居隱修院，並且終生對隱修院保持思鄉病的人，表現了做事的驚人能力。雖然健康不佳，卻未能減低他充沛的活力。他以羅馬主教的身份，把大部分時間貢獻給他的教友，每主日講道；還領導普世聖教會的事，不停口授信札讓祕書書寫，接見進謁的人，此外還能騰出時間從事著述，而且他的著作，常是中古時代人最愛讀的作品。

面對自稱「普世總管」的君士坦丁堡總主教，聖國瑞認為此名稱有傷羅馬教宗的特權，不惜盡力爭取羅馬主教在普世教會的領袖地位；但他個人，卻常謙遜地教人稱他為「天主的眾僕之僕」。他對神職界的流弊不停攻擊；他重整教會禮儀，蒐集古代的禮儀歌曲並加以整理，使之成為天主教專用的曲調，即所謂「國瑞調」(Gregorian Chant)，沿用至今，增添教會禮儀的優美。今日教會在禮儀和紀律的某些方面，仍按照聖國瑞的明智規定，不斷加以調整。

教宗國瑞的心火也普及教外人士身上。他是歸化英國的發起人，先前提及，義

大利一位公主名叫戴奧德鄰達（Theodelinda），嫁給倫巴底王，國瑞藉由她的影響，引導了亞略民族的歸正。

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他的健康日見惡化，已不許他再講道著書。但他在病榻上，仍廣泛通信，留心領導教會的大小事端。例如：當他在病痛中呻吟，希望離世歸天時，聽說一位主教正飽受寒冷，就連忙命人把一件非常暖和的大氅寄去給他，這真是動人的一幕！

他輾轉床褥兩年之久，多次長時間無法動彈。最終於公元六〇四年三月十二日逝世。他在最艱難的時期堅強地領導了「聖伯鐸的漁船」，後世加給他「大教宗」（The Great）的榮銜，實在當之無愧。

註釋

- 1 聖博義是創立傳教修女會的第一人，可惜日後長時期無人追隨他的作風，直到十七世紀才有人重新呼籲婦女去外方傳教。
- 2 卡西諾山隱修院在公元五八〇年為倫巴底人所毀，重建之後又被回教徒拆毀，之後又行

重建；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又於一九四四年被炸毀，所幸未殃及圖書館收藏的珍貴手抄本，但建築及歷代累積的藝術傑作，皆蕩然無存，只剩瓦礫一片。近期徹底重建，教宗保祿六世（Paul VI，在位期間 1963～1978）親往祝聖。

3 一九六四年教宗保祿六世立聖本篤為歐洲主保。

4 我們在這裡只提幾個人名就足夠了：聖女熱諾維五是巴黎的主保，她拯救巴黎免受阿提拉的蹂躪，又作了王后聖克勞帝德的朋友和克洛維王的顧問。聖婦克勞帝德（475～545）是法蘭克王克洛維的王后，她在夫王死後入隱修院度了二十年苦修的生活。聖女思嘉（St. Scholastica，卒於五四七）是聖本篤的胞妹。聖婦拉德公德（St. Radegunde, 502?～587）是一位法蘭克的王后，在普瓦泰（Poitiers）建立了一座隱修院。聖女理奧巴（卒於七八二年）是聖博義的親戚，被聖人召至日耳曼作隱修院院長。

5 除了上面兩位作家，還有：波哀丟斯（Boethius），他是最後一位在俗教友的拉丁作家，在義大利作過亞略王狄奧多里的國務員；最後狄奧多里竟將他逮捕，在獄拘禁多年而被害。公元五二五年他在獄中寫了一部名叫《安慰》的哲學著作，這部著作和他所譯的希臘哲人亞里斯多德（Aristotle）作品，對中古時代產生很大的影響。喀西約道魯（Cassiodorus）也曾任狄奧多里政府位居要職，晚年隱退進入他在義大利南部所建的隱修院，撰寫神學巨著（卒於公元五七五年左右）。法國都爾主教聖國瑞（St. Gregory of Tours）自公元五七

三至五九四年寫了一部《法蘭克民族史》。詩人文南爵（*Venantius Fortunatus*）自義大利赴法國，死於普瓦泰主教任內（公元六〇九年），曾譜寫苦難期所唱兩首美麗的聖歌 *Vexilla Regis* 和 *Pange Lingua*。

第六章 教宗與西方新帝國加洛林王朝

(七一四至八一四)

壹 教宗與加洛林王朝

分裂了三百年的西方，又在唯一的領袖——法蘭克王查理曼的領導下團結一段時期。查理曼在公元八〇〇年接受了皇帝位，這位領袖了解自己的責任，對教會擔任了保護和領導的角色，那個時期的西方教會與他是分不開的。

義大利與教宗

公元第八世紀初葉，義大利分為兩個不平等的部分，拜占庭仍統治著半島的南部，及羅馬城和拉維納城周邊的幾個地帶，伸入另一支日耳曼族——倫巴底人占領範圍中的幾個袋形地區。

這兩種勢力又加上了第三種勢力，就是教宗。教宗雖然不是一個獨立國的元首，

他的影響力卻很可觀。我們已看見聖國瑞一世在位時，教宗有多大的威望。在義大利被蹂躪、財政枯竭時，教宗因他的慈善事業無形中已成了社會的領袖；只有他有保護弱小抵抗強權壓榨的權威。

但是教宗的地位也沒有保障，羅馬時常處於被倫巴底人吞併的威脅下。一位英明的倫巴底王魯波郎（Liutprand，在位期間712~744）想統一義大利，為實現這個計畫就必須先占領羅馬城。倫巴底人雖然已信奉了天主教，但羅馬城若歸他們統治，教宗就喪失了行事自由，為此他不能忍受。另一方面拜占庭的皇帝又無力保衛羅馬，而且因他們多次干涉教會的事情，又袒護異端，致使教宗不得不希望擺脫拜占庭的保衛而另尋靠山。

教宗與法蘭克人

此時另一種勢力已在歐洲增長，就是法蘭克人。名義上法蘭克人仍受克洛維的後裔統治，實際上那些變質的公侯，即歷史上所稱「無能的國王」（Do-Nothing Kings），把他們的權柄都交給了宮中執政，這與日本封建時代天皇把大權交給貴族「碩根」（Shoguns，即將軍）相似。有一位宮中執政名叫瑪特爾（Charles Martel），曾在普瓦泰擊敗阿拉伯人，拯救了教會於回回之手，於是聲威浩大，炙手可熱；他

對教會貢獻良多，如果沒有他的支持，聖博義幾乎無法在日耳曼（德國）傳教；因此教宗很感激他。

瑪特爾的兒子「矮子丕平」（*Peppin the Short*，在位期間 751～768），最初也是宮中執政，之後繼父為王，這種和諧的交往在丕平為王時仍舊維持。賴於他的支持，聖博義得以改革滲入法國教會的弊端。

公元七五一年，丕平決意廢黜最後一位「無能的國王」，自己取而代之。但是這違反了日耳曼傳統，因為按照傳統，只有王室的後裔才能繼承大位；因此他在實行篡奪陰謀之前，想要先得到教宗的認可。於是他遣使去羅馬，向教宗匝加（*St. Zachary*，在位期間 741～752）提出了以下的問題：「誰應為一國之王？是深居王宮無所事事的呢？還是身繫國家之重的人呢？」教宗回答：「英明能幹的，比徒擁虛名而無實權的人為王更好。」於是丕平在那年，廢黜了梅洛溫王朝（*Merovingian*）的末代帝王，自立為王，聖博義並給他行了傅油禮。從此奉教國王登基時，常行傅油禮，表示其為奉教的正統帝王，以提高他在教民前的威望¹。

三年以後，倫巴底王占領了拉維納城，那是拜占庭總督在義大利的駐節地，又進而威脅羅馬城。拜占庭皇帝對這種侵略無能為力；於是教宗德範三世（*Stephen III*，在位期間 752～757）親赴法國向法蘭克王求援，他又乘機親自給丕平行了一次傅油

禮。不平答應援助而且立即實行。他以公元七五四及七五六年兩役迫使倫巴底王請和，並為預防教宗此後被敵視，把大片土地獻給了教宗和他的繼位者，使他成為獨立自主的領袖。教宗既為眾人的裁判者，理應獨立自主，不臣服於任何人。這並非出於預定的計畫，而是一種隨機應變的措施；教宗的國土從此建立，直至一八七〇年始被侵奪。這給歷代教宗招致不少的麻煩，但在當時的亂世，為保障教宗獨立，以自由行使神聖職權，無疑是唯一的辦法。

查理曼

公元七六八年不平逝世，其子查理嗣位，即史家所稱的查理曼（Charlemagne，在位期間 768～814，或譯大嘉祿）——即大查理之意，他表現了無與倫比的偉大人格。他於七七八年統一全國，又四處征討，不久就統一了全帝國，可稱功績輝煌。他是一位征服者、帝國的創建者、文學和藝術復興的發動者，在各方面他都盡了最大的努力。

查理曼於即位之初，就把父親在義大利的事業予以穩固和補充。倫巴底的新王狄第業（Didier），以武力掠奪不平獻給教宗的土地。教宗亞德一世（Adrian I，在位期間 772～795）向查理曼求援。查理曼率軍越過阿爾卑斯山，戰敗狄第業，並廢黜

其王位，將倫巴底王冠加在自己頭上，取消了倫巴底國號，將它的土地與法蘭克合併；然後將丕平獻給教宗的國土再予以追認。

這是查理曼的第一次戰役；嗣後連年出征，幾無虛歲，四十六年中出征了五十三次，創建了廣大的帝國，將高盧、義大利、日耳曼、西班牙北部逕行收入版圖。他願以信仰作為聯絡這些各個不同地區的鎖鏈，以聖洗聖事使道德和宗教歸於一致。²

他真是中古世紀天主教諸國中一位偉大的創始人。在教宗成為真實的領袖以前，他先作了大團體的核心；那也是他的信德、政治和武力的成就。他曾聲明說：「賴天主慈善的助佑，我該保護聖教會，向外抵制教外人攻擊，向內維持天主教信仰的純正。」

「地方監察使」(Missi dominici)的建立，使查理曼對自己的權柄所持的觀念實現得更為圓滿。法蘭克王派監察人員監督官吏盡職，務使其公正合理。每組派遣二人，通常是一位俗人和一位主教，這樣能代表教會和世俗的權柄。他們的權限遍及於各種事項：辦理教會事務和政府案件。他們的活動大大證明查理曼願造就一個徹底公教化的帝國。他們不只監督秩序是否良好、正義是否伸張，還留神主教和司鐸的品行，保證他們以愛德盡職，熟悉法典，以適當的方式給人民講道；一言以蔽之，要他們對教友以身作則。至於一般教友，監察員查考他們是否會念〈信經〉和〈天

主經〉、是否主日停工、是否還有異端迷信的行為等。

由此可以明瞭為何當時人們稱查理曼為「主教的熱誠監督者」了。這種神權俗權的混合使用，在大部分為教友的時代還能接受，也是中古世紀的一種特徵。幸賴他的判斷力正確，熱心誠懇，善用自己特殊的權柄。他確實大大推進了天主教文化；可惜他的繼承人不是都有同樣的智慧！

西方皇帝查理曼

當時，查理曼在整個天主教世界享有極高威望，在那些常追念羅馬偉大的心靈中，重建皇帝地位的意念也慢慢產生在查理曼身上。拜占庭皇帝雖然還繼續享有羅馬皇帝的名號，然而只是徒擁虛名。他們對義大利的影響微乎其微，對法、德等國簡直毫無影響，他們對教宗而言，與其說是支持，勿寧說是障礙。現在查理曼好似重建了羅馬帝國，因此賦予他一個與事實相符的名義不是理所當然的嗎？這也正是教宗聖良三世（St. Leo III，在位期間795~816）所想念的。

於是，這種理想在公元八〇〇年的聖誕夜就實現了。當時查理曼正在君士坦丁建造的聖伯鐸大殿祈禱，彌撒開始前教宗從寶座上下來，把一頂皇冠出其不意地加在查理曼的頭上。於是民眾齊聲吶喊說：「奧古斯都·查理，為天主所加冕，偉大

而和平的皇帝，萬歲！萬萬歲！」

查理曼時代的教會生活

當時教會的行政和前幾世紀大致相同，但堂區和神職人員都比以前更多了，主教區也增加了不少，主教每年都會巡視自己的教區。

這時，某些祭祀的禮節有所改變。最初幾世紀，只在大禮彌撒中祝聖和分送聖體。普通彌撒或念的彌撒，由第七世紀才開始舉行，到查理曼時方行普遍。這樣的彌撒，一如在大禮彌撒，教友皆兼領聖體聖血，但聖體聖餅由神父放在教友舌上是從此時開始的。

婚姻的立法也逐漸改善；關於婚姻的阻礙，查理曼時代和今日幾乎無大差別。這時的重大改變是拉丁教會的禮儀劃一。主基督親自建立七件聖事，其主要禮儀各處一樣，但施行聖事時的象徵性禮節，各地差異很大。先有不平，後是查理曼，均決心使禮儀統一起來。他們請求羅馬把拉丁禮節本送來，以便在各處傳播羅馬的慣例；法國很快就採用了，西班牙至十一世紀才採用。他們也從羅馬請來歌詠團，因此國瑞調傳遍了法、德兩國。

加洛林王朝的復興時期

查理曼有感於羅馬的高度文化，便決意在自己國家中提高教育水準，獎勵學術研究；這種風氣直到他去世後仍未衰退，因此喚起了文學和藝術的復興，即所謂的「加洛林王朝的文藝復興時期」。

他也從國外，特別從大不列顛聘來許多文人學士，因為文化在那裡比在法國保存得更為良好。最著名的是亞爾坤（Alcuin）修士，他成了查理曼言聽計從的顧問和心腹知己。他在帝國的首都亞琛（Aachen）建立了一座學院，當代許多知名之士都來學習，其中不少後來都成了主教。

他也精心增加聖經和古典名著的手抄本。為此設立了許多學校，以便學習書法和以彩色精細書法裝飾手抄本的技術；現在在西方圖書館和博物館內仍保存這些手抄本供人欣賞。

然而查理曼還願推廣學術；為此他命令一切主教座堂和隱修院，都為兒童開設學校，教他們閱讀、歌唱、算術和文法。

加洛林王朝在各方面都是繼蠻族入侵後的五個世紀中最輝煌的時期。可惜這種光明只照耀了半個世紀。隨著查理曼去世，他的事業也瓦解了，西歐又墮入暗夜長

達兩世紀之久。

貳 聶斯托里異端的傳播

在相當於丕平與查理曼時代的唐朝，基督的福音首次傳入中國。當然那是同羅馬公教已分離數世紀的教派所做的工作；不過也只是曇花一現，以後便淹沒無聞了。但它與中國宗教的歷史很有關係，我們應加以敘述。

聶斯托里異端在中亞的傳播

公元四三一年召開的厄弗所大公會議雖判聶斯托里（Nestorius）為異端而予以罰禁，但並未由此而絕跡，還在波斯（伊朗）曾盛極一時。當波斯帝國淪陷於阿拉伯回教徒手中時，聶斯托里派同戰勝者取得了妥協，最低限度在回教徒統治的初期，他們還享受著宗教自由，且在第七、八兩世紀有過非常廣泛的傳播。他們雖因降生的錯謬道理與羅馬教會分離，許多教徒卻心熱如火，亟欲傳播他們的信仰；且在隱修院中栽培了不少的傳教士。另外，中亞政治的局面對他們有利，使他們得以平安傳入；因中國唐朝皇帝為鎮壓在中亞騷擾的突厥，讓貫通歐亞大陸的大道重新開放；那是由波斯通往印度和中國的古道，商隊常由此將中國所盛產的絲綢運往歐洲。

聶斯托里的傳教士便追隨著商隊，或自行扮作商人，或乘坐商人的船隻潛入中國傳教。他們當時的一位宗主教曾有這樣的記載：「許多人只帶著一根手杖和一只行乞的布袋，梯山航海到印度和中國去傳教。」他們能講他們所要去的地方語言，甚至在每一站都能雜在民眾中，召集聽眾，宣講他們的教義。如果首次接觸順利，便在那裡安排個傳教站，附設旅店和學校。

他們傳教的成績著實驚人：他們進入印度和錫蘭，在中亞的突厥民族中得到了許多信徒。公元八世紀中葉有回紇（Uigurs）教徒在中國軍隊內充當傭兵。一〇〇七年住居蒙古南部的克烈人（Keraits）曾大批信教。同時或稍後，住在黃河河套的汪古人（Onsurs）也歸化了。極盛時，在亞洲曾擁有兩百位主教。

聶斯托里教徒在中國

明萬曆年間，一位旅客在唐故都西安道上迷路，向地方人士詢問：「是否曾有基督宗教派來當地傳教？」問得他們瞠目結舌，答以從來沒有……那是不對的，因為千年以前，正是高僧玄奘由印度取經回國後九年，有基督徒（廣義的）由西域來西安，皇帝曾予以盛禮接待，並在中國傳教兩百年之久；之後竟消失得無影無蹤，不復為人所記憶，真是咄咄怪事。

利瑪竇 (Matteo Ricci) 和其他傳教士在明末由澳門進入中國，深知關於宗教問題，除非先證明那是中國自古以來所固有的信仰，他們是來此相印證，絕不能獲得中國人的尊崇。他也曾被中國人認為強詞奪理；他竟不能指出一點兒遺跡，如一座教堂、一座隱修院或一本經卷，足以給新奉教者證明，除儒釋道外，中國曾有過其他可以令人信服的教門；根據由歐洲和印度而來的傳說，他們以為中國曾聽到過福音，但不能予以證實。直到一六二五年才偶然獲得了明證。此時在西安附近，有一座在唐朝建立的石碑（公元七八一年）出土，碑文很長，頂上有一石刻十字。碑文開始以佛教及道教的術語，陳述基督教教義大綱；然後追述該教在中國傳播經過的主要階段。公元六三六年（唐太宗貞觀中）傳入中國。大秦（即波斯）人阿羅本（Alopen）齋其經典來長安，太宗覺其教義正直合理，予以尊崇：「命房玄齡賓迎留禁中翻經」，為他建波斯寺，准他招收教徒，他們自稱景教，就是說教義光輝正大當受人景仰的意思。以後兩百年中大致和平順利，但也受過折磨反對。高宗時（在位期間 650~683）更「在各州建波斯寺，尊阿羅本為『鎮國大法主』，教化大行」，其間也遭受過佛教和道教的反對。玄宗天寶四年（公元七四五年），下詔稱「波斯經教本出大秦，其西京波斯寺宜改名大秦寺」。德宗建中二年（公元七八一年），長安大秦寺僧景淨，建「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³。

至武宗時，寵信道士歸真，「歸真侍寵，排毀釋氏，言非中國之教，盡宜除去」，武宗便命拆毀佛寺；歸真又奏「釋教既已釐革，邪法不可獨存」等語，於是皇帝下詔：「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禍亂，以文理華夏……豈可區區西方之教與抗衡哉！」並下令「寺宇拆除，僧徒（教士）還俗」，不久竟至絕跡了。

聶斯托里在中國正盛時，神職人員很多，修院是他們活動的中心。他們究竟有過多少信徒？我們無從知道；好像他們常從外僑波斯或敘利亞商人中招募新人，恐怕這是他們的弱點所在，也是消滅得那麼快的原因。

公元第九世紀時，外僑和傳教士都日益減少，因為商業已由波斯轉入阿拉伯回教徒手中去了。聶斯托里教徒的遭遇如何？因為缺乏文獻，問題無法答覆。他們轉奉了佛教嗎？或者被摩尼教徒（Manichean）吸收了？我們也不得而知。我們只知道在唐武宗的詔諭以後一世紀時，即公元九五〇年，聶斯托里的一位宗主教，從波斯派遣六位修士前往中國視察，竟連蹤跡也沒尋到。看來基督宗教首先投入中國的，不配稱為曙光，只是星星之火而已，因此不久便歸熄滅了。

註釋

1 祝聖國王的傅油禮，絕不是按照神學意義所說的「聖事」，它也不賦予國王什麼權柄。教會常遵守聖保祿的意見，堅持「所有的權柄都來自天主」（羅十三1），即使是民選的執政者也不例外。教會用傅油禮表示承認元首的合法地位，並向國民提示他是天主的代表，向元首提醒他對天主和國民的義務。

2 查理曼在日耳曼從事長期的戰爭中，為使撒克遜人就範，願同時使他們皈依天主教。在第一次出征後，有不少的戰敗兵士集體受洗，但不久他們又叛變；查理曼遂對叛變者施以嚴厲的鎮壓。這種強迫信教的方式，照當時的習慣說，雖沒什麼大不了，卻與福音的精神背道而馳，因此引起了教會人士的抗議；例如亞爾坤就曾提醒皇帝說，信仰應該是心甘情願的皈依。主教和該處所建立的隱修院卻使那裡的標準教友生活興盛了起來。

3 景教碑高二·三六公尺，寬〇·八六公尺，厚〇·二五公尺，是在西安以西一百六十華里外的塾厓出土的；以後移至西安，現在羅馬拉特朗博物館內有一石質的仿製品，與原碑一般無二。頂端刻有二龍戲珠的花紋，中刻「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九個大字，字的上面有一個十字，十字下方由蓮花和雲彩烘托。碑文一千八百字，後有幾行敘利亞文字的人名（按：敘利亞語是聶斯托里教派的祈禱用語）。碑文為波斯寺僧（修士）景淨所撰，足證其深諳中文，因其中有三四百文學詞彙，非有古文根柢者不能為之。作者以釋

道的術語說明了基督宗教正確教義；只是未清晰地陳明基督的被釘和聖死，顯然是為避免教外人的譏訕。

這個碑的發現引起了很大的騷動，不只在中國，連在歐洲所有目睹過拓本的人，莫不驚奇。這為歷史學家而言是一件重要的事蹟，證明基督宗教教義曾在七、八兩世紀在中國大肆傳播，並曾蒙朝廷優禮有加。即使反對宗教的人也不能說石碑是贗品。伏爾泰（Voltaire）硬說是耶穌會士偽造的，未免太可笑了；現在它的真實性已不容置疑。但長時間未尋獲其他足以證明聶斯托里教派人到過中國的證據，所幸十九世紀又在敦煌石室發現大批經卷，其中有一篇讚頌天主聖三聖歌的譯文，據說作者是西安人；此外還有中國唐朝聶斯托里教徒所用的許多書名。公元一九二〇年，又在北平附近發現了一座石質十字架，上頭刻著用敘利亞文寫的《聖詠》第廿四篇的句子；這也可能是聶斯托里教派的遺跡。

第七章 封建時期教會的衰頹與改革

(九至十一世紀)

壹 教會與封建制度

再入侵

查理曼帝國完全寄託在皇帝的人格與天才上，因此他一死，帝國就分崩離析，西方又陷於爭奪混亂的悲慘狀態。在內戰擾攘中，加上外族入侵的恐怖。斯拉夫人進攻日耳曼；匈奴的別支馬札爾人（Magyars）崛起於多瑙河平原，騎兵四出竄擾；地中海方面，又有來自非洲的回教徒海盜，在法國和義大利的海岸擄掠，甚且在公元八四四年入侵羅馬，搶劫聖伯鐸大殿。

然而最凶猛的侵略者為諾曼人（Normans），亦稱北蠻，那是來自今日丹麥、瑞典及挪威等地的蠻族。他們有精銳的海軍，乘坐輕捷的快艇，先攻占了各河口，然

後溯流而上，將舟拖上河岸，開始擄掠焚燒劫殺，最後滿載戰利品揚長而返。他們自第八世紀末葉就不時出沒英吉利和愛爾蘭海岸。半世紀之久，法國的每條河流都常遭受他們的光顧；搶劫燒殺，年年如此；聖堂和隱修院及其珍貴富麗的聖髑寶匣，是他們主要搶劫的對象。修士們在恐怖驚悸之下，往往只帶了聖人的聖髑逃避，聖堂修院任他們焚燒。公元八五四年，北蠻又去西班牙和葡萄牙海岸打劫；五年以後，他們穿過直布羅陀海峽去搶劫義大利。這樣的寇掠有時也遇到抵抗，不過那些王侯多忙於同室操戈，寧願以金錢賄買盜匪離境，而不願戮力禦侮。第九世紀末葉，西歐幾成渾沌世界，風俗敗壞。節錄某會議內容以見一斑：「城郭邱墟，修院焚毀，國已不國；人皆為所欲為，天主誠命、國家法律、教會規矩，均棄之如遺；強凌弱，眾暴寡，教會財產洗劫一空，簡直成了弱肉強食的世界。」

封建制度

當時政府不能捍衛人民抵抗侵略，人民就投身於地主的保護，地主也負起了保衛之責，鄉農及工人對「領主」誓許效忠；新的社會形式便在歐洲逐漸形成，即歷史上所稱的「封建制度」(Feudalism)。每人均隸屬於一個「領主」，領主又隸屬於更高的領主，所有領主在名義上仍隸屬於一個國王。每一領主區域的行政幾乎完全

獨立，不受干涉，可以自鑄錢幣，徵募軍隊，徵收賦稅，審斷訴訟，甚至因自衛而戰。可見封建是應時代需要而產生的，教會也被捲入了這種制度。當人民被侵略的怒潮所迫而自動投奔修院或主教公署請求保護時，請問能以拒絕嗎？這種保護無形中便成了封建的契約。當主教和修院託庇於一位更高、更強大的領主而受其保護時，就成了他的附庸。

在封建時期，主教和較大隱修院的院長都成了領主，他們也一如世俗領主一樣有領土，因此也得委任官吏治理；所以他們有屬員、農奴，也審理訴訟。總之，他們幾乎都是身兼教會的神長以及世俗的長官。

教會和封建社會既然如此混淆不清，自然難免有磨擦產生。可說教會影響封建社會是一種幸運，封建社會影響教會就禍亂頻仍了。

教會對封建社會的影響

在領主內仍還殘存著蠻族侵略者的勢力和粗暴。教會常設法化解他們的粗暴習俗；當然那不是一蹴即成，改善一個民族的思想習俗談何容易。

教會用她的道理去薰陶濡染，禁止一切搶掠劫奪及領主間戰爭的恐怖行為；她宣傳對自己、他人及天主當保持和平。她這樣努力感化人，並影響環繞著他們的道

德氣氛。

教會也努力感化團體。她首先試圖消弭領主間的戰爭，因為戰爭給人民帶來無數的災難和痛苦；當戰爭開始，不僅雙方戰士彼此屠殺，莊稼也遭蹂躪，農奴也被騷擾。教會為此先試圖建立「天主的和平」(Peace of God)，禁止某些階級、地方戰爭，例如不可攻擊神職人員、鄉民和貧窮人，可惜效力甚微。以後在第十和十一世紀，教會又規定了所謂「天主的休戰」(Truce of God)，禁止某些時候作戰，即每週四天，自星期三晚間至星期一早晨；每年的封齋期、將臨期及瞻禮節日。

教會雖厭惡流血，終難消弭一切私鬥；唯一有效的方法，只有增強國王的權力，方能制止或結束封建戰爭；這些和平的建立的確減少了許多爭鬥。她所建立的「騎士制度」(Chivalry)，也減少了許多殘酷的戰事。

騎士普通多是貴族出身，顧名思義，當然是一位騎馬的武士。當他成年時，由一位貴族給他行隆重的授劍禮而成為騎士。這原是一種世俗的組織，身為騎士必須先學習作戰和訓練他人作戰的技術。之後，教會把它變成了宗教性的組織，加上了宗教的觀念。

為準備接受騎士錫封禮，先該整夜祈禱默想，次日參加彌撒並領聖體；佩劍須先經過祝聖，然後受領；他當宣誓要勇敢、正直，絕不搶掠，保護窮人和孤兒寡婦，

忠於自己的誓言，為教會戰爭至死，絕不怯懦。

詩人在堡壘內朗誦敘事詩，頌揚忠於此光榮理想的騎士功績，因而在人心中灌輸了一種高貴和禮讓的觀念；這不能不歸功於教會的啟發。這種風氣盛行於中古時期。古代的文化是燦爛的，卻也是艱深難懂的。日耳曼民族的入侵，把他們堅強的毅力和粗俗的習尚帶進了西方。只有天主教為使人認識真神，才真正開啟了人文長流不竭的源泉。尊重婦女、保護弱小、對奉獻給天主的地方和人物施以恭敬優禮，都是騎士的理想。這高貴的理想，經歐洲各種文學作品加以稱頌舉揚，遂形成了綿延至今的道德文明基礎。這一切都導源於教會的影響。

封建制度對教會的威脅

教會在封建制度下不堪其擾。領主在各種情形中濫用政權和武力，漸至干擾教會的權力。以前國王在選任主教時插足干涉，現在領主也起而效尤。主教和隱修院院長的職位，因著教會的財產增加，逐漸引起了人們的覬覦；於是領主們不務選賢任能，只想委任自己的親戚心腹，甚至以金錢賄買；這種對聖事的交易稱為「西滿罪」¹。

這種陋習導致神職人員道德水準低落。許多沒有聖召而貿然接受神品的人，仍繼續他們世俗的生活。因此教會法典逐漸成為具文；甚至有不少司鐸忽視拉丁教會

數世紀以來的禁令，公然結婚。神職界道德墮落的後果，就是教會的頹廢腐敗。

羅馬教宗受俗人的干擾

連教宗也不能避免世俗權力的干擾。這時期有幾位聖善的教宗：最偉大的一位是尼閣一世（St. Nicholas I，在位期間 858～867），他在查理曼死後四十年左右登上教宗寶座，是第九世紀的榮耀，後世稱為「大教宗」。他為王侯堅強不屈，務使他們尊重聖座的權利。第九世紀末葉繼承聖伯鐸位的是當時最負盛名的學者，一位法籍隱修士日爾柏（Gerbert），他當教宗後取名思維二世（Sylvester II，在位期間 999～1003）。

除了這兩位及其他足為教會之光的教宗以外，也出了幾個玷辱聖座的人，原因就是俗權干預教宗的選舉。自古以來，羅馬的主教——教宗——均由該城的神職人員和民眾共同選舉。第十世紀時，羅馬的貴族擅行指派教宗而成了黨派相爭之鵠的；幾位經這樣指派的教宗為敵黨所廢，甚至被殘殺。六十年之久（904～962），聖座受德菲拉（Theophylactus）豪門的壓迫，竟使其家族中二人——若望十一世（John XI，在位期間 931～935）及若望十二世（John XII，在位期間 955～964）登上教宗寶座，實為此崇高職位之羞，是教宗史上最慘痛的時期。

雖然有幾位教宗穢德彰聞，不堪領袖羣倫，但出離正軌創立錯謬教義的，竟一

位也沒有；他們的公文檔案，對此都無瑕可指。這是正直史家應注意的²。

日耳曼神聖羅馬帝國

此時發生了一件極重要的事變，起初被視為一種恩遇，但為教會卻潛伏了嚴重的危機；推原禍首，即為懦弱無能的若望十二世。

昔日頒贈給查理曼的「羅馬皇帝」榮銜，在第十世紀初葉因後繼無人而消滅。不料至該世紀中葉，一位日耳曼王侯統一日耳曼全境，號稱鄂圖大帝（Otto the Great）。他深悉查理曼的故事，亦欲黃袍加身，被封為羅馬皇帝。於是啟程前往義大利，由若望十二世為之行加冕禮（公元九六二年）。他照例追認了不平和查理曼贈予教宗的土地，但對那些土地卻要索宗主權；並要求對選舉教宗保留承認的特權。假如皇帝真以教會的利益為重，這未嘗不可成為鎮壓騷擾選舉的一種緩和劑。在第十一世紀的確有幾位傑出的教宗，整理教會，如：聖良九世（St. Leo IX，在位期間1049～1054）、尼閣二世（Nicholas II，在位期間1059～1061）、歷山二世（Alexander II，在位期間1061～1073）及聖國瑞七世（St. Gregory VII，在位期間1073～1085）。如果皇帝想控制聖座，後果就不堪設想了。衝突是不能避免的，此後不久便要發生。

常言「物必先腐而後蟲生」，教會的衰落提供世俗權力干涉聖統的機會；時代

的災難、侵略、戰爭、饑饉等又從而火上澆油，遂使靈性生活的發展大打折扣。

在這種危險重重的情形之下，如果是純人為的機構，無疑必會滅亡；但是教會仍然健在。應注意她能自行改善，即教宗認清自己的責任時，常對壓迫教會的惡勢力堅強奮鬥，也相信定能成功。

貳 教會的改革運動

修道院的革新

第十世紀被稱為「鐵的世紀」，真是流弊叢生，腐敗至極；然而教會並非麻木不仁，毫無反抗。地方多次集會討論改善之道，聖善的主教也起而與賄買聖事的惡風奮鬥，整頓神職界；但決定性的動力還是起自隱修院。在這動盪腐敗的社會中，隱修院卻成了真正的世外桃源，在內可以喘息，吸一口新鮮空氣。對塵世的腐敗感覺厭惡痛心的人，幾乎都退身到曠野，度獨善其身的生活，專心祈禱補贖；其他人聞風嚮往，多有追隨芳表、請收為徒的；於是便制定規則，同他們共度團體生活；隱修院的起源大都如此。如：聖樂牧（St. Romuald，或譯羅慕鐸）於公元一〇一二年，在義大利創建「嘉瑪道力會」（Camaldoli），聖卦爾白（St. John Guibert）於公元一〇

三九年創立「瓦龍勃羅沙會」(Vallombrosa)。

克魯尼隱修院

這些隱修院的影響十分有限。然而法國布高聶的克魯尼(Cluny)隱修院卻光芒四射，遍及西歐。此院建立於公元九一〇年；當初創辦人並無意建立新規，也不想實行特別嚴厲的苦工，只願使聖本篤會規恢復其最初的純潔，特別注重禮儀，務使之盡善盡美。修士總不出離修院，全力專務內修，奉獻全部生命為侍奉天主。

克魯尼因規矩的嚴謹，得以免遭時弊侵害。院長完全由修士開會選舉，不容外力干涉；因此約兩世紀之久，所有的院長都以高尚的人格著稱，另外有四位典型聖人：即聖奧東(St. Odon，在位期間 926~943)，聖瑪業(St. Maieu，在位期間 948~994)，聖奧弟隆(St. Odilon，在位期間 994~1049)，聖休格(St. Hughes，在位期間 1049~1109)。他們都獲享高壽，這有助於他們保持長期平衡。當時的教宗和國王對他們都言聽計從。克魯尼及其附屬隱修院的特色是，不隸屬當地主教，直接隸屬教宗。另外一項特色就是：一直以來所有自稱守聖本篤會規的修院，都是各自為政，不相隸屬；反之，一切由克魯尼建立或整頓的修院，都隸屬於一位共同的上司，就是克魯尼的院長；換句話說，他們組成了一個統一的修會。這倒很有益處，因為目

標和方法一致，由於各修院的比照，可以預防怠惰。

克魯尼的聲望不久便廣泛傳開，榜樣具有傳染性；克魯尼的修士往往被請去整頓其他修院。在十二世紀初葉，隸屬克魯尼的修院已有一千多座，在法、德、義、大不列顛及西班牙等地綻放革新的光芒。

最初幾位革新教宗

侵蝕教會的病根，就是俗人對委任神職人員的僭越；要想革除這種流弊，只能等待有魄力的教宗。

十一世紀，第一位毅然著手於洗刷這個污點的教宗就是聖良九世。他帶領改革人員巡視歐洲，自萊茵河至義大利南部，到處召集會議訓令改革，將賄買職位的主教毫不留情地予以廢黜。凡他不能親往的地區，就派代表前去；這樣整個西歐都知曉聖座決心整頓教會生活，鏟除根深柢固的積弊。道路已開闢，繼任的人要繼續進行這未完成的事業。

尼閣二世的律令

教宗尼閣二世向完成改革的道路更邁進了一步。很明顯地，幾時皇帝對選舉教

宗的大權堅持不放，對神職人員道德低落的改革就不能收效。皇帝所指派的人選雖然適當，例如聖良九世，但誰能保證他們不把國家利益放在教會利益之上呢？這種僭越可能為教會帶來驚人的損害。

因此尼閣二世決心對症下藥，於一〇五九年在羅馬召開會議，會中頒布了一條律令，規定嗣後教宗只能由樞機團選舉³，不得再由皇帝或貴族提名。這道律令除附帶的小節外，至今仍然有效。

聖國瑞七世

教會自此已能自由選舉自己的領袖，但主教和司鐸仍由王公大人提名或委任，這種枷鎖仍須擺脫。這場惡戰留給聖國瑞七世去打，他真稱得上是一位最偉大的教宗。

聖國瑞七世本名希爾德勃蘭（Hildebrand），出身微賤，是一位義大利貧窮鄉民的兒子，曾在羅馬一座隸屬克魯尼的聖瑪利隱修院受教育。他有湛深明朗的品德和大無畏的精神，眼看教會這種紛亂的局面，和他所懷抱的高尚理想大相逕庭，於是銳意進行改革。他年輕時就以卓越的才能嶄露頭角，教宗已邀他襄贊中樞。聖良九世曾派他出使法國，也曾任教宗尼閣二世和歷山二世的國務卿。歷山二世駕崩後，羅馬市民一致要求他當教宗，樞機主教就接受了這要求（公元一〇七三年）。

他即位後的第一個行動就是爭取獨立自主；他遵照尼閣二世的律令，將他本人當選的消息通知日耳曼皇帝亨利四世（Henry IV，在位期間 1056～1105），而非要求他認可。他為整頓教會，希望獲得世俗首長的信賴和熱誠的合作，同他們共同致力拯救人靈的大業。他以大公無私的仁愛和拯救全人類的理想，爭取國王及其臣屬的合作，以克服各種阻礙。他說：「我們的職責是愛護罪人而痛恨他們的惡習，我們所惱恨的是罪惡，而非任何人。」

然而他所獲得的回應，不是他所期待的合作與和平，乃是一場劇烈的爭鬥。教宗起初只是按照前任的計畫，對「西滿罪」和傷風化的罪施以嚴厲的懲罰。他奮鬥了兩年之久，但一切措施均歸無效，不是報以「相應不理」，就是劇烈的反抗。

對錫封權的衝突

教宗發現一切罪惡都起源於世俗首長擅自錫封主教（即「俗人授職」，*Lay Investiture*）和司鐸。

按照封建社會的慣例，附庸欲得國王或皇帝的保護，就必須向他們宣誓效忠。宗主既接受了效忠的宣誓，就將財產封贈給他們，包括領土、房屋和村莊等；以寶劍象徵兵權，手杖象徵裁判權。他們對主教和隱修院院長的神權也逐漸如法炮製，

錫封時授以權杖和戒指，象徵他們的神權。教宗對此行徑絕不容忍，不承認國家的首長有授予聖職的權力⁴。

教宗決心非斬草除根不可。於是一〇七五年在羅馬召開的會議中頒布以下諭令：「任何神職人員不得以任何方式由俗人手中接受堂區，無論賄買或贈與，均屬非法；否則授受雙方均應開除教籍。」這道諭令附帶很清楚的聲明，說明教宗的無上神權：「只有羅馬教宗能廢黜也能赦免主教，他也可以廢立皇帝。」⁵。

日耳曼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亨利四世，起而反抗教宗；因為他經常錫封主教和修院院長，故認為這道諭令對他是嚴重的打擊。他僭越錫封權，不但能從中獲利，還可藉以炫耀他的威望，為此決心獨斷獨行，絕不退讓。教宗再度去函譴責，他公開抵拒，在伏姆斯（Worms）召集了非法主教會議（公元一〇七六年），聲言廢黜國瑞七世：「朕，奉天承運的皇帝亨利，偕同眾位主教向你曉諭：下台！下台！」

教宗面對這種狂妄的叛逆絕不讓步，否則將置身於日耳曼皇帝統治之下了。國瑞意志堅強，不怕威脅；於是一道明令，將亨利開除教籍，並解除其臣屬對他的效忠誓願。這真是歷史上破天荒的創舉。

果然效果立見：日耳曼人放棄了他，許多領主起而叛變，聲言一年之內若不獲教宗寬恕，他們就另行擁立。

坎諾薩堡

亨利四世一看真有喪失王冠的危險，不得不低頭認錯。於是在冷風砭骨的冬天，帶了少數的幾個隨從，穿越阿爾卑斯山去謁見教宗；那時教宗正在阿爾卑斯山的坎諾薩堡（Canossa，或譯嘉諾沙）休息。皇帝穿著悔罪的麻衣，赤著腳，在堡壘門外站了三天。第四日教宗為他悔罪的代表所感動，在門口接見了他，恢復了他的教籍，予以和平的親吻後，舉行了彌撒聖祭。

有些歷史學家評論，坎諾薩的真正戰敗者是教宗；在亨利四世沒拿出其他保證前，只憑幾句口頭誓言便予以赦免，實在是犯了政治上的錯誤；皇帝只以謙卑的代價，就重獲了一切利益。其實教宗並非為政治的思想所左右，他是以天主的代表行事，就如司鐸給人赦罪一樣，那是表明天主的無限仁慈，常準備寬恕痛悔的罪人。這正是聖國瑞七世的偉大之處。

聖國瑞七世去世

皇帝所獲得的寬恕，並沒有給日耳曼帶來和平。背叛亨利四世的領主們另行擁立了一位共主，可惜他於一〇八〇年被亨利戰敗而死。亨利重行統一日耳曼後，便

決心報復坎諾薩堡的恥辱，他聲言罷黜國瑞，擅立一位偽教宗，然後率兵進入羅馬，由那位偽教宗手中接受了加冕禮。國瑞七世為避免他的報復，退出羅馬，前往拿坡里以南的沙勒諾（Salerno）避難。他堅強不屈，始終為爭取教會權利而奮鬥，至死不懈。他臨危時曾說：「我愛好正義，憎恨罪惡；因此死於流亡之中。」

一位處約不屈，處順不驕的最偉大教宗，就這樣逝世了；看似被武力征服，其實是勝利者。他清除積弊的努力結出了果實，他的信念也終於實現：恢復神職人員獨身制，使教會選擇自己領袖人物的自由趨於穩定。

伏姆斯政教協約

錫封（祝聖）主教的爭執終於由「伏姆斯政教協約」（Concordat of Worms）而獲得平息，那是教宗嘉禮二世（Callistus II，在位期間 1119～1124）與皇帝亨利五世（Henry V，在位期間 1105～1125）於 1122 年共同訂立的。教會法律家對這爭執的問題深思慎慮之後，想出了一種能使雙方滿意的解決方式。在詳加分析之後，他們發現教會神職內有兩種因素：一種是精神的、一種是物質的。主教一方面是精神的領袖——宗徒的繼承人，另一方面又是俗權所贈與的領土首長。那麼，神權和俗權的錫封自當分別舉行：神權由教會授予合法的人選，俗權由宗主錫封；神權的象徵是授予權

杖和戒指，俗權的象徵是授予寶劍和手杖之類的名器。

教會自此擺脫了俗人蔘養，教宗和主教不是君王的附屬品，教會也能自由繼續由克魯尼和國瑞七世所開始的改革。教會史中最黑暗的兩個世紀便在黎明的曙光中結束了。

參 教會向北歐及東歐發展

教會活躍的最顯明證據，是她雖然在這幾個黑暗世紀中經歷了許多動盪，卻仍舊繼續她和平的進軍。北歐和東歐正是在這時期獲得了信仰的光照。

對這項偉大的事業，東西雙方的傳教士都在教宗的支持之下分擔了工作。所以在這章我們要敘述聖教會由九世紀至十一世紀發展的情形，無論工作人員屬於東方希臘教會或西方拉丁教會。

斯堪地那維亞居民歸正

住在斯堪地那維亞的民族——那些駭人的諾曼海盜，自第九至十一世紀這三百年中出沒無常，不斷到奉教國家搶劫，現在輪到他們要求受洗了。

天主教很慢地由商人，特別是由奉教的奴隸，開始傳入這些地區，不久傳教士

也試圖前去使這些民族歸正。公元八二六年，理姆斯總主教艾崩（Ebbon）帶著教宗欽使的權柄進入丹麥；三年以後，法國北部一位修士安斯卡（Anschar），率領幾位傳教士深入此異教地區，並由丹麥進入瑞典；安斯卡被祝聖為漢堡（Hamburg）主教後，又去過斯堪地那維亞幾次。在這幾位大膽開荒者的努力之下，歸化的教友並不多；只不過把那些外國商人和奴隸團聚在一起而已。在斯堪地那維亞的習俗，如同法蘭克人一樣，有君長示範，土著才肯歸正。丹麥的歸化是由國王聖哈拉（St. Harald）的率領，挪威的歸化則由國王奧拉夫（Olaf，在位期間1015～1028）帶頭。天主教傳入瑞典較慢。加奴特大帝（Canute the Great，在位期間1018～1036）所征服的王國，把英吉利、丹麥和挪威都併入版圖。他是一名熱誠的信徒，曾去羅馬朝聖，在那裡完成了道德和心靈的陶冶，歸國後努力掃除國內的異教氛圍。

冰島是由德人開教。公元一千年，冰島居民全體大會決定天主教為該島唯一的宗教。

天主教由冰島傳入格陵蘭。當時格陵蘭的氣候比較溫和，今日卻遍地冰雪。近來發掘許多聖堂和修院的遺跡，足以證明當時教堂林立。公元十二世紀初，斯堪地那維亞的全部居民都信奉了聖教。當然還殘存不少異教的習俗，以後逐漸絕跡；但那些地區已有了直屬羅馬的當地主教，且成了傳教的中心。

斯拉夫民族

來自俄羅斯的斯拉夫民族部落，在公元第三和第八世紀，占據中歐和東歐的大部分。他們驍勇善戰、厭惡權力、不願受拘束的性格，使他們在第九世紀以前，還沒有組成真正的國家；他們以打獵、捕魚、種田為生，過著半游牧的生活。希臘人對他們的褐髮和巨大身軀，感到相當驚異，也十分羨慕他們好客、誠懇的性格。

這些部落的文化水準雖然不高，但也愛好藝術，尤其酷嗜音樂。他們信奉一位至高的神明，萬物的主宰，雷電的創造者，也敬拜其他神祇，還有太陽。他們並非不思進步的民族，反之，他們很願意接納更高的文明。實際上是信奉天主教以後，才日趨文明。

住在多瑙河流域的斯拉夫人，逐漸與西方拉丁和東方希臘的教友相接觸，自查理曼時代，就有拉丁和希臘的傳教士與修士進入斯拉夫地區；但他們的歸化工作，大部分得歸功於來自拜占庭的兩位傳教士。

聖啓祿和聖默道

第一個歸化天主教的斯拉夫地區是摩拉維亞（Moravia），在今日的捷克斯拉夫

境內。公元八六二年，一位已受洗的君主名叫拉第斯勞（Ladislaus），致函給拜占庭的皇帝：「不少傳教士自義大利、日耳曼和希臘來至此地，帶來各種不同的教義，但我們斯拉夫人頭腦簡單，沒有一人能指示給我們真理究竟何在。所以請您派遣一位通曉斯拉夫語言的人來，希望他能按照常理講話。」

皇帝遂派遣了兩位出身顯貴的人擔任這項使命，即聖啟祿隱修士（St. Cyril，或譯濟利祿）。和他的哥哥聖默道主教（St. Methodius，或譯美鐸第）。他們生於薩羅尼加（Salonica），自幼常同斯拉夫人往來，通曉他們的語言；二人都曾出任國家重要職務。弟弟啟祿更聰明，是一位卓越的哲學家，通曉數國語言。二人本來都嚮往修會生活，現在全力從事被委任的工作，成為模範傳教士。

他們用心準備出征。斯拉夫沒有文字，啟祿為他們發明了一種字母以便書寫，又將一部分福音翻成了斯拉夫文。信眾對於能以本國語學習教義，講師又熟悉他們的文化，令他們感到又驚又喜。在深思熟慮之後，啟祿又將斯拉夫文應用於禮儀祈禱中。這樣一來，便招致了拉丁禮主教司鐸們的激烈反對，甚至被控為異端邪說；的確，在西方禮儀中未曾使用蠻族的語文。事聞於教宗之後，遂被召至羅馬。教宗亞德二世（Adrian II，在位期間 867~872）予以熱誠的招待，不但未加譴責，反而祝聖二人為主教；他們的聖德和對聖座的服從，使一切謠言一掃而空。可惜，數年的

勞瘁及長途跋涉，已使啟祿感覺筋疲力盡。他自知死期已不遠，就退入一座隱修院中，在門徒環繞下，死於哥哥懷抱中。臨終前再三諄囑兄長，切勿放棄他們的傳教工作。默道以教宗使節兼總主教的職權返回傳教基地，他被委任管理的教區非常廣大，幾乎包括今日的捷克和南斯拉夫。他不顧仇敵反對，繼續工作十五年；以後又被控至羅馬，且被監押，直至教宗傳令，始獲釋放。他眾多的門徒在他死後（公元八八五年），帶著他的著作和他所寫的斯拉夫文禮儀，傳入了保加利亞。

波希米亞及波蘭的歸化

波希米亞（Bohemia，在今捷克境內）的傳教工作，由啟祿兄弟二人開始，由來自德國的傳教士繼續完成，其間遭到不少劇烈的反對。文才大公（Wenceslas）受了祖母的良好天主教教育，於公元九二五年入繼大統；他全力護衛聖教，因此被弟弟殘殺篡位。但致命的血沒有白流，兇手日後悔悟，聖文才被列入聖品，且尊為本國的主保，聖教從此在波希米亞根深柢固，福音也由波希米亞傳入波蘭，傳教工作一帆風順，並於公元一〇〇〇年左右建立了教會聖統。

匈牙利歸化

此時匈牙利民族侵入中歐，他們並非斯拉夫人，乃是由東方來的遊牧民族。這個野蠻民族，由於長期的騷擾劫掠，把附近居民驅離，在多瑙河大平原上定居。傳教士雖盡力對他們宣教，但成績不佳，直到他們的國王進了教，民眾才開始相率皈依。公元九九七年，一位青年繼承大統，取名德範（Stephen，在位期間1000～1038），他已於數年前受洗，娶了一位德國奉教的公主為后。於是他全力歸化百姓，為此請來了許多本篤會會士。他們在匈牙利境內建立了大批農村，同時教授文化和信仰。全國分為十個教區，從此大行教化。德範於公元一〇三八年將全國奉獻於聖母，不久後便與世長辭。他被視為最理想的奉教國王，他的愛德和慈善至今仍膾炙人口，被尊為聖王。

俄羅斯歸化

俄羅斯的歷史自第九世紀才開始，當時斯堪地那維亞人自瑞典闖入東歐心臟，於是集合那一帶的斯拉夫人建立了一個國家，建都於基輔（Kiev）。

俄羅斯人或由於與奉教商人的接觸，或由於來自西方及拜占庭的傳教士得以認

識天主教。但在女王奧肋戛(Olga)皈依(公元九五八年)以前，教務進展得很緩慢。在這片廣袤的地區上，異教氣氛還異常濃厚；直至公元一千年左右，天主教才開始有長足地進展；主要的推進者為聖瓦拉帝米爾(Saint Vladimir，在位期間978~1015)。他是奧肋戛的孫子，起先反對天主教，即位後才看出來不信教就不能與奉教的鄰國相頡頏。相傳瓦拉帝米爾願給人民一個最高尚的宗教，遂派遣代表去各國考察他們所信奉的宗教。考察員到了德國認為他們的禮節太簡單；到了君士坦丁堡，他們一看那裡所行的禮節便驚嘆說：「我們不知道我們是到了天堂或是仍在塵世，人世間不能有再美的禮儀了。」這未免有些誇張，但卻頗具深意；表示自瓦拉帝米爾使其全國皈依後，俄羅斯人偏愛希臘禮儀。為此他與一位拜占庭公主結婚，將一切偶像銷毀，人民也成羣結隊地到河中受洗。建造聖堂也仿照東方式樣，有金碧輝煌的圓頂；主教也由拜占庭帶著希臘經典而來。他們也由保加利亞接受了聖啟祿的斯拉夫禮儀。俄羅斯人同拜占庭人一樣，愛好富麗的禮節，可說教義是藉由禮儀而非藉由宣講來傳授。

俄羅斯繫戀拜占庭，造成了嚴重的後果。俄羅斯歸化後不久，拜占庭就與羅馬正式分裂(公元一〇五四年)，俄國雖未表示背離羅馬，但無形中也演變成同樣的分裂之局。拜占庭可引以為榮的，是使這個民族信奉了基督。他們的信仰至今仍根

深柢固，致使共產無神的宣傳雖擾攘了半世紀之久，仍無法把它消滅。

大約有三世紀之久，端賴傳教士——無名英雄——不眠不休的努力，使以前只限於西歐和地中海周邊的天主教世界，向北歐和東歐發展，囊括歐洲所有民族。這種廣大無邊的傳教工作，雖大多被人忽略而無確切記載，實在是歐洲和聖教史上的重大事件。回教的侵略雖給天主教造成了嚴重損失，但在這方面的發展，卻給了她豐厚的補償，真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啊！

註釋

1 「西滿罪」之名來自《宗徒大事錄》中有關西滿術士（宗八9、24）的記載。他看見宗徒覆手可賦給聖神，遂想以金錢賄買此權。

2 教宗所享有的「不能錯誤」特恩，按照天主教道理，並非指教宗不能犯罪。教宗一如其他人，並未擺脫人性的脆弱和犯罪的可能性。當他發表個人的意見時，即關於教義的問題也可能犯錯。教宗只是以教會最高統治者和訓導者的身分發言，在信仰和倫理範圍以內，欽定某教義為當信之端或為全教會必須遵守時，始享有不能錯誤之權。

3 「樞機團」是由羅馬附近各城市的主教、羅馬城內各本堂司鐸及在羅馬負責救濟事業的六品等組合而成。他們已成了教宗在治理教會上的顧問和經常性的贊助人員。「樞機」(Cardinal)之名來自拉丁文的「樞紐」(cardo)一字，表示職位重要，他們身負教會重任，如同門樞負荷大門一樣。

4 國王或其他世俗首長不能給主教行祝聖禮，該禮常由總主教偕同其他主教舉行；只有被祝聖的主教才能有效執行神聖職務。不過總主教對他們所選擇的主教保留授權杖和戒指權，顯然也是非法僭越。其根本錯誤在於，視主教轄區和物質財產與其神聖使命不可二分。這種混淆不清的觀念，一時很難完全清除。

5 國瑞七世自稱對國君有廢立之權，今日看來不免有僭越國家政權之嫌。為明瞭這一點，當追溯到中古世紀的思想。當時西歐各國普遍信奉天主教，各民族一致承認教宗為最高的法官，共同擁護他為國君和民族的裁判者。如同今日把國際爭端訴諸聯合國一樣，毫不足奇。

6 他原名君士坦丁，啟祿是他的(修)會名，但後者更為人所熟悉。

第八章 六至十一世紀的東方教會

概觀

歐洲自君士坦丁大帝死時（公元三三七年）分裂後，東西羅馬帝國的命運向不同方向演變。當西方帝國零星淪陷於蠻族手中時，東方帝國在奮力抵抗。希臘羅馬的文化不但在東方保存不失，而且獨創一格演變成為拜占庭文化，融合希臘羅馬及亞洲文化於一爐。君士坦丁堡因為地勢險峻，又有堅固堡壘的捍衛，竟能延續千年之久，直至公元一四五三年陷於土耳其人手中始歸消滅。

自從公元四七六年西羅馬帝國皇帝被廢之後，東羅馬帝國皇帝就成了全帝國的唯一元首，而且仍舊保有君臨世界的奢望；國勢雖然衰弱，但往日光榮的威望仍震懾著周圍的外族。因此有人懷著恢復統一羅馬帝國的幻夢，就是自公元五二七至五六五年在君士坦丁堡稱帝的查士丁尼（Justinian）。他的企圖收效甚微，也只是曇花

一現而已。

公元第七世紀，一項驚人的衝擊震撼了天主教世界：因為信奉穆罕默德（Muhammad, 571~632）所創回教的阿拉伯人，發動了征服世界的戰爭，使東羅馬帝國及希臘文化遭受到滅亡的威脅；敘利亞、巴勒斯坦、埃及，甚至以後西班牙等天主教國家，均相繼淪入回教徒手中。

但一致的信仰仍維繫著東西方，東方至少在原則上仍承認羅馬教宗的權威；另一方面，使東西分裂的許多誤會因素卻也與日俱增。當時的情形已非昔比：當政令統一、「羅馬和平」尚有保障時，人能在全帝國境內自由來往，宗教與文化一致。現在的傳教士，已不能像聖保祿那樣，自亞細亞至西班牙，在地中海周邊的世界自由暢行無阻；那時宜仁（Irenaeus）雖生於敘利亞，卻能作高盧里昂城的主教，這時代已成過去。尤其自回教徒占領了南方沿海一帶及地中海的島嶼後，東西的交通已漸趨困難。

語言的分歧也是造成新困難的因素之一：在帝國統一時代，受過教育的羅馬公民都能說拉丁語或希臘語，藉由這兩種語言，能在帝國的各城市內自由來往。現在能通這兩種語言的人已逐漸減少，東西的神學家已不能互相了解彼此的著作，因此衝突也日趨尖銳。保持古文化最好的東方人，對他們所稱的「西方蠻族」甚表輕視；

此外，查理曼也造成了東西帝國在政治上的對立。

皇帝對宗教的作風更加深了這種衝突。思想精微的希臘人，對神學問題常有特殊的興趣；因此異端邪說大部分都產生於東方。君士坦丁堡的居民，對神學爭執的激動，不下於對賽車的愛好。自君士坦丁以來，皇帝們都自以為既是政治的領袖，同時也應是教會的領袖；因此在教義的爭執上也想干涉。然而皇帝想解決關於信仰的微妙問題，是侵越主教和教宗所獨享的主權，只有他們才是教會真正的領袖，和傳統的權威保護者，因此衝突自然在所難免。

另一方面，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以帝國首都的地位自豪，對羅馬教宗的至高權只是勉強接受；他們認為教宗的顯赫地位是由帝國首都的羅馬而來，並非因為他是聖伯鐸的繼位者。於是東方教會和教宗屢有衝突，甚至曾有多次決裂，不久又重行和解。但是經過了兩次嚴重的衝突，一次是宗主教佛提烏斯（Photius, 815~897），一次是宗主教塞魯來（Michel Cerularius, 1000~1059）抗拒教宗，遂於一〇五四年與羅馬正式分裂。

壹 查士丁尼時的東方教會

查士丁尼皇帝

查士丁尼在位時，東方帝國還算繁榮，他是末位偉大皇帝，本來有意輔助教會，可惜他也和大多數拜占庭皇帝一樣想控制教會，結果還是弊多於利。

查士丁尼在位的漫長歲月中，在全國各處展開驚人活動，而且躬親領導。他在豪華宮殿中度簡樸生活，飲食淡泊，每日只睡三、四個小時。他最大的嗜好是由幾位主教和修士陪伴，在宮中圖書館內消磨一段夜間時光。他即位前已與一名出身微賤的舞女德奧朵拉（Theodora）結婚；這名女子意志堅強，百折不撓，是她激起了查士丁尼皇帝的野心。

查士丁尼即位後，決心向兩項目標邁進：一是恢復羅馬帝國的完整，二是盡力與異教、猶太及異端人展開不眠不休的奮鬥，重建一致信仰。

收復失地

查士丁尼賴幾位英勇的將帥，部分實現第一項計畫，收復蠻族侵占的省分。

他先攻擊非洲北部，因為汪達爾人在那裡迫害天主教甚殘，焚燒教堂，放逐主教，並以亞略黨徒取代。查士丁尼在保障公教信仰的口號下出兵。在非洲登陸的一支軍隊，很快就將汪達爾王國推翻，並將戰敗投降的敵將押解至君士坦丁堡（公元五三四年），於是亞略黨徒在非洲的統治完全消滅。此後一世紀，北非在拜占庭統治下，頗為繁榮；天主教的傳播遠及撒哈拉。可惜一世紀之後，阿拉伯人侵入，此項進展又陷於停頓。

查士丁尼的軍隊在義大利也消滅了東哥德的王國，這項成功的確得之不易，戰爭持續了二十年，留下一片瓦礫。義大利被拜占庭統治一世紀之久，由駐在拉維納的一位太守鎮守。但在五六八年，新的一支日耳曼族——倫巴底人，也屬亞略派，又入侵義大利。

西班牙的土著民族，不堪亞略派西哥德人的迫害，向查士丁尼求援，他派遣軍隊占領了西班牙南部。

這樣一來，查士丁尼把地中海周邊的失地又劃歸拜占庭版圖，不過終未能將帝國完全統一，這種恢復的大業也未能持久。

查士丁尼與聖教會

查士丁尼在恢復信仰一致上的努力更屢遭不幸。查士丁尼和德奧朵拉二人無疑都有信德，也誠心謀求教會利益。他起初信仰公教，但因德奧朵拉袒護一性論的異端（主張耶穌基督只有天主性），查士丁尼則受了她的影響。當時皇帝的政權和教會神權之間的界限，尚未像今日這樣劃清；從君士坦丁開始，皇帝時常插手教會問題，查士丁尼較前任更甚。他不但以法律恢復國家秩序為己任，也把教會秩序攬在自己身上。他雖然原則上承認教宗的權威，卻不斷在委任主教和廢黜主教上染指。他自負明瞭神學，竟以個人權力裁定道德問題，干涉教會領導權。甚至如果有人膽敢反對他的裁決，無論地位多麼崇高，也視為叛逆。這樣的冒昧，自然與教宗產生衝突。他的狂妄駭人聽聞：一位自負衛護信仰的奉教皇帝，竟聲言罷黜、放逐教宗聖維理（St. Silverius，在位期間 536～537），甚至使他貧困地死於流放之地。他對教宗維奇（Vigilius，在位期間 537～555）及其他拒絕姑息他的教宗，也同樣施以無禮的待遇。

然而這些殘暴的行徑，未能如其所願，使異端人返回一致信仰，反而在宗教的爭執上埋下更惡毒的種子，使教會在查士丁尼逝世時更加紊亂。他膽大妄為的結果，

反而使西方民族與他離心離德，更加依附羅馬教宗，視教宗為信仰唯一的安全領導者。從此東西方的怨懟更加尖銳，最後竟演變成東方的裂教。

兩項不朽的功績：查士丁尼法典和聖索菲亞大殿

查士丁尼雖然對聖教會的行政犯了嚴重的錯誤，但在歷史上卻名垂不朽，特別是在立法上的成就，著名的《羅馬法典》即在他手下編輯而成¹。

就藝術方面，他對時代的重要性不亞於法律，因為在君士坦丁堡及國內其他重要城市中，不少莊嚴的教會建築，是在查士丁尼朝興建的，而且都帶有拜占庭藝術的特色；最足以表現拜占庭藝術的傑作，是君士坦丁堡的聖索菲亞大殿（Santa Sofia）。

原來君士坦丁堡在首都為聖索菲亞（Sofia，典故出自希臘智慧女神的名字，意即天主的上智）建過一座聖殿，不幸於公元五三二年毀於大火。於是查士丁尼計畫在它的遺址上，建造一座超越世界一切建築的莊嚴大殿，幾乎稱為天主的尊榮。他動員一萬名工人，從各處搜集珍貴的材料，甚至把異教廟宇的石柱拆來利用，並在五年內竣工。當查士丁尼初次邁進這聖殿時曾喊道：「撒羅滿，我勝過你了！」他確實可以引以為傲。在十四個世紀之後的今日，這座聖索菲亞大殿，仍在君士坦丁堡城市雄視一切，喚起世人的驚奇稱讚。該殿中央偉大莊嚴的圓頂，距離地面六十

五米，由四周窗戶透入的陽光，彷彿懸在天空的一頂金冠。地面閃爍著五彩繽紛的嵌鑲藝術圖案，兩行珍貴的玉柱，四周的牆壁上滿是壁畫或金底的嵌鑲傑作，處處給人富麗堂皇的印象²。

聖索菲亞大殿及同時期所建的其他聖堂，都有圓形穹窿，這不是拜占庭帝國建築所獨有的型式，西方直至十一世紀也如此採用。但在東方，這種型式卻只限於教會的建築。俄羅斯的聖堂都受到拜占庭建築的影響。

拜占庭的技師也擅長雕刻木材和象牙，製造寶石和琺瑯的作品，並繪製手抄本的微細畫。在這類的藝術上，他們實在是中古西方藝術家的老師。

貳 穆罕默德與伊斯蘭教

公元第七世紀，伊斯蘭教（即回教）由近東阿拉伯崛起，在天主教以及世界歷史上掀起了極大波瀾，即在今日，它也不失為強大的宗教勢力之一。

阿拉伯半島位於紅海、波斯灣及印度洋之間，面積等於中國的五分之一，但大部分屬沙漠不毛之地，氣候異常炎熱，只有少數生長草木的綠洲點綴周邊。

阿拉伯人與猶太人一樣同屬閃族（或稱塞姆族），自稱是亞巴郎的兒子依市瑪耳（Ismael）的後代。第六世紀紅海西岸幾座城市的居民開始經營商業和工業，但絕

大多數的人民過著遊牧生活。他們熱愛曠野的自由生活，喜愛搶劫和戰爭的擄獲品，但極痛恨以謊言或詐騙達成的偷竊，且酷愛榮耀和信用，憎惡一切羈絆束縛，愛好詩歌。這就是阿拉伯人的特性。

第六世紀，有些阿拉伯人保持一神的信仰，有的受了猶太或天主教的影響，但大多數崇拜偶像。每一部落敬禮自己的神祇和一些鬼怪精靈，善的或是惡的。在阿拉伯宗教和朝聖中心——麥加（Mecca）城中，有一個聖地名叫卡巴（Kaaba，其意為方），即一方形石屋，屋中有三百六十個民族的偶像和一塊黑石，據說那塊黑石是從天上落下的。

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在公元五七〇和五八〇年之間生於麥加，是一位宗教改革者，他將阿拉伯的多神信仰改為一神信仰，為今日世界的大宗教之一。約在他出生時，父親就去世，由一位叔伯輩的父執撫養成人。他起先過著阿拉伯人的冒險生活，隨同別人經營商業，到不少地方旅行。後在一富孀赫蒂徹（Khadijah）家中作傭工，因他面目姣好，為富孀所戀而與他結婚，且生下一女。穆氏賦性好默思獨居，自言某次在山中退思時，蒙天使加俾額爾（Gabriel）顯現，受命作阿拉（Allah）神的先知。所以伊

斯蘭教主要的信條是「除阿拉以外別無他神，而穆罕默德是祂的先知。」不久之後，他就公開宣道。這個新創的宗教要人棄絕一切的偶像崇拜，激起麥加城居民的激烈反對。他為保全性命，同自己的信徒於公元六二二年逃至麥地那城（Medina）。這次逃亡，回教徒稱為「黑蚩拉」（Hijra），成為回教的紀元。

穆罕默德決心以麥加為新宗教的中心，但除以武力攫取外別無他法。於是他建立了一支軍隊向麥加進攻，竟一舉奪下，他把卡巴方屋內所有的偶像全部搗毀，只留下那塊黑石。穆氏於公元六三二年去世，去世時阿拉伯已全部信奉回教。他的信徒謹遵他以劍傳教的遺訓，遂逐漸把阿拉伯所有部落一一征服，勒令其信奉伊斯蘭教。

關於穆罕默德的人格，至今仍是一個謎；對於他所說的「異象」，眾說紛紜：是些精神病態的結果？抑是自我暗示？莫衷一是。但至少他最初似乎深信自己受了神的指示，無意騙人，所以才毅然實現其使命。

可蘭經

回教的教義載於《可蘭經》（Koran）內。穆罕默德是文盲，不會書寫，但他天賦的口才很好，且富有詩意。當他口授那些「神示」時，門徒就立即寫在手邊的物件上，比方棕櫚樹葉、羊骨等等，或把它們牢牢地記住；在他死後加以整理，用當

時富有比喻和詩意的口語編輯成書，這就是《可蘭經》，回教徒尊之為聖經。它是宗教經典，也是國家法典。

《可蘭經》中的道理，一部分採自猶太教，一部分則採自基督宗教的一性論；基本教義是嚴格的一神論，就是信仰全能而又慈悲的唯一真神阿拉。阿拉先藉由猶太先知諾厄、亞巴郎、梅瑟（Moses）、達味等人和童貞瑪利亞的兒子耶穌教訓了人類。穆罕默德是最後也是最大的一位先知。善人來世接受天堂的賞報，惡人將受地獄酷刑。不過穆氏所描述的天堂為一座樂園，善人在其中能與永遠青春的天女結為夫婦，這種詩意濃厚兼具肉感的描寫，足以引誘庸俗的信徒。對高尚的人，他也許給了能享見阿拉的幸福。

《可蘭經》在簡明的教義外，也載有嚴格的誠命和道德：每日祈禱五次，並行規定的沐浴，每年禁食一月，即自日出至日落不得進食；禁食豬肉和發酵飲料（酒）。它也命令調濟貧窮，教徒當彼此互助；禁止姦淫，卻准許多妻制，但妻子不得超過四名，妾不在內。為宣傳伊斯蘭教，以武力攻擊不信從的人，視為宗教的一種手段，他們稱之為「聖戰」（Jihad）。為聖戰而死的人必升天堂。

伊斯蘭教的出征

在這新創的宗教中，一切都適合阿拉伯人的風俗傳統：信條簡單，道德也不嚴格；這是穆罕默德融合政治和宗教的技術。聖戰的誠命與他們好戰和劫掠的嗜好相應。基督背負十字架，伊斯蘭卻帶來戰爭。阿拉伯人以宗教的狂熱從事聖戰，騎上快馬出征；以閃電的速度組成了阿拉伯帝國。

他們最先面對的敵人是波斯和拜占庭帝國，這兩個帝國正因宗教的爭執和內戰而積弱不堪。首當其衝的是敘利亞，被圍的耶路撒冷經過長期抵抗後，終於在公元六三八年投降。穆罕默德死後十年，阿拉伯將波斯、敘利亞和埃及一一征服，國境東面展至印度；四十年後再揮軍西進占領北非。公元七一年，渡過直布羅陀海峽，兩年之間就消滅西哥德王國，占領了西班牙半島，只有少數教友逃入西北山中，未向阿拉伯人稱臣。公元七一七年他們以龐大的艦隊圍攻君士坦丁堡帝都，該城在英勇的皇帝良三世的指揮之下，頑強抵抗，使其蒙受重大損失而退。西部的一支軍隊越過庇里牛斯山，進入法蘭克中部；公元七三二年，正是穆罕默德逝世的百年，在普瓦泰城附近，與法蘭克王宮中執政瑪特爾大戰，結果戰敗，被迫退卻。這是一次決定性的戰爭，使伊斯蘭教的發展自此被遏止於庇里牛斯山之南。

戰爭的後果

凡阿拉伯人占領之地，如敘利亞、波斯、埃及以及北非等，天主教均逐漸消滅，並非全數被殺，而是因為階級降低，被迫繳納特種賦稅，亦不得任政府官職。公元第八世紀，非洲教友如不改奉回教，就被放逐，於是主教區大部分被消滅，教友的生活也漸遭窒息。

只有西班牙例外。一方面因為教友的處境不甚悲慘，一方面他們常保持被解救的希望，逃往北部的教友始終未被阿拉伯人征服。公元第九世紀，西班牙人開始所謂的「反攻」(Reconquista)，逐漸收復被侵略者所占領的失地，最重要的是爭取宗教的自由。這項收復失地的鬥爭，直至一四九二年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尋獲美洲時，始告全部成功。

然而回教的侵略對教會所造成的惡劣後果，比使她喪失奉教的國家更慘；那就是給教會樹立鐵柵，阻止她發展。自此以後，地中海以東和以南，自君士坦丁堡至西班牙，均被回教徒占領而成其勢力範圍；不但回教徒歸化甚難，天主教的傳教士也不能穿過鐵柵向非、亞二洲發展。直至十六世紀，航海技術進步，尋獲新地，始得繞過此鐵柵傳教；聖教會的傳播被阻遏了八世紀之久。

參 對敬禮聖像的爭執

自第七世紀起，東方教會漸與西方分道揚鑣。他們對截至第六世紀所傳授的信條、敬禮以及宗教的情感，皆堅持保守主義。雖然神學的爭辯多次使他們分歧而與教宗衝突，但最使他們動搖的莫過於「對敬禮聖像的爭執」，致使他們同羅馬分裂達一世紀之久。

我們都知道，梅瑟鑑於猶太人對敬拜偶像的傾向甚巨，因而禁止他們繪畫或雕刻表現天主的圖像。但教友自隱居地窟時代起，對於繪畫或雕刻足以代表耶穌基督、童貞聖母及聖人的圖像，從未有任何顧慮；他們認為藉此可以培養自己的熱心。

這種對聖像的敬禮，在東方特別發達；不但在聖堂和修院內，即使私人住室內也到處皆是。這種敬禮本身雖不違法，但未免有些過甚而近於浮濫；對教義知識不足的教友，逐漸對焚香燃蠟所敬禮的聖像，和它所代表的聖人分辨不清了。

公元七一七年，一位魯莽的將軍在君士坦丁堡即位皇帝，取名良三世，他在保衛君士坦丁堡抵抗回教徒時，曾獲得光榮的勝利。他對神學一無所知，但與前任皇帝一樣，認為自己有權處理信仰問題，一如其他政治問題。他認為敬禮聖像等於敬拜邪神偶像，一連出了幾道諭令禁止。他先禁止敬禮聖人、天神和殉道者的像，繼

而連聖母和基督的像也嚴加禁止。許多裝飾聖堂的立體像和嵌鑲的像，均被搗毀破壞。人稱反對此敬禮者為「破壞聖像者」(Iconoclasts)，信友對這種褻瀆的憤慨不難想像。君士坦丁堡宗主教提出嚴重抗議，因此觸怒皇帝而被革職。教宗國瑞二世及國瑞三世(Gregory III，在位期間731~741)也都懲罰了破壞聖像的人。一位教會尊為聖師的神學家達瑪森聖若望(St. John Damascene)，也聲明擁護聖像的敬禮，但皇帝仍不肯讓步。

在良三世之子康士丹五世(Constatius V，在位期間741~775)，對維護聖像敬禮者的迫害變本加厲：拘捕、放逐、殺戮等事件日益增多。直到女皇依來納(Irene)才將此公案結束。她徵得教宗亞德一世的同意，於公元七八七年召開尼西亚(Nicaea)第二屆大公會議。大公會議清楚解釋了敬禮聖像的真正意義，說明並非敬禮聖像本身，而敬禮其代表的聖人。它對「敬禮」(veneration)和「崇拜」(adoration)二詞也詳加分析，說明敬禮是對於聖人的行為，崇拜則只能針對天主。

敬禮聖像之爭，不幸於第九世紀死灰復燃。擁護此敬禮者為聖斯都弟德(St. Théodore Studite, 759~826)。公元八四三年重建和平、恢復聖像敬禮的又是一位婦人——皇后德奧朵拉；然而這次爭執的後果卻未能立即泯滅。東方主教大都袒護皇帝反對聖像敬禮，教宗既然衛護教會傳統，聲明這項敬禮合法，主教則心中始終懷有

芥蒂，反對羅馬的情緒日益加深，這種對立的形勢延長一世紀之久。因此日後宗主教佛提烏斯和塞魯來反叛時，在東方引起了廣大的同情，終至演變成東西的正式分裂。

肆 東方的大分裂

佛提烏斯

敬禮聖像之爭結束剛滿四年，東方與聖座的衝突不幸又起。自公元八四七年任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的依納爵（Ignatius of Constantinople, 798 ~ 877），雖道德不凡，賦性過於剛烈；指責皇帝過失，引起朝廷不滿；於是被迫退位，且遭放逐。繼位者佛提烏斯，曾任政府重職，不但出身顯貴，而且學問淵博，但當時只是一名世俗教友。皇帝認為這一點無關緊要，於是在短短數日間賦予他全部聖秩，且在公元八五八年聖誕節祝聖他為主教後，立即將其升任為宗主教。即使在君士坦丁堡，也有許多人認為這種擢升不合法；一位無聖秩的普通教友如此一步登天也與教會慣例不合，何況依納爵的被黜是否合法，尚有疑問。

當時羅馬教宗為尼閣一世，他立即採取行動：一方面聲明依納爵的廢黜為不合法，另一方面開除佛提烏斯的教籍，時在公元八六三年。佛提烏斯則散布攻擊拉丁

教會的文件，責她擅行改革，特別是對〈信經〉的修改³。他甚至在君士坦丁堡擅自召開會議（八六七年），開除教宗教籍，這是千古未有的奇聞。

雙方緊張的情勢逐漸升高；不料數星期後支持佛提烏斯的皇帝被人殘殺，兇手自立為皇帝，取名巴西略一世（Basil I，在位期間 867～886）；他將前任一切措施完全推翻，廢黜佛提烏斯，恢復了依納爵的原職。同年尼閣一世逝世，繼任教宗亞德二世（Adrian II，在位期間 867～872）在君士坦丁堡召開大公會議（公元八六九年，第八屆大公會議），恢復統一。佛提烏斯被罰，依納爵的復職經大會確認，東方主教也承認羅馬教宗的首席地位⁴。

佛提烏斯的裂教雖只延續了幾年，但後果卻存留很久。羅馬的首席權以前從無人懷疑，此次竟成問題，教宗甚至被告為改竄教義者。佛提烏斯的著作繼續傳播，竟變成羅馬仇敵的軍火製造局，他們隨時可去尋覓攻擊的武器。

塞魯來與一〇五四年的分裂

佛提烏斯去世後一百五十年左右，東西方正式出現分裂。這次分裂的主因是塞魯來的野心，他決心要作東方教宗，因此處心積慮製造不可挽救的分裂。公元一〇五三年，他全數封閉在君士坦丁堡的拉丁禮聖堂，同時致函羅馬，極盡詆毀之事。

他指責羅馬教會否認聖經，擅改基督和宗徒的道理。究竟構成他指控的罪名是什麼？是羅馬教會在彌撒中用未發酵的麵餅、星期六守大齋、准許教友吃未出血的肉、封齋期內不唱阿肋路亞等。誰也看得出來，這與道理毫無關係，只是幾項次要的外表禮規；可是拜占庭教友對此特別重視。教宗良九世希望避免破裂，為解決這些爭執的問題，派遣了一個以洪貝特樞機（Humber）為首的使節團，前往君士坦丁堡。可惜該樞機性情急躁，缺乏外交圓滑手腕，非適當人選。塞魯來為使節團傲慢的態度所激怒，鼓動民眾反對拉丁教會人員，不准使節團舉行彌撒聖祭。面對著這種敵視的態度，洪貝特和他的同伴於一〇五四年七月十四日，在唱大日課時進入聖索菲亞大殿；對宗主教的固執表示抗議後，將開除教籍的判詞放於祭臺上，出堂時將鞋上的塵土踩下大聲喊說：「願天主鑑臨，評判我輩！」

塞魯來不肯低頭，把開除教籍的詔書當眾焚毀，並為爭取東方教會領袖的同情，把樞機的措施盡力曲解，以激怒他們。他居然以基督真教會的唯一代表自居，東方的一切教會都隨他而去，裂教的局勢就此形成。此時希臘教會的傳教士正向異教的俄羅斯宣傳福音，無意間被拖入裂教集團。

東正教的命運

公元一〇五四年是教會史上最悲痛的一年；以前羅馬同拜占庭雖有分裂，但不久後都重歸於好；這次卻成了不可挽回的分裂之局。羅馬公教並非忍心讓她分裂不顧，曾為合一做過多次的嘗試。公元一二七四年，在里昂大公會議中，雙方的代表都曾在合一的宣言上簽了字，結果未能持久。一四三九年佛羅倫斯會議中也曾表現接近，但沒有下文。

東方分裂的教會自稱「東正教」(Orthodox Church)，這種稱謂已被普遍接受；也稱他們為「希臘教」，但認真地說，那只適用於東正教分裂的一部分；也有稱他們為「東方教會」的，這個名稱也不相宜，因為還有東方禮的教會，那是屬於羅馬天主教會的。

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自與羅馬分裂而獨掌整個東正教後，又因建立各國獨立的教會 (Autocephalous Churches) 而權力日減 (因為各國的教會都各自為政，不相隸屬)。於是形成了俄羅斯教會，以後又分為塞爾維亞教會、羅馬尼亞教會、保加利亞教會等。

某日教宗碧岳十一世 (Pius XI, 在位期間 1922~1939) 說：「從金礦石上剝下的

碎塊也含有金子；東方古老教會所保存的真正聖德，不但值得尊重，且值得我們同情。」東正教和羅馬公教有同樣的信條，是前七個大公會議斷定的。他們相信三位一體、聖子降生、救贖等道理；他們有七件聖事；他們的神父、主教都有妥善的聖秩；他們敬禮聖母和聖人、聖女；隱修的生活誕生於東方，曾盛極一時，現在在某些地方仍很活躍。

道理沒有多大分歧，只在講解聖神發散的方式上有些不同；主要的對立還是在東方拒絕接受教宗對全教會的首席地位。

禮制的分別只是表面，但東方教友看得比較重要，其實本身並無關宏旨。因為聖教會認為在禮節、使用語文、外表規律以及法典上，稍有不同，並不足怪。所以真正的公教徒也有隨東方禮的，有准許神職人員結婚的，但他們與羅馬忠實地聯合在一起。

實際使東正教和羅馬分離的，還是彼此的不諒解、成見和互不信任，這是由第九世紀的分裂所累積的後果。希望按照基督聖意重建統一的教會，首先努力避免不必要的對立，達成彼此間的諒解、尊重和友愛。我們知道教宗若望廿三世（John XXIII，在位期間 1958～1963）在一九六一年召開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目的之一，就是放下偏見，為承認基督是建立者和領袖的一切教會，準備合一之途。

註釋

1 羅馬人心思縝密，長於組織，對法律有特殊的天才。羅馬的法律，散見於無數律例、皇帝的詔書、敕諭以及法律家的解釋中，卻未有集大成的專書。君士坦丁王朝曾有初次的彙集合訂；狄奧多修二世（Theodosius II，在位期間 408～450）在位時，也編訂《狄奧多修法典》，將一切曾經公布的法律，從君士坦丁起，彙為一編。查士丁尼即位後，成立了一個法律委員會，將過去一切法律條文，分門別類，加以調和整理，確定了羅馬法的原則。這部浸漬了天主教精神的羅馬法典，對教會法典以及近代許多國家的法律，均有不少的影響。

2 公元一四五三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回教徒占領後，聖索菲亞大殿改為清真寺，嵌鑲的圖畫均以金色油漆塗蓋。四個尖塔於此時增建。公元一九三四年，又改為拜占庭藝術博物館，嵌鑲的美麗圖案得以重見天日。該建築內部長七十五米，寬七十一米；中央圓頂直徑三十一米。

3 佛提烏斯攻擊西方教會的主要藉口，是說她在《信經》中擅自增加「及子」（Filioque）一詞；意即「父及子共發聖神」。此詞首先在西班牙加入《尼西亞君士坦丁堡信經》中（就是現在彌撒中所念的《信經》）；查理曼在法蘭克也已仿行，在羅馬直至教宗本篤八世（Benedict VIII，在位期間 1012～1024）始行加入。東方堅持「聖神由父藉子而發」。

東西的說法雖不相同，但非不能調和。

4 依納爵死後，佛提烏斯又繼任為宗主教，且終於獲得教宗若望八世（John VIII，在位期間

872～882）的承認。但又被皇帝良六世（Leo VI，在位期間 886～912）廢黜，且遭放逐，

享年極高，在死前已回羅馬言歸於好。以前人多相信佛提烏斯曾與羅馬有過兩次分裂，

此說留傳很久，不過近代歷史學家對此說不復承認。

第九章 中古文化的全盛時代

概觀

由於羅馬帝國衰落和蠻族入侵所造成的一切動亂過去以後，新的文化逐漸醞釀而成，其中因素包含下列幾項：一、希臘羅馬文化的殘餘；二、日耳曼民族的傳統；三、滲透一切的基督宗教精神。

自第十一世紀以來，歷任教宗從事清除玷辱教會的弊端，尤其仰賴教宗國瑞七世的堅強奮鬥，終於擺脫了日耳曼皇帝的干擾，恢復了她應有的獨立自主。

聖教會從此重新奮起；中世紀的文化，在十一世紀末至十三世紀末之間達到了高峰，並實現了歷史上僅有的一種社會狀態：即歐洲的各民族，雖然保持各自獨立的政治和各種不同的習俗，卻形成了清一色的社會；聯繫他們的不是共同隸屬的國家元首，乃是共同的信仰和理想。他們都知道自己是天父的子女、耶穌基督的弟兄；

都承認教宗是基督在世的代表，連武力也得向神權低頭。教友在教宗的鼓勵下組成了十字軍，解放回教徒占領的聖地。宗教生活的強度，在和平事業上的表現比在軍事上更大，例如：創立大學、建築美輪美奐的大教堂等等，在在都顯示了宗教生活的新貌。傳教士也是在這時期第一次赴遠東傳教，且在北京（元朝的大都）建立了主教區。歐洲的新興國家，在共同信仰的聯繫和教宗的領導下，處處表現出活潑的生氣。

壹 基督宗教信仰的一致

環境

當時的環境有利於發展文化。蹂躪歐洲長達六世紀之久的蠻族入侵已經中止，無政府的狀態也隨之消失，封建制度逐漸形成，因此歐洲各民族異常興盛。確實的數字雖然無法得知（因為當時還沒有像今日的統計方式），但自第十一世紀中葉開始，歐洲居民不停增加；估計三世紀之中已增加了三倍。工業方興未艾，商業自然也隨之發展；在蠻族入侵時人多逃亡鄉野，現在城市生活活躍；不但商人多聚集城內，知識分子，建築、雕刻及金銀細工等匠人也在城市工作，扮演文化中心的聖堂、

學校和高等學府也紛紛建立。

德意志、英吉利、法蘭西、西班牙等，在此時組成了現代國家（義大利已被幾個公侯和獨立的城市所瓜分而形成割據之局，中央為教宗的領土）。這些國家有時和平相處，有時爆發戰爭，當時的歐洲似乎和十九世紀表面無多大分別。最奇特的是：戰爭多起於國王、公侯和軍隊之間的衝突，民族則甚少敵對，比如交戰國的首長從未想過囚禁敵國人民於集中營。人民在各國間皆可自由出入，毫無限制；朝聖者也可隨意往任何國家朝聖；聖伯鐸的寶座由義國人、德國人或法國人繼承，一位義籍主教掌管英國教區，或英籍主教管理法國教區，都無人驚奇。如德國教授聖雅伯（St. Albert the Great, 1206~1280），或義國教授聖道茂和聖文德（St. Bonaventure, 1221~1274），在巴黎大學教授來自英國或斯堪地那維亞的學生，是常有之事。而且拉丁文是當時知識界共通的語文，也是著述和國際外交的語文，幾乎人人都懂。在藝術領域也是一樣，建築聖堂的工程師、建築師、雕刻師以及其他技術人員等，都可自由去各國工作。歐洲民族不管國籍的分別，都有意形成一體，分享同一個文化。

信仰是合一的基礎

當時歐洲這種合一的情形，並非建築在土地、種族或語言的一致，而是因為各

民族都有一致的宗教信仰。人民團結的意識來自聖教會，教會教導他們：一切領受聖洗的人都為耶穌的寶血所救贖，同為天父的子女，大家都相信自己是基督妙身的肢體。

這種信仰是普遍的，懷疑天主的存在或對祂漠不關心的人很少，更無所謂無神論者。教友雖已受洗，也還是人，言行與信仰不符之處在所難免；習俗或行為有時也很粗野，但行為不檢的人曉得自己犯罪，也知道必須悔改才能得寬赦；甚至他們作補贖的熱情，比犯罪時的欲望更加熱烈。

信仰浸透社會和個人的全部生活。可說天主教氣氛瀰漫了整個歐洲；教堂鐘聲是日間的節奏，教會日曆也是生活指南：主日（星期日）是公共休息日（假日），節日都是紀念救主一生事蹟的紀念日，例如：耶穌聖誕、蒙難、復活及聖神降臨等；此外也有救主母親——聖母及聖人、聖女的瞻禮。

聖事

教友一生重要的階段都為「聖事」（sacrament）¹所聖化。嬰兒出生後不久就受洗，普通情況也同時領堅振，教友一年辦好幾次告解，並多次領聖體²。除了少數的特殊情形外，聽告解司鐸所給的補贖不公開，但比現在重得多；多半是長久的祈禱、

守大齋、行哀矜等；有時也命人去某地朝聖或參加十字軍。主教給那些願獻身事主的人付聖秩聖事。舉行婚禮的人應在神父面前表明雙方的同意，並接受神父祝福。最後，當人要脫離塵世時，神父給病人傅油，減輕他的神形困苦。

中古時代幾種敬禮的素描

由上所述，可知教友一生的重要階段均受到聖化，每日的生活也為祈禱所浸潤。當時念什麼經文呢？〈天主經〉和〈信經〉很早就通行了；但今日教友最愛念的敬禮聖母經文，如：〈聖母經〉和〈又聖母經〉（舊稱「恭賀母皇」）等，也是當時所流行的。這足以證明中古世紀已熱心敬禮聖母了。

聖人聖女的敬禮也已通行，教友愛讀他們美妙的傳記，請他們在天主臺前代禱，奉他們為模範、衛護者，將他們的聖像雕刻在石頭上，或製成彩色玻璃以為聖堂的裝飾；此外對他們的遺骸也特別敬禮，每年在指定的日期或天災流行時，把聖髑抬出遊行、祈求消災。

中古世紀的信友無疑是傾向信仰，相信聖人行傳上所記載的奇蹟，不需要近代歷史學家所要求的證明，以致在敬禮聖人遺骸上往往摻雜迷信色彩；甚至有人為獲得珍貴的遺骸，不惜採取不正當的手段，連隱修士也難免，甚至假造遺骸獲利！聖

教會有時必須起而糾正，敬禮本身倒無可厚非，只是提醒他們勿忘基督才是一切聖德的完美模範和根源。

關於這一點，十二和十三世紀與以前不同，那時，教友比較注意救主的天主性，大概因為亞略異端只看耶穌為受造的人，因此教友特別尊敬祂的天主性。中古世紀特別瞻仰降生成人的天主——臥於馬槽中的聖嬰，以及為世人受苦受難的事蹟。聖方濟（St. Francis of Assisi）也是在這時期發起聖誕節布置馬槽的習俗，現今各處已普遍仿行。

中古世紀的教友，感覺在聖堂內如同在家中一樣，主日和瞻禮日喜歡在那裡消磨很長的時間。在廣闊的聖堂穹窿下，彩色的玻璃映著美麗的陽光，禮節莊嚴、祭衣富麗、音樂和諧、合唱韻致，在在都吸引他們的心靈；何況此時既無報紙，又無收音機和電影等消遣，因此很能專心聽講。講道員或講解聖經，或闡釋當日慶祝的事蹟，有時為使道德講勸更清晰動人，會添加比喻或有趣的故事，聽眾也可當場提出問題，要求解答，無怪乎他們能靜聽兩小時而不感厭煩。不只在教堂中講道，在公共聚會、市集廣場及婚喪筵席上，也常有人講道。

此外，在各種不同的時日，尤其是聖誕和復活兩大節日，有時會在聖堂表演聖經事蹟；演員都是司鐸或其他神職人員，穿著稍加修改的聖禮服，表演牧童和賢士

朝拜耶穌聖嬰、受難悲劇或復活的清早聖婦前往聖墓等故事。開始先念幾節聖經，隨後用方言代替拉丁文加以發揮，因此這類表演就像禮儀的延續一樣。戲劇表演不在聖堂內舉行，而是在外面表演；情節不限於聖經的記載，也穿插上一些聖人行實和擬想的動人情節。這項習俗在中古世紀末期演變成宗教性的戲劇。

朝聖

還有另外一種信仰的表現，在中世紀教友生活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就是朝聖。最初幾世紀，有大批旅客赴羅馬宗徒墓前祈禱，或前往巴勒斯坦朝見救主誕生死亡的聖地；蠻族入侵的戰亂，並未使此熱潮完全中止；戰亂稍停以後，往來朝聖者就更加頻繁了。究竟為什麼舉行這種朝聖呢？都是為了向天主請求某種恩惠，例如：請求病癒、赦宥某種罪過、實行神父所加的補償、單純為了表現信德、讚美榮耀天主和祂的聖人，或為了修德立功而去羅馬、耶路撒冷、西班牙的聖地牙哥（Santiago de Compostela，據傳聖雅格宗徒的墳墓在此），或去某處聖母堂。那些旅程的確遙遠且危險重重，從巴黎至羅馬往返需八個月，去耶路撒冷則需三年；然而朝聖者絡繹不絕。單去聖地牙哥的人每年就有三十萬；一三〇〇年教宗博義八世（Boniface VIII. 在位期間 1294～1303）建立聖年大赦時，赴羅馬朝聖者一年竟達二百萬人。

勞工神聖

教會精神已滲入教友的整個生活；工作為他不僅是掙得衣食不可或缺的方法，而且是對團體的一種義務，也是聖善的活動和立功的泉源。農人耕田，工人打鐵、鋸木、製革，都是行善立功，準備升天，對勞工的輕視已成過去。聖教會不斷重複著聖保祿的話：「誰不工作，就不配吃飯。」她也常把木匠大聖若瑟和「工匠之子」納匝肋人耶穌作為勞工的表率。同業組合制定生產的情形和工資，同時也是互助機構，以救助生病和年老的工人，它也是各種善會。每種善會有它自己的主保，特敬主保的祭臺和節日，會員參與彌撒和聚餐加以慶祝；它也照顧會員的喪事並為亡者祈禱，主日瞻禮必須停止工作；這樣每個工人一年約有一百來天的假日。

基督愛德的具體表現

中古世紀慈善事業的盛行，也是由於信德的啟示。政府對鰥寡孤獨以及窮困的國民，始終不認為自己有何責任。中古時期的天災人禍的確不少，譬如：戰爭、瘟疫、饑荒層出不窮，救濟受災的組織也應運而生。

在農村，辦理這種事業的是本堂神父和隱修院，每座修院都附設收容病人的醫

院，和行旅及朝聖者的招待所。在城中則有時是主教，有時是修會，有時是一位公侯或富有的教友創立醫院。專門在醫院照料病人的修會也在此時創立，他們侍奉天主的方式就是在基督受苦的弟兄身上侍奉祂。

一種西方前所未有的病症——癲瘋，也在此時流行起來，由十字軍和朝拜聖地的人從近東傳染而來。人對染上這種病的可憐人並不會放棄不管，甚至有身為國王或王后的以身作則，如：法國國王聖路易（St. Louis，在位期間 1226~1270）、匈牙利王后聖麗莎（St. Elisabeth）都曾親手服侍癲瘋病患。為了避免傳染他人，他們把這些病患隔離在癲瘋病院內，有會士犧牲終身，在院內照顧他們。在法蘭西一國，十三世紀就有二千人染上癲瘋。因為採取了種種防預措施，癲瘋病在中古世紀末葉就在歐洲絕跡。

此時最足以表現教會驚人愛德的就是專為贖虜而創立的修會。在西班牙、亞洲，尤其是非洲，許多教友成了回回或戰爭的俘虜，多半是回教徒海盜在劫掠地中海沿岸時被抓去的俘虜，在市場轉賣為奴。為幫助他們重獲自由，有一位巴黎大學的教授名叫若望瑪達（John of Matha），創立了一個「天主聖三會」（Trinitarians）；還有一個相仿的修會名叫「聖母贖虜會」（Mercedarians），由兩位西班牙人創立：聖諾拉斯高（St. Peter Nolasco）和聖雷孟（St. Raymond of Penyafort）。聖母贖虜會的會士，

不僅募捐贖虜，還親赴回教地區救助教友；如果教友有叛教危險，他們就在天主臺前許願去作人質，把被虜的教友贖回來。在這修會最初的會士中，有一位名叫聖諾納德（St. Raymond Nonnatus），因他百折不撓的信德最為著名。阿爾及利亞總督曾以燒紅的鐵將他的嘴唇穿透，鎖以鋼鎖。在三世紀中，曾有六十萬教友被贖回。

這樣一來，何處有需要救助的災難，就有教會人士在那裡活動工作。教會的收入也很可觀，除了教友捐獻所得的十分之一以外，還有自動的捐獻和遺贈；但這些財產不只是為了維持神職人員的生活和敬禮的花費，那時教會還負起了公共救濟事業和教育的重責大任，現今這些花費占著政府大部分預算，由國民納稅加以擔負。然而那時，這樣廣泛的慈善事業，並非由關心民瘼的政府以預算規定，乃是福音精神使信友視受苦者為基督弟兄，而踴躍捐獻。許多修會會士更拋棄家鄉，完全獻身服侍病人、癲瘋患者和俘虜。

貳 修會

教會活力最顯著的標誌，就是在每一時期必有新型修會生活出現；常有聖人起而給福音全德的理想一種適合當時需要的形式。在中古世紀，改革和創立修會者風起雲湧，除了已提過致力慈善事業和贖虜的修會，其他無法一一詳述，只把教會影

響最深而至今仍感人的聖人，介紹幾位。例如：十二世紀的聖博諾（St. Bruno, 1030~1101，或譯布路諾）、聖納德（St. Bernard of Clairvaux, 1090~1153，或譯伯爾納鐸）和聖諾博（St. Norbert of Xanten, 1080~1134，或譯諾伯多），以及十三世紀創立托鉢修會的聖道明（St. Dominic, 1170~1221）和聖方濟。

聖博諾

此時有不少人嚮往曠野，以度祈禱和補贖的生活；聖博諾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位德國人，在理姆斯教書，他對總主教的慳吝很憂傷，因為這使他對改善時局的努力付諸流水；於是他決意退入曠野，在隸屬法國的阿爾卑斯山尋獲一個僻靜的地方名叫嘉都西（Chartreuse），此即嘉都西修會（Order of Carthusians）之名的由來。公元一〇八四年，他在那建立了第一座隱修院，會規的特點是結合了獨修生活與團體生活。會士的全部時間都在獨居中消磨，謹守最嚴格的靜默，在環繞小園子的隔離斗室祈禱、讀書、做手工；他們一天只有兩次在聖堂內會面，為參與彌撒和誦念夜課經，共同散心的時候很少。聖博諾留居此修院為時不久，因他被教宗召去羅馬，在義大利南部建立了另一座修院，最後歿於該院。嘉都西修會在他死後很興盛，遵守同樣嚴厲的會規，至今仍保持最初的熱心。

聖納德與熙篤會

克魯尼的修士在第十和十一世紀的教會改革中，曾擔任十分重要的角色，但後來也陷於鬆弛，原因在於財富太多。修士雖發神貧聖願，但時間一久，修院的財產日積月累，過於富有了；在侍奉天主的事上既然無所謂太好，於是聖堂便建造得格外華美；教友的捐獻和遺贈源源而來，土地也隨之擴大起來。修會的精神和謙遜自然不免蒙受損失，因此很多有志之士，開始嚮往更貧窮、嚴厲和更接近本篤會原始的生活。於是某克魯尼修院的院長聖羅伯特（St. Robert of Molesme）離開了他的修院，公元一〇九八年，在勃根第省（Burgundy）熙篤地方（Citeaux）另建一座修院，目的在於恢復聖本篤會規的原始純潔：修院只能保有修士自耕的土地，而且手工業也在修士的生活中重新取得重要地位；修士的衣服除一件白羊毛長袍外別無長物。熙篤會（Cistercians）的一切都顯得貧寒，連敬禮天主的物品也不例外；土地澆薄，修士雖拚命工作，收穫也不豐，飲食自然淡泊，不吃魚肉、雞蛋，只吃無鹽、無油的青菜和黑麵包，半夜起身詠唱夜課。

這樣嚴厲的生活自然不能吸引多人入會，創始者見後繼無人，未免有些苦惱氣餒。公元一一一二年，忽然有三十人前來叩門，心熱如焚地願意加入他們的行列，

為首的一位青年騎士容貌俊美、學問深湛，而且舉止嫺雅，那就是年方廿一歲的納德。他於公元一〇九〇年生於第戎（Dijon），立志棄俗精修，在很短的時日內就說服了五位同胞弟兄和許多親戚朋友跟從他，足以表現他感化人的天才。

納德選擇熙篤修院的理由，是因為它特別注意貧窮，嚴格遵守本篤會規。他對於修會的生活非常熱烈而認真，以致三年之後，雖然年紀尚輕，身體也孱弱多病，長上卻毫不遲疑地委任他率領十二名會士到明谷（Clairvaux）建立新會院，他畢生掌理該院，鞠躬盡瘁。他在會規所定的苦工嚴齋外，又自動加工刻苦，致使健康衰退，幾至任何食物都不能下嚥，一生與病魔搏鬥；然而在他孱弱的軀殼內卻蘊藏一顆熾愛天主的心靈，終其一生保持在一切困乏中的毅力，並展現令人難以置信的活力。

新會院熱心的名聲很快傳開，吸引許多新會士，發展異常迅速；截至聖納德去世時，已有會士七百人，建立了六十八座修院。

修院更樂於建立在澆漓不毛之地，北歐許多沼澤荒涼的地區經過熙篤會士世紀的開墾灌溉，已成為肥沃的良田。

熙篤會又創立了一種新的管理制度，即最高權威不在熙篤院長而在「大會」，各院院長每年開大會共同商討會中事宜。這種制度是預防鬆弛的最好辦法，自此以後所創立的一切修會，幾乎都採用這種制度。

聖納德——教會棟梁

聖納德對管理明谷修院所費的心，連隱修生活最微末的細節也親身去管理，再加上他為領導熙篤修會所擔任的角色，足以使一個常人的精力消耗殆盡。但他一心所注意的，是作一位普通修士和努力聖化自己；他最怕出離修院的緣故，就是不能全心專務神修和祈禱。然而他的影響力卻超越了熙篤會以外的人事物。三十年之久，這位隱修士因他特殊偉大的人格，實際上成了奉教各國的領袖。他雖盡力隱晦，人們卻在一切重大事上向他請教，教會和國家的領導階層對這位簡樸修士的精神也都低頭致敬，原因在於他是一位聖人，他整個人都散發著聖德的光輝。與他同時期的人曾說：「當他講道時，他那因勞碌和守齋而消瘦的臉，蒼白的顏色和他的顧盼，都好似已經出神入化，處處使人感動，他的外表就足已把聽眾說服，無需再開口講話。」他超凡聖德的光輝成了「教會的棟梁」，在有關天主利益的爭執中，他是無可比擬的仲裁者，不只是最卓越神哲學家的裁判，也是教會統一的恢復者，以及教宗和皇帝的中間人。他登高一呼，保衛聖地的軍隊就組織起來。

聖納德為人謀求幸福的熱誠不厭不倦，他的感情忠貞不渝；他常憐憫人的困苦，但如果認為有幫助，他也會發怒。當他發覺高級神長不忠於職守時，就會提醒他們

勿忘自己的責任，有時態度非常堅決。他也曾指責許多神職人員，甚至教誨幾座隱修院的修士生活奢侈；他的指責反應極佳，使不少人改過自新。有些法國主教與國王發生衝突，對國王侵犯教會的權利提出嚴重抗議，聖人也對他們深表同情。

公元一一三〇年，發生一件嚴重的事端，幾乎使教會分裂：就是樞機主教團分成了兩派，相繼選出兩位教宗，即諾森二世（Innocent II，在位期間1130～1143），和克雷二世（Anacletus II，在位期間1130～1138）。兩次選舉都不完全合法，於是主教、君王和教友都陷於混亂，無所適從。究竟哪一位合法？聚訟紛紜，莫衷一是。乃召集會議以謀解決之道，於是聖人被召前往參加，儼然是一位天主所派的代表。他看出來諾森最沒有野心，又是最先被選出的，於是聖納德便對他表示擁護，大會也贊成他的意見，然而克雷與同黨卻不肯讓步。聖納德為勸人擁戴諾森二世避免分裂，在歐洲奔走了八年；他先使法國人表示擁護，又在英王、德皇及義大利各城間往返磋商。直至教會回復和平，納德始返回明谷修院。

公元一一四四年，法王路易七世（Louis VII，在位期間1137～1180）欲前往援救十字軍第一次出征後所建立的東方拉丁國，教宗委任納德宣傳十字軍。他走遍了法、德兩國各城各省，熱烈講勸，鼓起了人民的熱情。次年組織了兩支軍隊，由法王和德皇分別率領啟程；但二人彼此嫉妒，未能配合作戰，結果完全失敗。

此時納德又前去法國南部，勸化異端人歸正。公元一一五三年春，他筋疲力竭，但仍勉力出發為人調停紛爭；不料回至明谷修院後即與世長辭。時為公元一一五三年八月二十日，享年六十有三。

聖納德對中古世紀神修生活的影響

聖納德在工作和四方奔走的百忙之中，仍找到時間指導向他請教問題的人，回答各方來信，編寫神修著作，並記錄他膾炙人口的釋經講詞。他雖是一名普通修士，但應昔日門徒教宗恩仁三世（Eugene III，在位期間 1145～1153）之請，給他寫了一本書，爽直提醒他勿忘其所負的重任：……許多教宗都拿它作為生活的指南，予以珍視。

納德對職責雖不稍寬假，但從未表現鐵面無私的嚴厲；他有詩人的心靈，他豐富的感情在他著作中處處表現溫柔可愛，對基督的人性顯示細膩的熱情。降生的天主為他不但是應當效法的模範導師，也是靈魂的朋友和淨配。他描寫了純潔的靈魂，與天主契合無間的神祕情形。納德並不以抽象理論培養自己的熱心。他曾聲明說：「我最高的哲學是認識耶穌，且是被釘的耶穌。」他最愛瞻仰救主紆尊降貴、感動人心的兩個生活時期：一是躺在馬槽中變成卑小嬰兒的天主，一是死在十字架上的救主。他對救主之母的熱情也是同樣細膩：他以滔滔不絕的美妙言詞，讚美稱頌她

為罪人之託、仁慈之母、基督和教會之間的中保。聖納德指引人的熱心朝向新的方向，教友隨其指引，在默觀救主的人性和言行上，獲得滋養熱心的食糧，而且為各種人都很適宜。

在聖納德身上，身體的病弱和靈魂的活力，最繁忙的工作和最高度的神修生活，竟能微妙融合無間，這位聖人真是中古世紀的一顆明星。

一種新型的修會生活：托鉢修會

歐洲的封建社會在十二世紀產生了重大變化：以前生活的經濟全靠農業，所謂「富人」就是擁有廣大的土地者，生活依靠田地出產。現在城市大增而且日益發展，銀錢流通，商賈日富；東方的各種奢侈品都能以金錢獲致。神職人員甚至隱修院修士也逐漸富裕，因此更加强了貧富之間的距離，引起嫉妒和仇視。但對於耶穌親自訓示的貧窮之情，卻更加嚮往：就是拋棄世間一切財富，全心依恃天主的照顧，像天上的飛鳥、田野間的花朵一般生活。許多教友被這種理想所吸引，果真沿門求乞，巡迴講道；可惜好多人矯枉過正，以致陷於異端邪說。

應付新時代需要新方式，聖道明和聖方濟同時給世界帶來了新的方式。直到那時，典型的修會生活還是聖本篤所建立的隱修生活：修院多建築在野外，修士在院

內祈禱工作，主要的目標是成己；出外講道只是偶發的例外事件。新興的修會雖然度的還是公共生活，也在聖堂中公誦日課，但出外傳教和教書卻占去他們生活的主要部分。此外他們還發願遵守絕對的神貧，不但個人，連修院也不得擁有財產。修院也多建在城內，生活無隔宿之糧，因此這種修會稱為「托鉢修會」(Mendicant Orders)。

聖道明

公元一二〇五年某日，教宗諾森三世 (Innocent III，在位期間 1198~1216) 來到西班牙，一個名叫奧斯瑪 (Osma) 的小教區主教前去晉謁教宗。主教身邊有一位三十五歲的青年名叫道明，學識豐富、德行出眾，是主教親選的助手。他們自丹麥回國以後，聽說東歐有一個民族還未奉教，就想前去宣傳福音。教宗不准，認為在當前奉教國中有更迫切的任務：義大利北部與法國南部有來自東方的卡達爾異端 (Cathar)，勢甚猖獗，威脅教會 (詳見第九章第捌節)，應當先去遏止。他們在法國南部巡視了一遭，發現異端猖獗的主要原因是教友和神職人員的無知。為救治這種病根，教宗派遣使節團帶領熙篤會修士前去講道，無奈收效甚微，而深感氣餒。道明一看就明瞭癥結所在：使節團都是高車駟馬，成羣的扈從前呼後擁，未免太顯威風。有人以為按照當時的風氣，這為教宗使節的身分是不可缺少的。反觀那些異

端宣傳者，卻是徒步往來、衣著襤褸，托鉢乞討度生。兩相對照，誰更符合福音的精神，不言而喻。所以為杜絕異端人之口，必須自行檢討，效法基督和宗徒的作風。奧斯瑪主教以身示範，將隨從人員全數遣歸，只留道明一人。可惜主教不久便去世。道明為展開工作，創立一個「傳道會」(Preachers)；公元一二一五年在土魯斯(Toulouse)建立第一座會院，隨即獲得諾森三世的批准。從此修會進展甚速；道明也不辭勞瘁地巡視各修院，監督會士保持神貧和熱心精神。他大展長才，發揮驚人的德行：一方面常透露由衷喜悅的笑容，對各種人表示毫不歧視的同情，但另一方面，當他看清目的後就極其堅強，一下決心，不達目的絕不停止，絕不為任何困難所屈服。對他的修會，他也計畫堅實的組織，自成立以來甚少變更。會長皆由會士選舉產生，任期有定。該修會分為若干會省，各省有省會長。他們以埋首攻讀代替手工，藉以儲備教育和講道的人才。該修會進展神速，會祖道明去世之年(公元一二二一年)，在歐洲已有八個會省；一三〇三年已有五百五十七座會院，會士一萬餘人。

基督的一幀活像——聖方濟

方濟生於一一八二年，小道明十二歲。他是義大利中部小城亞西西一位富商之

子，自幼喜愛揮霍嬉戲，好鬥毆而不喜讀書。但在被俘和患病之後，內心產生了重大的變化，改變他對人生的觀念，開始尋思自己的前途。遇見癡瘋患者就前去服侍，看見圯毀的聖堂，就親手修復。一日在彌撒中聽見恭念福音，耶穌派遣門徒講道時說了以下幾句話：「你們不要在腰帶裡備下金、銀、銅錢；路上不要帶口袋，也不要帶兩件內衣，也不要穿鞋，也不要帶棍杖……」（瑪十9-10）這是他的一線光明，他計畫要逐字實行這福音的教訓；他和自己的同伴一起實踐貧窮、刻苦和拋棄一切的快樂；為救助自己的急需而去行乞；以方言給卑賤的人宣講福音；無處投宿時，就席地而眠；隨遇而安，時常讚頌天主。

不久之後，有人請他收為門徒；方濟因此請求教宗批准這種生活方式。一二一〇年的某一日，教宗諾森三世看見這位身體衰弱、眼光熠熠的青年來到自己面前，穿著一件粗布帶風帽的長衫（那是當時鄉下人的常服），腰間束著一條繩子，赤著腳；還有十二位和他同樣裝束的同伴。

這幾位看似流浪的人未曾讀過神學竟希望講道，沒有獲得教宗參謀人員的青睞。他們說：「聖教會歷來的確非常愛護窮人，不過當看事實的真相；義大利和法國正有這種異端散播邪說，他們到處乞討，濫用宣道的權利來欺騙人民。」諾森三世對此並非不知，但他也曉得教會需要改革，對抗異端，以前的方式已嫌不夠；他被方

濟的謙遜、服從打動了，再加上前一夜夢見特拉朗大殿搖搖欲墜，有一個像聖方濟那樣裝束的人上前以肩抵住牆壁，將它豎起而沒有倒塌。方濟難道不是天主派來扶持被貪財、異端侵蝕而動搖的教會人士嗎？於是教宗批准了方濟的會規。方濟名之為「小兄弟」(Friars Minor)的修會，就這樣誕生了。

這些最初的方濟會士同他們的會祖，對自己的興奮和對世物毫無掛慮的自由，感到不可言傳的喜樂。他們兩位一組，一邊乞討、一邊宣講痛悔補贖，散布著友愛的喜樂和平。凡願意侍奉天主者，無論是神父或普通教友，都可進入這個修會，會士不繫戀富厚的會院，針對當時的需要，無憂無慮地到處往來，因此會士日增月盛。

但聖方濟所衷心熱望的，是給外教人宣傳福音，於是在一二一九年啟程往赴東方。當他不在時，弟兄們起了爭論，這令他們的會祖非常痛心。因為有不少會士認為方濟對貧窮的理想太嚴；當初人少，實行尚不困難，現在散居各國的已有數千人，這種理想是否還適宜？也需要有正式的會規、組織和讀書的處所呀！方濟返回義大利，於一二二一年制定了會規。伍高理諾(Ugolino)樞機(以後作了教宗，取名國瑞九世〔Gregory IX，在位期間1227~1241〕)對方濟始終愛護有加，這次幫助他制定了會規。但方濟對他放寬貧窮的主張很難過；他看不出來有減輕貧窮的必要，因而懷疑這是否為耶穌聖意；然而他終於在教宗的代表前表示低頭了。因為他英豪的

服從，方濟才得以成功地改革教會而沒有引起反抗。

他於筋疲力竭自認不能繼續領導修會時，辭去了總會長的職務，並因謙遜之故，始終不敢接受司鐸的秩位。他於一二二四年臥病不支，退居亞味諾山（Alvernia）的曠野。一日，他在祈禱中出神，忽有一位色辣芬天使（Seraphim），藉苦像的形狀來到他跟前；他從出神中恢復正常後，發現兩手、兩腳和肋旁印上了耶穌被釘的五傷，至死未滅。他雖異常痛苦，但仍利用殘喘生命百般讚頌天主；從他口中湧出的詩歌，邀請一切受造物同他一齊頌揚天主。他於一二二六年逝世，兩年以後，被他以前的保護人教宗國瑞九世列入聖品。

他所立的修會有驚人的進展，在十三世紀末葉歐洲已有八千會院，會士二十餘萬。然而，同時內部慘遭分裂；總會長聖文德雖然安撫有方，但終未能阻止分裂為二：一派仍保持嚴格的貧窮，另一派則趨於緩和。

第三會

聖道明為女性創立了道明修女會，聖方濟也創立了聖佳蘭隱修會（Order of St. Clare）。佳蘭之名來自她們的第一任總會長聖女佳蘭（St. Clare），她是亞西西的一位富家女子，因在亞西西主教座堂聽見聖方濟講論天主，而決心拋棄一切，為在貧

窮中尋獲天主。

然而不是人人都能進入修會。因此方濟和道明都為嚮往全德的教友建立了「第三會」(Third Order)。凡參加第三會的人，無論結婚與否，都在會士領導下努力實踐修會理想，遵守一種適合自己身分的規矩。十三世紀時的第三會，在奉教社會的各階層，下自最平凡的老百姓，上至王后鉅公，都有廣泛的發展；如法國國王聖路易和匈牙利皇后聖麗莎，都是方濟第三會會員。

參 教會與政權

聖教會在黑暗時代對文化帶來卓越貢獻：統一信仰、王侯服從教權，這一切在中古世紀，都有助建立教會和政權之間最緊密的關係。這種局勢為教會的自由不免危險重重。第十世紀時教會為政權控制，幸賴國瑞七世的毅力始得脫險；伏姆斯協定雖結束了錫封的爭執，但三十年後，教宗與皇帝之間的鬥爭又起。不過，這次鬥爭的性質與以前不同，這次所爭執的是教宗與皇帝的權力是誰更高。

久被人遺忘、塵封在圖書館的《羅馬法典》，在十一世紀時被人發現，又在波隆那(Bologna)大學講授起來。日耳曼的皇帝在其中搜尋理論，作為爭取最高權威的依據。他們自稱為君士坦丁、查士丁尼和查理曼等人的繼承人，自視高於西方一

切國王，甚至連教宗也得隸屬他們權下。他們說皇帝是天主教在世間的最高代表，他當委任教宗。教宗諾森三世回答說：「絕非那麼回事！國君的權柄只能及於地上，教宗的權柄卻能及於地上和天上；前者只能管理肉身，後者卻能兼管肉身和靈魂。」袒護皇帝的法學家說：「凡皇帝所要求的，都有法律的力量。」教宗反駁說：「不！皇帝與其他人一樣，都得服從天主所定的道德法律；如果皇帝違反了道德法律，教宗有權裁判他；而且當信仰遭受威脅，危及教會時，教宗還能廢黜皇帝。」³

雙方都這樣自命不凡，自然非衝突不可。如果教宗對皇帝的無理要求表示讓步，教會便喪失了行動的自由。這種鬥爭有時緩和、有時激烈，延長了一百多年。爭執最烈的有兩位皇帝：一是紅鬍子腓特烈（Frederick Barbarossa，在位期間1152～1190），一是他的孫子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在位期間1220～1250）。

教宗與皇帝鬥爭的第一階段

腓特烈一世號稱紅鬍子，是中古世紀德國最偉大的皇帝，信教十分虔誠。他夢想仿效查理曼大帝，但查理曼為擴展基督教的文化而工作，腓特烈卻努力增加自己的勢力。他雖號稱「神聖羅馬帝國」的元首，其實只是德國的皇帝，他所企圖收復的義大利，實際上只是幾個各不相屬的小國共同占據之地，彼此攻擊。義大利的南

部和西西里另組成一個王國；羅馬和半島中部始終直屬教宗，這是腓特烈所難以容忍的，他常說：「假如我不能統治羅馬，羅馬帝國之名豈非虛設！」

腓特烈一世既願有效統治義大利，教宗亞德四世（Adrian IV，在位期間1154～1159）不久就清楚地看出，如果不抑制他這份野心，他必要成為全歐洲的主人，教會也勢必受他控制。亞德死後，樞機團以大多數票選舉了一位精通法典而又意志堅強的卓越人物承繼大統，就是歷山三世（Alexander III，在位期間1159～1181）。選舉的合法性不容置辯，但腓特烈對當選者的堅強毅力甚感不安，於是命令同路人另選一位迎合他意旨的人，硬派他去做教宗。

這使得教會的自主性受到嚴重的威脅；歷山三世不得不急起應戰，立刻把腓特烈和偽教宗開除了教籍。無奈大軍壓境，他不得不放棄羅馬前往法國避難；但他先把義大利各大城聯合起來為他作戰，而這些城市自身獨立也不願他人侵犯。戰爭互有勝負，延續了十七年，皇軍終於在一一七六年在萊拿鬧（Legnano）慘敗，腓特烈不得不認輸。教宗當時在威尼斯（Venice），腓特烈前去求饒，在聖馬爾谷大殿前跪伏教宗腳下請求寬恕。教宗把他拉起來，恢復他的教籍，並予以和平的親吻，表示寬恕。時在公元一一七七年，正是坎諾薩堡事件後的一百週年。

教宗不為己益與德皇言歸於好。腓特烈一世於一一九〇年參加十字軍第三次東

征，橫越小亞細亞時不幸渡河溺斃。繼位的皇帝亨利六世（Henry VI，在位期間1190～1197）英武有為，不但德意志，連義大利南部也歸其掌握；但他並不滿足，夢想把東西帝國都統一在他權下，連教宗也由他任意擺布。不過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他於一一九七年突然去世時，年僅三十三歲。他的繼位者腓特烈二世，年方三歲，教宗暫時得以高枕無憂。

教宗權力的最高峰：諾森三世

德皇死後不久，教宗雷定二世（Celestine III，在位期間1191～1198）也相繼去世。樞機選了一位年僅三十八歲的青年繼教宗位，取名諾森三世。他出身羅馬望族，曾在巴黎讀神學，在波隆那讀法律，是一位優秀的法學家，並且熱心出眾，曾寫過神修的著作。最重要的是他堅強不屈的意志，和以真正愛德所節制的正義精神。他擔任教宗只有十八年，但從未有一位教宗在如此短暫的歲月做過那麼多事。

諾森三世對自己的職務懷有崇高的理想。他曾寫道：「天主在天空放置了兩個光體，一個照耀白晝，一個照耀黑夜；祂在人間，也同樣建立了兩個權柄：一個最亮的為靈魂，另一個次亮的為肉身；就如月亮由太陽接受光明，同樣國君的地位也是教宗地位的反映。」他雖被迫有時不得已而參與政治，但總未忘記他在一切之先

是一位神父，是宗教國家集團的精神領袖。他之所以希望宗教國家的政治在教宗領導之下統一，首先是為了捍衛天主教信仰和宗教道德。

諾森三世要處理整個歐洲送到羅馬的各種案件。他常表示自己是弱小的保護者，但對國王更表示他愛護正義的偉大精神。他雖明知如果態度更為緩和，就能獲得更大的政治利益，他卻總不肯為了那些利益而犧牲宗教的道德。例如：法王斐理二世（Philip II，在位期間 1180～1223）休了髮妻公然與另一位婦女同居；教宗警告他：「聖座不能坐視被迫害的婦女毫無保障；國王的地位不能豁免你作教友的責任。」國王雖掙扎了二十年，仍終於就範。英王若翰，號「無地王」（John Lackland，在位期間 1199～1216）干涉教會事項，拒絕承認聖座所委任的主教，且將忠於教宗的主教放逐；諾森三世把他開除教籍，並解除屬下對他效忠的誓言；國王終於低頭，承認教宗的無上神權。

但教宗諾森三世特別關懷的是下列兩件事：解放聖地和改革教會。第一件事未能達到目的，因為十字軍違反他的意旨，把解放聖地的任務拋之腦後，反去幫助他人爭奪權利。但對教會改革，他有很多的成就：他改組教廷，清除過分的奢侈，保證選擇稱職的人擔任主教。然而他最大的功勳是承認聖方濟和聖道明的神貧理想，對聖教會貢獻卓越；他鼓勵托鉢修會，就是提供教會最有效的改革。

為完成他的改革事業，諾森三世於一二一五年在羅馬召集第四屆拉特朗大公會議；參加者有四百一十二位主教，八百位隱修院院長，還有各奉教國王的代表。教會和國家首長的代表出席，整個奉教國家聚集在教宗四周，討論改革方法！大會公布了許多法令，其中一條至今仍奉行有效就是：每年應當至少辦一次妥善的告解並善領聖體。

教宗與皇帝鬥爭的第二階段

教宗諾森三世死後不久，聖教會同一位危險的敵人腓特烈二世——紅鬍子腓特烈一世的孫子——又展開了鬥爭。他由母親繼承了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王位，他在西西里一個受羅馬、拜占庭、伊斯蘭和猶太各種文化影響的環境下長大，聲稱要作一個天主教的皇帝，但實際上他的作風和生活方式比較是一位東方的專制君主或回教頭目。他兼具教友情感和傲慢無比的性格；他是否有信德，有待商榷；在當時信仰那樣普遍的環境中，像他那樣遇事懷疑的人真是少見。

腓特烈二世年幼時，母親委託諾森三世教育他；起初他很受教，但一即皇帝位（公元一二二〇年），意向就清楚地表現出來；把祖父和父親的野心計畫重新拾起，他不但願作國家的領袖，還願作教會的主人。在年老多病的何諾三世（Honorius III，

在位期間 1216~1227) 為教宗時，他將義大利的一部分攫為己有，但國瑞九世一即位，事態改觀。國瑞九世雖然年已八十，意志卻異常堅強，絕不讓教會隸屬皇帝權下。腓特烈在十一年前已宣誓率十字軍東征，卻總是藉詞推諉不肯成行，以致對回教徒的戰爭未能奏效。國瑞乃於一二二七年，以偽誓罪名將他開除教籍。之後他開始侵略義大利北部，教宗又將他二次開除教籍，並召集會議予以審訊。但腓特烈的反應是把載有一百來位主教去開會的船隻擄去，並拘禁主教。不幸教宗此時逝世，聖座空懸一年多。公元一二四二年教宗諾森四世 (Innocent IV, 在位期間 1243~1254) 膺選，深知腓特烈不可理喻，就在里昂召開會議審理他的案件；他被控褻聖、偽誓和異端等罪名，結果會議將他廢黜，嚴禁人民對他效忠。果然不出所料，他仍倔強不服，卻逐漸為眾人所棄。他卒於一二五〇年，死前幸蒙教會赦宥。

德皇的繼位人繼續同教宗鬥爭一段時期，直至該皇族最後一人於一二六八年被殺才停止。教宗與世權之爭終於獲得最後勝利，羅馬與義大利，也從日耳曼皇帝的高壓下獲得解放。然而這種勝利又帶來其他危機：除去外憂，便生內患，各城又繼續彼此爭戰，義大利陷於無政府狀態。羅馬既因內亂無法安居，教宗便在各城間流浪，最終到法國亞味農 (Avignon) 避難。

奉教君王的模範——聖路易

中古世紀的君主，並非都像腓特烈二世一樣忤逆聖座。今只試舉其同代國王之一以概其餘。法王路易九世（亦稱聖路易）後世稱為聖王，具有教友各種德行，即位時才十二歲，剛毅而熱心的母親教育他，學會治國和信仰熱心的藝術。他曾向他說：「我寧願看你死，而不願見你犯罪。」路易具有奉教騎士的各種美德：在戰陣上的勇敢，甚至使敵人驚奇，正直、文雅、擁護正義、保護弱小。最稀奇的是，他遵守福音的勸諭，甚至施行在政治上。他的理想是在各處建立正義和平。他常願擺脫其他一切，先去批准他人的請求。他習慣每天早上參與彌撒以後，站在王宮附近的一棵橡樹下，等著接受大小人物前來向他喊冤。連對其他國王，他也努力維持正義和平。他對教宗與腓特烈二世的鬥爭總不願介入，但當腓特烈拘留法國主教不准去羅馬參加會議時，他立即要求恢復他們的自由。有一件事——恐怕是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更十足證明他愛好和平正義的精神：就是他曾自動把祖父所攫取的省分交還英吉利王，因為他認為那種占領有欠公允。因他的大公無私，使他多年以來作了西方的仲裁者；王侯都請他解決紛爭。祈禱的生活和近乎隱修士的刻苦，是他德行的基礎。他的愛德有求必應，他常親手給窮人洗腳，同他們一起用飯，服侍瘟疫

和癲瘋病患者。但這一切並不至於使他荒廢政務，聖路易朝可視為法國最繁榮的時代之一。除了為公益外，他幾乎使公侯的私鬥完全絕跡，他廢止決鬥惡風，在他當政時，各處建立不少醫院、救濟院、教養院和最美麗的聖堂。路易朝可稱為巴黎大學的極盛時代。

他最大的願望是收復耶穌聖墓；為此曾兩次率十字軍東征，可惜均告失敗；但足以證明他的聖德。他於公元一二七〇年因染疫死於突尼斯（Tunis）。（參閱本章第陸節）

肆 教會與教育

歷經整個中古世紀，國家對教育完全不顧，教會負擔了教育的全部責任。兒童在本堂附設的學校內接受初步教育；在隱修院和主教公署附近開辦的學校內，接受更完備的教育，幾乎等於現在的中學教育。受教育的利益是人人皆可沾潤的，任何人均不致摒除門外：本堂和隱修院的學校都是免費，主教所開辦的學校，富者通常須繳納學費，窮人則一概豁免。

大學

教育發達是第十二世紀的特徵之一。許多主教設立的學校，實際上已成了高等學府。有終生獻身教育的名人，在其中教育青年，許多學生為老師的名譽所吸引，遠道負笈前來。這些學校逐漸開始專門化：巴黎以神學著名；義大利波隆那擅長法律；義大利的沙勒諾及法國南部的蒙彼利埃（Montpellier）則以醫藥著稱。由這些學校逐漸產生了堪為中古世紀之光的各大學，這是西方教育史上的特徵。

巴黎大學是這樣形成的：主教的學校，因學生大批湧來，漸有人滿之患，於是開辦其他學校。不久，神學、哲學、文學、法律、醫藥等諸科目的教授和學生匯集成一種同業組合，即所謂的「大學」（University）。第十三世紀初，這種教育組合已為國王正式承認，且予以種種特權，教宗也使它脫離主教的管轄而歸自己指導，教授和教材統由教宗指派和規定。

中古世紀的教會教育不分畛域；教授和學生來自基督宗教世界的各個國家。拉丁文為公用語文，凡受過教育的都能講。當時最著名的大學是義大利的沙來諾、波隆那和帕度亞（Padua），英國的牛津（Oxford），西班牙的沙拉曼卡（Salamanca）。但巴黎大學放射著異彩，可稱為宗座及帝國之外的第三勢力。當時有一諺語：「義

大利有教宗，日耳曼有皇帝，法蘭西則有大學。」

士林學派 (也稱經院學派)

人稱中古世紀的大學教育為「士林學派」(Scholasticism)，一方面指其教學方法，另一方面指其所教授的道理。

什麼教學方法？近代大學多注重文字，那時則以口頭辯論為主。為確定某端道理的真实性，盡量提出一切可能的問題，予以恰當的解答。為此廣泛運用辯證法，尤其是邏輯，學生從事其他學科前，須首先熟悉邏輯學。

第十一和第十二世紀的大思想家，已用辯證法從事研究啟示的真理，例如本篤會會士聖安生 (St. Anselm) —— 後為坎特布里總主教 —— 即用此法。至十三世紀，士林學派已臻全盛時代。一種新事件給學術界一大刺激：即西方天主教的學者，把公元前第五世紀的大思想家亞里斯多德的傑作重新揭發，那是人類知識的廣泛綜合：自然宇宙、人的靈魂、萬物的性質和根源、第一原因、人的目的、道德的規律等，都被這位大思想家予以審視，並加以分析綜合。亞里斯多德的方法，對世界提供全盤解釋，對人道德提出指南，這一切都是純由人類理智所研究的結果。當時對哲學的態度，如同文藝復興時代對古典、今日對科學一樣興味盎然。

然而當時也提出了嚴重的問題：人能堅持亞里斯多德的理論同時也無悖於聖教會的道理嗎？既然本性的理智對世界能提供全盤解釋，啟示仍為必要嗎？如果哲學的結論與信德的教訓不相符合，應拋棄哪一個呢？這些問題引起了熱烈的辯論。

使問題更加混亂的是：亞里斯多德的著作是由天主教公開的仇敵——阿拉伯回教徒傳過來的；在黑暗時代，這位希臘哲學家的著作已在西方遺失，阿拉伯人譯成他們的文字而不斷加以研究；西方對亞里斯多德的認識，是由阿拉伯的翻譯和阿拉伯的哲學家得來的；但那些註釋家，特別是最著名的亞維靦納（Avicenna, 980~1037）和亞威洛哀（Averroes, 1126~1198），曲解了亞氏的思想，而且對許多方面的解釋與公教的道理格格不入。

這些理論既然危及信德，教會所採的第一個步驟就是禁止研讀亞氏著作。但這消極的作法能令人滿意嗎？把對的、好的保留，以便解釋並保衛啟示的真理，不是更好嗎？第十三世紀的偉大聖師就採取了這種辦法，其中最卓越的是下列兩位：一位是方濟會士聖文德，一位是道明會士聖道茂。

聖文德出身義國貴族，先至巴黎讀書，後進方濟會，並以他的學識、講演和德行使該會更形光大。三十六歲時，被選為方濟會總長。當時環境艱難，使他不得不放棄講道而專心治理會務；他的治績很好，使人視之為第二會祖。他是好幾位教宗

的朋友，大人物的參謀，雖然事務繁忙，仍從事寫作。他於一二七三年升為樞機，次年參加里昂會議後逝世。

聖文德強調愛的重要：不愛天主，就不能真正認識祂。他雖利用亞里斯多德的若干理論，卻對希臘哲學攻擊甚力，指出其中許多錯謬。

聖道茂小文德六歲，卻在同年去世；二人儘管對道理的看法不同，但彼此交誼甚篤。道茂比較重視理智，對亞里斯多德的哲學以教會的眼光去解釋。他也是義國貴族，但放棄榮耀進入道明會。他在巴黎、羅馬和那不勒斯擔任教職以前，曾作過當時學問最淵博的聖雅伯的學生。這位老師的學問廣泛，幾乎無所不包：對自然科學、物理學、倫理學、哲學、神學等，都有極高深的造詣。道茂可說青出於藍，即使不是就學識的廣泛而言，至少就才氣而言亦然。聖雅伯已將哲學和神學清楚二分，道茂遵循此路線，更明確地標示出二者的領域。有些真理，如造物主天主的實有、靈魂不死不滅等，可以由理智證明，這歸於哲學的領域；但有些真理，卻不是理智可以單獨發現的，只能由天主的啟示而知，那就是信仰的對象了。所以理智和信仰各有自己的領域，但彼此並不相反，因為一切真理都來自天主。

聖道茂的著作浩若煙海：如聖經註解、哲學、神學、神修學和神祕學等。他不單思想精闢，而且非常熱心；我們現在所唱讚頌聖體的歌詠，如：〈信友齊來〉歌

(*Pange Lingua*，或稱〈皇皇聖體〉)、〈請眾讚頌救主〉(*Lauda Sion*)等，都出自他的手筆。但他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乃是《神學大全》(*Summa Theologica*)，是他晚年的作品；凡關於天主和人的切重要問題，都以理智和信德的光明予以清晰的闡明，且條分縷析地加以美妙的綜合。人習慣把他這種思想的「建築」和表明中世紀信仰的許多偉大物質建築——聖殿——相比擬，不是沒有道理；他的《神學大全》可稱為學問的府庫，而那些大殿也是奇美藝術包羅萬象的總合。亞里斯多德在地上建造了一座宮殿，聖道茂卻建造了一座上達天際的聖殿。

伍 聖殿

聖殿是信德的工程

自公元一〇五〇年至一三五〇年的三世紀中，各奉教國中建築業非常發達，但建築師的精力幾乎全都消耗在建築天主的聖殿上，人住的房舍尚在其次。在建築聖堂的質和量上，各城彼此競爭；多次把原有聖堂拆毀，並無其他理由，只是為另建更加美麗與天主尊貴相稱的聖堂。真不知當時如何以居民僅數萬的小城，竟能建築那樣莊嚴和諧的巨大工程，直至今日仍雄視四周各城。在各城建築主教大座堂的現

象，實在是歷史奇觀之一，今日仍難以理解。我們今日建築港口、大船和工廠，中古世紀的教友卻認為，沒有比在世上建築象徵天堂的聖堂更為急迫和需要了。

表現信德的聖堂，是全民愛情的工程，絕非像埃及的金字塔那樣是利用千萬奴工在鞭笞之下建造，也不像北京的宮城是皇帝傾國帑所造。人人自動貢獻自己所能；工程師貢獻自己的才能，富人貢獻金錢，人民貢獻力量；有時無論貧富，都不惜胼手胝足親身參與工作。當時一位歷史學家述說：「曾見許多有勢力的人，素日以自己的出身和財富自豪，習慣了嬌貴的生活，現在卻趕著大車，帶著皮帶繩索載運石頭、石灰、木料，和一切應用的材料……有時車載過重時，就有成千的男女，來拖拉車輛。他們默默工作，聽不見任何人大聲說話或低聲絮聒。到達終點時，只聽見認錯、祈禱以及祈求天主寬恕罪過的聲音。神父們勸勉大家和睦相處，消除仇恨，擺脫敵視；債務也不再追究，精神團結一致。如果有人固執於惡，不肯寬恕，就會把他的獻儀從車上丟棄，視為團體的侮辱，連他本人也被摒除於聖善民眾的社會之外。」

羅馬式和哥德式的建築

最初的聖堂，房頂都以木架支撐，遲早會毀於火。寬大的建築便計畫以石作頂，以免失火被焚。自從發明了鋼筋水泥，這樣的計畫已無特別困難，但古時卻不那麼

容易；為解決這個問題，第十一世紀的建築師或以連串的穹窿，或以半圓的圓拱作頂。但這樣的房頂重量很大，必須有堅厚的牆壁始能支持，窗戶也不能開得很大，這就是所說的「羅馬式建築」。牆壁內部都飾以彩繪的圖像，但年深日久，大都已經剝蝕。羅馬式特別的美點是雕刻與建築的完美配合。

以後（十二至十五世紀），建築師發明尖拱成功，拱頂不作半圓式而作尖式，有時高至四十米；重點不在牆壁上，而引伸於石柱及拱壁上；這樣牆壁已不需要太厚，而且可以開大型窗戶。窗戶嵌鑲彩色玻璃而以鉛質網絡狀窗櫺支持，這樣一來，射入的光線更美麗悅目了。

人一進入這種建築，一見高向天際的排柱，就覺得心曠神怡。外面那些高聳的尖塔，也增加了輕鬆之感。人稱這種建築為「哥德式」(Gothic Style)。其實同哥德人並沒有絲毫關係；人所以如此稱呼，因「哥德」一詞代表「野蠻」，而那時的人尚不能領略其優美。其實今日，全球已公認中古世紀的偉大聖殿為世界藝術傑作，它那建築、雕刻和繪畫都列為上乘之作。

貧窮人的聖經

天主的聖殿也是世人的家，教友團聚在主教四周舉行大禮的處所，也是當時所

有知識的總合。世間所有繪在壁上或窗上的聖像名畫，以及雕刻的藝術傑作，都聚集在其中了。然而，中古時代的藝術家所尋求的首先不是為悅目，而是一種無言的宣講，例如：圖解的聖經、宗教的宇宙觀。畫師和雕刻家並不能任意使自己的想像力馳騁，他們必須遵循神學家所定的綱目。說聖殿是「貧窮人的聖經」十分正確，不識字的人能用眼睛學習他們由信德所知的道理：例如世界已往、現在和將來的歷史，原祖的創造和墮落，舊約所預言所象徵的默西亞、先知、聖史，耶穌生活的片段，瑪利亞的光榮事蹟，聖人和他們的奇蹟與殉道、公審判、德行與惡習，田野的樹木野獸，國家歷史上的大事等；神學的一切概念和時代的常識，都可使不學無術的人，藉藝術而窺知其梗概。

陸 十字軍

信仰是中古世紀思想家的嚮導，聖堂的藝術傑作是信友信仰的表現；此外還有一種導源於信仰的思想，就是歷史上所說的「十字軍」，也就是自十一世紀末至十三世紀，奉教的國家為從回教徒手中奪回聖地所組織的遠征軍。

十字軍的起源

耶路撒冷的聖墓及巴勒斯坦經耶穌的生活和受難所聖化的一切地點，自古以來就是教友所敬禮的對象；他們不願辛苦險阻常去參謁。阿拉伯回教徒征服巴勒斯坦以後，前往朝聖的人仍絡繹不絕，因為阿拉伯人對教友仍表現相當寬大；巴格達的回教主曾於公元八〇〇年承認查理曼為聖地教友的保護人，直至十一世紀初，朝聖者仍能去耶路撒冷朝拜聖墓，並無多大困難。

但在十一世紀時情勢大變：一支來自土耳其斯坦（新疆）的遊牧民族擊敗了阿拉伯人，侵入小亞細亞，並於一〇七八年占領耶路撒冷；他們對天主教教友並不友善，對朝聖的人百般刁難、騷擾、劫掠，甚至強迫為奴。這時朝聖者日增，因此在奉教的國家內引起了很大的騷動。教宗國瑞七世本來早有心組織遠征軍去解救東方教友於回教徒的壓迫，但因對教會的改革及對皇帝的鬥爭，已使他筋疲力盡，未能把他的計畫付諸實行，只好留給教宗伍朋二世（Urban II，在位期間1088~1099）去實現了。

推動伍朋二世組織十字軍的首要理由，固然是為收復吾主的聖墓以便教友去自由禮拜；但教宗的眼光所見更遠，他已看出，土耳其回教徒的進展對天主教是很大

的威脅。當時拜占庭帝國雖然很衰弱，但仍可作防止進侵的第一道防線。正巧拜占庭皇帝向西方求助；響應他的呼籲，去援救東正教徒，不但是教友應盡的職務，也是預防威脅整個天主教之危險的一種辦法；而且這對歷代教宗所勞心焦思的重大計畫——使君士坦丁堡的教會停止分裂，再與羅馬言歸於好——不也有很大裨益嗎？

此外還有其他動機：自數世紀以來，聖教會為限制暴力，消弭奉教國家彼此的戰爭所做的努力，只達到了部分的成功；現在大家聯合起來同仇敵愾，把武力指向共同的敵人，不是戡止同室操戈的最好辦法嗎？

當然那些向耶路撒冷進發的人，除宗教的目標外，有的也懷著不很高尚的企圖：例如：喜好冒險，而想到東方去發財或定居等。但如果說這是他們從軍的主要理由，那就未免冤枉他們了。十字軍實在是由於精神的奮發，是教友響應天主教在世代表——教宗——的信德表現。

第一次十字軍

第一次號召發自公元一〇九五年；當時教宗伍朋正在法國克勒蒙（Clermont）主持為改革教會所召開的會議。在會議結束時，教宗起立向民眾致詞，提起了他最關心的問題：那曾埋葬過救主的聖墓落於無信者之手，慘遭褻瀆，最後結論說：「教

友們，把你們的力量聯合起來，去收復聖墓吧！在天國定有不朽的賞報等待著你們。人人該拋棄自己，背起十字架來！」

全體民眾都滿懷興奮攘臂而起，一致呼號著：「這是天主的聖意！」凡決心從軍出征的，都在右肩上縫上了一個布製紅十字，這便是「十字軍」名稱的由來。

這種運動逐漸傳開，由法蘭西而義大利，而比利時，而英吉利；教宗既發起了運動，也絕不願輕率從事，於是演講、募捐、頒發大赦、為從軍人的財產家庭謀取保障、任命欽使領導出征、指定行程、採辦糧餉等，為保證成功的一切準備，都如火如荼地展開。當這些準備工作進行時，也有人分頭去對民眾演講；於是窮人、工匠、農民便變賣他們所有的一切，召集了成千成萬的人。教會對這些興奮的烏合之眾無法領導。這個前鋒（包括婦女、兒童）便由一位「隱士伯鐸」（Peter the Hermit）與一名叫「窮漢瓦爾特」（Walter the Pennyless）的率領者向小亞細亞進發。他們幾乎沒什麼武器，乘坐著牛車，不顧可能遭遇的危險，貿然前行。路經德意志、匈牙利、巴爾幹半島，沿途強征搶劫，死亡枕藉。當他們望見任何一座城堡時，便問道：「那就是耶路撒冷嗎？」像這種烏合之眾，是注定要慘遭失敗的。這隊沿途死亡了很多的十字軍，終於到達了小亞細亞；在那裡或因飢渴，或因土耳其人的打擊，又死去了大半；殘餘的幾千人最後編入了貴族軍。

這支所謂的貴族軍隊也於一〇九六年秋準備出發，他們分為四路，分頭向君士坦丁堡邁進；在到達目的地以前，須經過小亞細亞及敘利亞炎熱炙人的原野，沿途與土耳其人作戰；六月七日耶路撒冷城已遙遙在望，七月十五日便將該城占領。

東方的拉丁王國

占領耶路撒冷以後，許多十字軍人便返回了歐洲；其他留居在巴勒斯坦和敘利亞的建立了許多拉丁國。天主教教友的統治維持了兩個世紀（直至一二九一年），不過總未能確保安定。公元一一八七年耶路撒冷又告失陷，四十年之後教友重新收復，也只保持了十五年（自公元一二二九至一二四四年）。

這種衰弱的原因很多：第一是這些拉丁國只占領著沿海狹窄一帶的走廊，內地的城市仍在土耳其人之手，所幸回教徒彼此不和，勢力還不甚強大；及至一位能統一全部的領袖出現，教友的國家便危殆了。十字軍也不能仰仗拜占庭帝國的支持；東方的皇帝請求西方的武力援助，但不希望他們在收復的土地上滯留不去。自第一次拜占庭與十字軍接觸時便時起齟齬：十字軍埋怨拜占庭詭詐不實，拜占庭譴責十字軍野蠻粗暴；結果西方的君主困守著自己的習慣和封建的治國方式，損傷了最重要的團結。

軍人修會

為了確保東方天主教國不受侵略，並為保護朝聖人員的自由安全，有人計畫了中古世紀最新穎的一種組織——仿照修會的組織，會員大部分都不是神父，而是軍人；在神貧、貞潔、服從三願之外，並矢願以武力保衛基督，甚至犧牲性命在所不辭。最著名的是「聖殿防衛會」或稱「聖殿武士團」(Knights of the Temple, Templars)，如此命名，是因第一座會院距離古教耶路撒冷撒羅滿的聖殿不遠；還有「醫院武士團」(Knights Hospitallers)，起初建立在耶路撒冷。是為收容朝聖人員之患病者，並款待旅客而立的；朝聖者遇有危險時，他們也是保衛的軍人。這兩種組織是當時東方的常備軍，他們的修院同時也是軍營；他們建築了驚人的堡壘，那些堡壘的廢墟，在巴勒斯坦和敘利亞小山上至今猶可憑弔。

「條頓武士團」(Teutonic Order) 最初建立於耶路撒冷，專為保護德國朝聖人員；後遷移至德意志，從事歸化尚未奉教的普魯士和芬蘭人，但對此逐漸採用武力，未免與福音的精神不合。

其他十字軍

為對付回教徒不斷的攻擊和拜占庭帝國的野心，東方拉丁國不得不求助於西方的武力，以至演變成連續不斷的十字軍東征。歷史學家統計在八次主要的十字軍中，參加的有三位法蘭西國王，一位英吉利國王，三位日耳曼皇帝，此外還有由歐洲各國來的騎士和水手；實際上求救與派遣援軍的事可說從未間斷。約兩世紀之久，幾乎沒有一年沒有佩上十字徽章去為聖地而戰的戰士。

十字軍的產生本來是由於（宗教）恢復聖地的熱誠，但八次東征，只有第一次收復了耶路撒冷；在以後的戰爭中，王侯們的政治企圖和商業利益往往比宗教的企圖更占優勢，尤其在第四次東征時更為顯著。因為教宗諾森三世的號召，十字軍在威尼斯聚齊。威尼斯的船隻是當時世界最優良者之一，本當將十字軍運往埃及，直搗回教勢力的中心；無奈威尼斯人別有陰謀，竟說服了十字軍去攻擊君士坦丁堡。此次的出征，本是為同異教人作戰而組織的，結果竟變成了奉教國家的同室操戈，攻陷了君士坦丁堡而大事搶劫；反把收復耶路撒冷的事，棄置不顧了。

十字軍的真精神又在法王聖路易身上復活。他願把一切奉教的民族團結在一起，去攻打異教人。英吉利王與日耳曼皇帝中途退出，聖王路易乃帶領法國騎士單獨去

埃及。這支由聖王親身率領的軍隊，非常勇敢，竟在埃及軍前登陸成功，可惜未能繼續勝利，甚至被圍而投降；為了贖回他自己和軍隊的自由，不得不把戰利品完全交出。但他仍不死心，雖然在埃及失敗，仍轉往巴勒斯坦，在彼居留了四年，雖未能戰勝敵人，至少使地方得以自衛，致使敵人對他的正直公平感到驚奇。然而他那收復耶路撒冷聖城的美夢，終究未能實現。之後因國事被召回法國，但他始終沒有拋開十字軍的理想。十五年後又組成了十字軍，此次在非洲突尼斯登陸；又是始勝後敗，加上不久後瘟疫大作，兵士死亡枕藉，一名王子也成了犧牲品，不久國王也染疫。當他自覺死期已近，便為其王儲口授了美妙的遺訓；然後命人將其移至一鋪灰的床上備死，真是至死不忘謙卑貧窮。時在公元一二七〇年八月廿五日。

十字軍的結果

聖路易的十字軍是天主教界收復聖地的末次出征。公元一二九一年，拉丁國的最後據點亞克城（Acre）陷於土耳其人之手；歷兩世紀之久所征服的土地，只剩下一個塞普勒斯島。

十字軍表面的結果是失敗：聖地既未收復，教會也未統一。然而如此重大的冒險也不是全沒好處。一方面是對回教徒採取攻勢，迫使他們在自己的土地上自衛，

至少阻止了土耳其在兩世紀內繼續前進；假令當時歐洲國家單獨被攻，勢必遭到各個擊破，難以抵禦。所以算拯救了天主教文化。

中古歷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是，十字軍使奉教國家認清了自身的一致。這種一致建基在什麼上面？不是種族的一致，也不是政治的一致；因為政治的對立競爭，不只一次招致十字軍的失敗；然而西方的人民終於認清了在不同的民族之上，有一件更高尚的事實，就是以教宗為唯一領袖的奉教團體。是教宗命令組織十字軍，他使奉教的國君們團結起來，也是他派遣使節去領導十字軍。所以十字軍是教宗的工程，結果使教宗的權威也更為強大。

另外一種結果就是增加了東方和西方、回教和天主教的接觸。在這些戰爭中雙方各顯所長，彼此因而越加認識也越加重視；移住東方的西方人也受到一種更細緻的文明影響。彼此的貿易也更加頻繁；義大利、法蘭西、德意志等國的商業更形發展，因此也產生了一個新的社會階級，就是所謂的中產階級。因為當貴族舉債以便從（十字）軍東征時，往往要把他們的土地變賣；這樣一來，便加速準備了社會的改革，逐漸產生了近代的社會。

由宗教的觀點來說，十字軍也有重要的效果，就是傳教精神的發展。由於十字軍的東征，西方人便不再故步自封，認為世界只限於天主教的歐洲了；也發現了許

多意想不到的民族，引起他們對受迫害的教友的注意；那些已不在基督的法律下生活的教友，和那些摒棄了十字架的地方，也激起了教友們對這些民族的憐憫和同情，還喚起了他們持久的皈依。因為不要忘記，在十字軍的軍事行動旁邊，隨軍而去的傳教士正做著歸化人靈的和平工作，他們認為這比軍事的成績更為重要！

西班牙的十字軍

一說十字軍，普通只聯想到東征的十字軍。不要忘記還有一支更成功的十字軍，那就是西班牙人為攻擊占領他們地區的回教徒所發動的十字軍。

上面已經提過：在第八世紀，回教徒幾乎已占領了整個西班牙，只有少數的教友逃到半島西北的山中去避難。他們趁回教徒分裂，逐漸發動驅逐侵略者的激烈戰鬥。這種戰鬥，自第十一世紀開始，延續了好幾個世紀。第十三世紀初葉，所有西班牙的教友都團結起來，同心合力地攻擊回教徒。這是一個真正的十字軍，教宗曾向全歐呼籲。援軍自法國、德國、義國源源而來；戰敗的回教徒不得不撤退。自公元一二四八年，西班牙全境完全收復，只剩下南部格拉那達（Granada）一個小邦，一直到一四九二年始被征服。

柒 十三和十四世紀的傳教事業

聖方濟與傳教

十三世紀初葉，當十字軍一再違反他們宗教的目的時，出現了一個人，認為征服回教徒用武力未必是最好的方法；那就是使天主教回復到她原始純潔的聖方濟。當時的天主教徒與回教徒只想彼此殘殺，而方濟卻赤手空拳向他們走去，他沒有別的計畫，只想對他們宣傳福音，引他們自動受洗而不願加以勉強。

公元一二一九年在埃及圍攻達米艾塔（Damieta）的十字軍，一日見方濟跟幾位同伴來到，聽他說要往異教徒那裡去，戰士們對他說，那樣接近回教徒是瘋狂的，因為他們的頭目已許給他們：誰砍一個天主教徒的首級，便可得一金幣。無奈不能說服方濟。教宗的欽使樞機也試行勸阻他，仍是無效。他和一位同伴便口唱著《聖詠》前去，竟蒙回教君王予以接見；這位蘇丹還不嫌辭費地同他辯論宗教的真偽。方濟為給蘇丹證明自己的宗教遠勝回教，提議來一個考驗說：「你燃起一場大火，讓你的司祭和我走進火裡去；請你由這事的結果去判斷，哪一個宗教是最神聖的。」蘇丹答說：「我很懷疑我的司祭們會有興趣走進烈火中。」方濟道：「那麼讓我單

獨進去。如果我被燒死，那是我的罪過；如果天主的全能保護我不死，你得發誓承認基督是真天主和救世者。」蘇丹說：「一位回教領袖，絕不能信奉天主教而背棄自己的人民。」至少他對方濟未加陷害，反予以優禮，遣他返回了十字軍的營壘。

同時有五位方濟的門徒被派往摩洛哥，毅然向回回宣講基督；雖未能使他們皈依，卻獲得了殉教的榮冠。

這種傳教的初步試探雖未能成功，但卻非常重要，就是證明了一種新的精神：隨著方濟和道明這兩個托鉢新修會的產生，使那幾乎熄滅、向異教人宣傳福音的熱火，又重新燃燒起來。

道明會士初次出外傳教

道明會士固然以智識的活動大放異彩，但也不可忘記他們自立會之初便發顯了熱烈的傳教活動。聖道明本人雖未能參加對異教人的傳教工作，他卻願教自己的門徒參加：他們到突尼西亞、摩洛哥、北歐、小亞細亞和波斯等地去工作。去匈牙利、道明會傳教士，曾深入俄羅斯平原而抵達伏爾加河流域，但在那一帶的工作不久便歸消滅。

蒙古人的入侵

正在這時，發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就是成吉思汗（Genghis Khan, 1162~1227）的蒙古帝國造成了驚人的擴展。成吉思汗歿於一二一七年，其子窩闊臺（Ogödei, 1186~1241，即元太宗）有自中國海至大西洋征服全世界之志。他先滅金，占領中國北部；在中東侵入波斯，予以極殘酷的劫掠，致使它的元氣始終未能完全恢復。亞美尼亞（Armenia）也被克服。於是分兵，一路攻南宋，一路攻高麗，一路在拔都（Batu, 1208~1255）指揮之下侵入俄羅斯，橫行於波蘭及匈牙利平原。公元一二四一年布達佩斯陷落。蒙古的鐵騎真是所向無敵；奉教的歐洲，眼看就要全部淪陷，提心吊膽地在等待大浩劫中喘息。是時元太宗窩闊臺忽然在蒙古平原逝世，歐洲於是得以保全。拔都聽見這個噩耗，立即從波蘭和匈牙利班師回蒙古；不過他們隨時能再出現，因為那些蹂躪西方的鐵騎，真如由地獄出世的魔鬼一樣，他們的軍事組織比一切所謂文明國的軍隊都強得多。

傳教士赴亞洲傳教

針對這可怕的災禍，教宗諾森四世起初想組織一支十字軍，實際上他採取了另

外的步驟；因為他接到報告，說在那駭人的游牧民族中，甚至在他們王侯的左右已經有教友。我們知道聶斯托里教派自第七世紀以來在中亞很興盛。成吉思汗曾征服過大部分信奉聶斯托里的克烈和維吾爾人，因他們比蒙古人的文化要高，蒙古可汗便把他們的書記、長官、醫生，甚至聶斯托里的教士，留帳中任用。所以在大汗的幕府內，掌理文書、宣布命令、制訂賦稅等的文官，多為信奉聶斯托里教派的人；沒有他們，蒙古人恐不能建立一個有組織的國家。大汗的王后也有信奉聶斯托里教派的，這也是引他們奉天主教的一種先導。所以聶斯托里教派對蒙古民族的影響，關係他們的前途至鉅。他們雖然不隸屬羅馬教會，但仍是基督徒。因此教宗思量：能不能利用聶斯托里教派的影響，引領蒙古王侯和他們的人民信奉真教呢？最低限度，能不能和他們聯盟以抵制近東的回教徒呢？於是教宗便決意派遣使節去晉謁大可汗。

他選了方濟會的會士，也是一名富有經驗的傳教士，名叫柏郎嘉賓（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擔任這份艱鉅的任務。這位方濟會士雖已六十三歲，毅然接受了這項危險的使命，帶著教宗的國書和一位同伴，走上了征途。書中勸蒙古人勿再攻擊其他國家，並望他們皈依正教。他們騎馬走了五千公里的路程，於公元一二四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到達蒙古中部喀喇和林（Karakorum，簡稱和林）大汗的駐蹕地；其

時貴由（定宗）正繼太宗而立，有各民族及亞細亞各部落的代表四千餘人齊來朝賀。

定宗對聶斯托里教派優禮有加，他們能在他大帳前舉行彌撒，他主要的大臣和講師都是信奉聶斯托里教派的人。但他對教宗的覆書卻非常傲慢，大意是說：如果你願和平，便當來朝；我看不出我們當奉教的理由；我們懲罰信教的國家，是因他們不服從上帝和成吉思汗的命令；上帝的權能顯然和我們同在，否則我們不能有此勝利⁴。

柏郎嘉賓於冬季啟程回歐，於一二四七年到達。他所負的使命顯然失敗，不過並非毫無益處。他對蒙古人所寫的紀錄，能使西方人對蒙古及其勢力更加認識，因而計畫如何自衛。另外柏氏還搜集了許多關於中國的情報，歐洲開始認識了這個遠東的國家（當時歐洲稱中國為Cathay，即震旦）。

根據柏氏的報告：「震旦人仍屬異教；他們有自己的文字，據說還擁有新舊約聖經。他們有記載歷史和祖先行傳的書籍，有修士和類似我們聖堂的廟宇。他們自稱有聖賢並崇拜唯一真神——上帝。他們也崇拜敬禮耶穌基督，並且相信永生，不過尚未受洗……他們對教友很愛護並給以大量的布施。真是一個文雅而可愛的民族……有人類所愛好的各種技藝，可說全世界沒有比他們更優良的技工。真是一個天府之國，富有小麥、酒、金、絲及其他物產。」⁵

這些報告，雖然很模糊，卻激起了歐洲人對這遼遠而不認識之世界的好奇心；這位勇敢的會士給探險家指示了當遵循的路途。

威廉的行程

在以後的十年中，歐洲的奉教國派遣了不少的使節和傳教士到東方來。我們這裡只提一位最著名的比利時人威廉（William of Rubruquis），以概其餘便了。

當法國聖路易率第七次十字軍東征時，聽說一位蒙古王侯——拔都之子撒里答（Sartaq，？~1256）已領洗進教。心想：他不能成為一位新的君士坦丁率領亞洲各民族歸正嗎？於是聖王便設法同他發生關係。他為此號召另一位方濟會士威廉和一位同伴前去，無正式使節的名義，只是一名攜帶國王介紹信的傳教士而已。

兩位傳教士細心準備好了路線，便從君士坦丁堡啟程，經過黑海到了俄羅斯境內。他們正深入廣大的曠野、一望無際的草原時，忽遇蒙古馬隊的哨兵，他們有進入另一世界之感。威廉在伏爾加河附近帳內一見撒里答，便覺失望；無法知道他是否為教友，撒里答命人領他們去晉謁大汗蒙哥（憲宗）。在十個月的行程後到達帳幕城和林；這顯然是亞洲各民族的集合地。他們在那兒很驚奇地見到許多匈牙利、法蘭西和英吉利的教友，他們自被擄以後便從未領過聖事，除非他們重新受洗，否

則聶斯托里教徒拒絕他們進入聖堂。當他們居留在那兒的八個月中，威廉便在這些教友間盡司鐸的職務。以後兩位會士曾被邀去在回教、佛教及聶斯托里教士前演講天主教教義，結果他們很得王侯們的重視。不過，他們體會阻礙天主教傳教士活動的重要困難之一，是聶斯托里派教士貪財酗酒的生活不足為人師表；因此引起蒙古首長們對基督徒不分青紅皂白地普遍輕視。一日大汗憲宗向兩位傳教士說：「天主給了你們法律，你們卻不遵守哇！」最後兩位傳教士帶著憲宗致法蘭西國王的覆書被遣回國，書中邀請法王向大汗稱臣。威廉的同伴怵於旅途的乏累和危險，拒絕同行；威廉便一人啟程，於一二五五年到達巴勒斯坦。

這次試將天主教傳入亞洲，就整體而言，並沒有達成目的；然而西方的天主教和蒙古的接觸也不能說全無益處；他們帶來的報告在歐洲激起了對東方的興趣；這些來往證明，自從中亞全部隸屬於一個政權後，就能由陸路自西歐赴遠東，而亞洲也給天主教的傳教士開了方便之門。

中國同西方天主教徒第一次直接接觸

公元一二六九年兩名威尼斯商人波羅氏自東方歸來，傳教的遠景便更加有望。原來他們是橫越亞洲大陸到達北京，帶來大汗致教宗的信，請求派遣「百名精於教

義且嫻習七藝者前來」。此大汗正是統一中國、建立元朝，剛即天子位的元世祖忽必烈。

聖座了解這種請求的全部意趣嗎？恐怕未必，因為教宗只遣派了兩名道明會士偕同波羅兄弟前往中國。這次兄弟中有一位帶了自己的兒子馬可波羅（Marco Polo, 1254~1324），這個小波羅因他日後的遊記竟致名垂不朽。可惜那兩位傳教士不久放棄了原來的計畫，於是波羅氏父子三人便自行啟程。他們於公元一二七五年抵達中國，很得元世祖的寵信。他們在中國居住了十七年，從北至南遍歷中國各地，曾到過福建、雲南，馬可波羅且任過中國官職。他們三人於公元一二九二年，帶著許多財富回至歐洲。

馬可波羅的遊記在歐洲傳開，無異是一種啟示：歐洲好似發現了一個新世界；原來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人口眾多，富庶無比，建築華美，商業繁盛。方濟會士以前根據聽聞所說中國有教友的話，馬可波羅已親眼目睹，證實並非虛傳。

自唐武宗出諭禁止外來宗教後（公元八四五年），聶斯托里教派在中國本土蓋已絕跡，但在邊疆的民族中，如蒙古內部的維吾爾、克烈及乃蠻等，仍能存在且很發達；在蒙古軍隊中也有許多聶斯托里教徒；及至侵占中國時，由於人民的遷徙，有些教徒隨至中國定居。當時不僅偏僻省分有聶斯托里教堂和修院，即在內部城中，

如揚州、杭州也有。皇族中仍有不少與聶斯托里教徒結婚者，世祖的太后即其一例⁶。

元朝皇帝既對儒釋道等採取寬容態度，對聶斯托里教派自然也不刻薄。據馬可波羅說，在基督宗教的大慶節，聶斯托里司祭往往把福音經呈獻皇帝面前，皇帝虔敬地向它上香，並以口親吻。公元一二八九年曾設專署以司基督宗教事宜。

皇帝優禮各種宗教，當然也有政治作用；這也說明一個人敬畏一切超自然能力的心理狀況。一日世祖向馬可波羅聲明說：「有人敬耶穌，有人拜佛，其他的人敬穆罕默德；我不曉得哪位最大，我都敬，求祂們庇佑我。」

觀察聶斯托里的兩位隱修士，一名拉邦（Raban Sauma），一名馬而谷（Marcos），足以證明聶斯托里教徒並非都像威廉所遇到的那樣壞。拉邦生於北京附近，馬而谷生於綏遠，他們於一二七五年在離北京不遠處度著隱修生活。一日這兩位修士決心要到耶路撒冷去朝聖，許多人認為這事太冒險，試圖勸阻他們說：「我們為羅致西方的主教修士來這裡那樣困難，你們為什麼反而要到西方去呢？」繼而見他們去志堅決，無法挽留，便供給他們馬匹及為通過中亞所需要的行裝。公元一二七八年他們到達了波斯，混亂的時局不允許他們繼續向耶路撒冷前行。馬而谷便被選為聶斯托里的宗主教（教長）；至於拉邦呢，住在波斯的可汗於一二八七年派他充任使節前往歐洲，以便設法使十字軍與蒙古連盟，共同對付回教徒。他在法國蒙國王接見，

又到羅馬也蒙教宗尼閣四世 (Nicholas IV, 在位期間 1288~1292) 接見，並由教宗使他歸化，重歸羅馬教會聖棧。他在聖伯鐸大殿舉行了彌撒聖祭，民眾還歡呼說：「語言雖不同，禮節卻一樣。」

這位可敬的司祭，從極神祕的東方而來，跪在宗徒的墓前，向伯鐸的繼任人請求赦罪；這種奇異的現象，給西方基督宗教世界多麼深的印象，是不難想像的。方濟會傳教士帶來的報告，已經把奄奄一息的傳教熱火重新燃起；可是拉邦所帶來的和平消息，使它更冒起了熊熊的火焰。已不能再懷疑，在東方有一個急待為基督爭取的世界，一個已多少接受了福音的世界。

孟高維諾在中國

教宗尼閣四世既知在中國已有許多教友，便於一二八九年派遣一個使節團帶著教宗致元朝皇帝的書札前往，領袖是一位四十二歲的義籍方濟會士，名孟高維諾 (John of Montecorvino)。他先由陸路經過波斯，再從波斯灣乘船抵達印度；在印度留住了些時候，然後再乘船直達中國。他是踏上中國領土的第一名天主教傳教士。他當時只是孤身一人，那位道明會士同伴已在印度逝世。他到達北京時，元世祖剛去世 (公元一二九四年)。繼位的皇帝是成宗，孟高維諾向他呈遞教宗的書札，頗

蒙優禮，並准他在京中建堂居住。自他到達以後，便有一位聶斯托里教徒，維吾爾的王侯喬治（George）跟他很要好，並由孟高維諾的開導皈依了天主教。他這番皈依很寶貴，因他將大部分維吾爾民族引歸了正教；他還在維吾爾境內蓋一聖堂，二十世紀曾發現其遺跡。喬治對傳教很熱心，他是皇帝的駙馬，在朝廷地位很高，能保護傳教士。可惜他於一二九九年去世，這為聶斯托里教派是一個反動的信號。孟高維諾不能遠離京城，因此未能去協助被迫害的教友，以致大部分又返回了聶斯托里異端。

即在北京的孟高維諾也時遭聶斯托里教派的反對，不過仍有不少的人信教；一三〇五年（即成宗大德九年）他已為六千人施洗。一位自印度伴他來到中國的義大利富商，在皇宮附近為他購買了一塊地，孟高維諾在那裡建造了第二座聖堂。他召集了許多兒童，教他們詠唱日課，有時在御前詠唱，皇帝很為欣賞。

孟高維諾曾獲得一名助手，即德籍會士阿爾奴特（Arnold of Cologne），但為傳教救靈終嫌工人太少；何況孟高維諾已漸感衰老，他於是上書本會總長給他派遣助手。這位孤獨的傳教士獲得意外成績的消息傳至歐洲，喚起了教廷的注意。教宗克勉五世（Clement V，在位期間1305～1314）決意給北京祝聖一位總主教；於是命令方濟會總長遴選七位熱心而有才學的司鐸，祝聖他們為主教，派往中國，負著祝聖孟高維

諾為主教的使命，並擴展孟高維諾的權限及於全中國。七位主教中，三位因旅途的勞頓及什物的缺乏死於印度途中，一位返回義國，只有三位於一三〇八年抵達北京。

傳教工作從此興盛起來。一位亞美尼亞的貴婦捐資在泉州城內建一聖堂（福建泉州為當時華南最大的商港）。孟高維諾派一位主教前往，並在該地建一修院，有修士二十二人。

孟高維諾除使中國人及蒙古人歸化外，尚能引阿蘭人（Alani）返回羅馬公教。那是高加索一帶的東正教徒，由蒙古人遷至中國，共有一萬五千人。

以後有不少的方濟及道明會士自歐洲乘船來幫助孟高維諾傳教，但總未到達目的地。孟高維諾享壽八十一歲，因此得見著名的方濟會士真福和德理（*Odoric of Portenone*）。和德理先至印度，在那兒收集了四位致命方濟會士的遺骸，然後前來中國。他也巡視了泉州、杭州及揚州的修院；他在北京居留了三年，然後由陸路回歐。

和德理啟程不久，孟高維諾便於北京去世，無論教內教外，都尊之為聖人。當時東西的交通非常困難，致使五年之後，教宗若望廿二世（*John XXII*，在位期間1316~1334）始接得他逝世的噩耗，繼任人偕同廿六位會士首途，但從未到達。

此時，由孟高維諾歸化的阿蘭人已八年無人牧養，乃請元順帝遣使去晉見教宗，請求給他們補充一位總主教。這個自遠處發出的呼聲終於達到，使者帶著教宗本篤

十二世 (Benedict XII, 在位期間 1334~1342) 的回信返回；隨即有大批傳教士前來，計有十九位司鐸或會士，由馬黎諾里 (John Marignoli) 率領。他們於一三三八年由陸路啟程，三年之後始到達北京；元順帝盛禮接見，他們在中國留居三年，巡視了方濟會各會院，最後留下幾位會士，其他由海路回歐；他們的往返歷時十四年之久。

天主教在中國之湮滅

教宗的使節回國以後，孟高維諾在中國所建立之教會即湮沒無聞，對她的演變幾乎一無所知；我們所知道的，只是在十三世紀以後的明朝，天主教的傳教士又得進入中國時，對以前的天主教竟連一點痕跡也未發現。怎麼開始時那樣生氣勃勃，現在竟完全消滅了呢？是怎樣消滅的？文獻既不足徵，我們只有猜測了。一般相信傳教的事業，是在元朝覆亡、明朝繼起的戰亂中雲霧消散的。蒙古的皇帝對天主教表示寬容，而教會又在蒙古所征服的外國民族中收錄了不少的教友；因此明朝在仇視元朝所寵信的一切外國宗教原則下，天主教便連帶被波及了。

但天主教的傳教事業坍塌也有其他原因：在第十四世紀中葉，蒙古民族紛紛加入回教，而中亞狂熱的回教君主遂將橫貫大陸的孔道重行關閉。當明太祖即位時，北京的教友對孟高維諾的繼承人已等待了四十年；並不是聖座已把他們放棄，而是

教宗所任命的北京主教，始終無法到任；大批的傳教士也已首途來華，無奈都在廣漠的亞洲中部途中消散無踪了。何況明朝又採閉關自守的政策，禁止對外的一切往來。所以孤立無援的中國教會，長期缺乏牧人的領導，便自然逐漸被窒息而消滅了。

亞洲其他的傳教活動

傳教的活動並不限於中國。黑海和裡海附近一帶，即今日蘇聯的南部，在淪陷於回教的掌握以前，早有方濟和道明會士在那裡傳教，而且成績可與孟高維諾在中國所獲得的相等；也曾建立了主教區；也同樣因回教的發展，傳教的工作被窒息；當帖木兒（Tamerlane）在亞洲心臟區建國時，傳教的事業便漸次完全絕跡了。

在波斯（今日的伊朗和伊拉克），道明會士特別努力使分離的教友重回羅馬的懷抱，他們的活動也及於印度的聶斯托里教派。

我們看十三和十四兩個世紀，少數大無畏的傳教士做了偉大的工作，不能不感覺欽佩。他們利用由成吉思汗造成的有利環境，在一世紀多一點兒的時間內，自亞洲西陲，在極廣大的地區，竟建立了眾多繁盛的傳教區；可惜被帖木兒所建的第二蒙古帝國摧毀。當回教的圍牆把開通一百五十年的通路再度關閉，要等三個世紀後，直到發現好望角的新航路，才能重新把福音傳到遠東。

捌 異端及宗教裁判所

聖教會在各個時代都得面臨異端，連中古世紀信仰最盛的時期也不例外；教義和風俗，在好多處都遭過嚴重的危害。中古時代的兩大異端：華爾登異端（Waldensians）和阿爾比異端（Albigensians）起源完全不同：一項起源於教會本身，使改革運動走入歧途；另一項起源於數世紀以來，產生於東方異教思想的蠢動，而傳到了西方；但兩者的共同點，則都是對封建制度和神職界財富的反抗。

華爾登異端

華爾登（Peter Waldo 或 Waldes）是里昂的一名商人。他因希望度一種完美的生活，潛心研究聖經，將自己的財富盡數施給窮人後，便開始宣傳刻苦補贖。有人請他收為門徒，他便派他們每二人一組去講道。教宗歷山三世批准了他們的生活方式，但因他們未曾讀神學，無本地主教的許可，不准他們講道。假如他們跟聖方濟一樣遵守這項規定，就不至與聖教會分裂；然而華爾登和他的同伴不顧這項禁令，對神職人員和他們的財產大肆攻擊謾罵，甚至不久宣傳與聖教會的道理相抵觸的邪說；雖然未領聖秩聖事，卻擅自給人授洗、付堅振、舉行彌撒聖祭。華爾登的邪說與日

後喀爾文 (Calvin) 所講者相近；他們收了不少的信徒，特別在法國東部。

反社會邪說：阿爾比異端

阿爾比異端的邪說比華爾登的更具危險性。因為他們開始在法國南部阿爾比 (Albi) 一帶傳播，遂得阿爾比之稱（也有人稱之為加達爾 [Cathari]，希臘字義為「純潔」）。阿爾比邪說是摩尼異端的再版（參閱卷一第四章第五節），以為萬物出於二元：一善一惡。靈魂創自善元，但它所結合的肉軀卻來自惡元。為救靈魂，必須以守齋刻苦抑制肉軀，延續肉軀的生命便是延續罪惡。所以婚配、家庭、子女，都當摒絕；自殺是聖德的理想，因此實行此理想者不少，最盛行的自殺方式是餓死。

這樣嚴厲的修行絕不是所有人都能承當的；因此他們的會員分為兩等：一等是「完人」(the Perfect)，嚴格奉行這種教訓——獨身、貧窮、刻苦；一等是「信者」(Believers)，他們的責任是供養完人，藉此可以按照自己的嗜好度舒適的生活；因為在臨死時可以獲得罪赦，只需完人給他們行覆手禮便夠了。他們稱這種禮節叫「安慰」(Consolamentum)。

這樣的主張不但明顯地違反教義，也反對社會。假使他們吸引大批信徒，豈不使歐洲重返原始野蠻時代嗎？它不只背叛教會，簡直是違反人性，自絕於人類。

阿爾比異端傳播得非常迅速，尤其是在法國南部；不但信奉人數眾多，甚至有取代天主教的趨勢。他們利用各種方法傳播，無孔不入。商人巡行各個集市，一邊販賣貨物，一邊宣講教義；作坊、學校都滲入了這種邪說，甚至大領主們也公開支持他們。

聖教會面對這種嚴重的危機，半世紀之久只用了宣講的和平武器。聖納德也曾加以利用，但收效甚微。五十年以後，教宗諾森三世為異端之進展所震驚，乃派遣使節去督導講道。不料，一八一八年時教宗的欽使竟遭殘殺，於是教宗號召奉教的王侯組織十字軍去圍剿。但想以宗教精神約束那些領主的粗野戰士，不使他們任意殘殺甚難；因此雙方都使用殘酷的手段。教宗雖願禁止屠殺，也屬徒然；戰爭竟斷續相持了二十年之久。那些交戰的領主，與其說是為護衛信仰，毋寧說是為了爭城掠地。最後異端終歸崩潰。

宗教裁判所

這種毫不留情的屠殺之後，又成立了一種新機構：「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就是負責緝捕及懲治罪犯的教會裁判法庭。

在教會定懲罰以前，民眾對異端教徒先採取敵視的態度；多次有憤怒的羣眾抓

住異端人，不加審訊便予以屠殺。法蘭西國王和德意志皇帝對他們採取了嚴厲的手段：放逐或處死；教會只不過加以宗教性的補贖而已。聖教會和國家起先是分頭進行，各司其事；以後便合力去根除這威脅奉教社會生存的邪說。這種聯合的行動是由教宗路啟三世（Lucius III，在位期間 1181～1185）於一一八四年所組織的。緝捕異教徒的事起先歸主教們辦理，隨後歸教宗的使節，最後歸修會，經常是道明會士。

緝捕人員的責任是證明是否有異端或叛教罪，然後勸令罪犯悔改。如果他願意歸返正道，就會加給他一些教會當時的普通懲罰，即罰金、朝聖及幽囚等；如果他怙惡不悛，教會法庭就會把他交付「俗權」（Secular arm），即政府去處理，那就是施以火刑。拘捕、依法裁判和執行等手續都歸政府辦理；這為輿論所支持，因為民眾都視異端者為治安的擾亂者。

對異端者施以刑罰，甚至施以死刑，在今日看來未免令人駭怪，尤其是慘遭焚死；對宗教裁判所有時為得口供竟加以刑訊，也覺得是駭人聽聞的事，恨不得教會從未糾纏其中！但這是因為不明白當時的社會背景。當時的社會風氣確實野蠻粗暴，絕不是教會單獨的力量可以糾正。宗教裁判所和火刑，在日後宗教革命時，那些「革命者」也同樣予以採用。為明瞭這些事實，必須追溯到當時人們的心理狀態才成。當時視崇拜客觀真理為非常嚴重的事，異端邪說被視為最大的罪惡；誰也不能相信

會有盲從的異端人。何況當時教會和國家關係非常密切，對一切事上彼此合作視為理所當然。為保衛信仰，人們認為教會理應向政府呼籲，而政府也認為保衛天主教在世的權利是自己應盡的義務。

註釋

- 1 聖事是耶穌親定聖化人靈的禮節，例如聖洗、聖體等。教會自定給人付聖事，毫無疑問，但有關聖事的道理卻在中古時代才正式確定，並清楚說明聖事與聖教會所定的禮節完全不同，並不具有同樣的效力。至於付聖事的方式，從那時起至今日可說沒有改變。只是為了方便起見，授洗由浸水禮改為注水禮，給教友送聖體也由餅酒兩形，改為單用未發酵的餅形。
- 2 中古世紀頻領聖體之風尚未通行，熱心教友也僅一年領四次。一二一五年第四屆拉特朗大公會議始規定教友當辦告解並領聖體每年至少一次。
- 3 中古世紀的教宗自稱有廢黜國王之權，在今日聽來未免覺得驚奇。在教宗的著作內，要釐清哪些是教宗個人的意見或說是當時民意的反映，哪些是聲明全體信友所當信仰的道

理。說世俗的權柄除非獲得教宗的承認便不算合法的理論，是與當時民意相符合的；因為當時歐洲的各民族都奉教，而這全體信友都拿天主教在世的代表教宗為他們最高的保障；不過教宗並未把這種理論定為信條。這與教宗為全教會元首所宣布的信仰道理，不可混為一談。教宗良十三世（Leo XIII，在位期間 1878~1903）在《天主的永生》（*Immortale Dei*，一八九五年）通諭中，把這兩種權柄已清楚地分開，說教會和國家在自己的領域內都是無上的權威，而且各有其界限。

4 此信的原文於一九二〇年在梵蒂岡檔案室發現；正文係波斯文，附有一段土耳其文的說白，蓋有蒙古大汗的印璽。

5 在他這篇報告裡，顯然把基督徒同佛教徒混為一談；當時在中國固然有聶斯托里教派，但他可能對聶斯托里司摩尼教也分辨不清。

6 馬可波羅稱：在中國南部有「某種民族七十多萬戶，誰也不曉得他們信奉何教」。他以為是基督徒；今日人都猜測係摩尼教徒。

7 這裡我們提前敘述中國傳教史，下列事蹟都是教宗在亞味農時其所發生的。

8 十四世紀及以後幾個世紀，國君逐漸傾向專制，設法統治宗教裁判所，作為支持他們政權的工具。一四八一年在西班牙，由於國王斐迪南（Ferdinand）和王后依莎貝拉（Isabella）的請求，為搜查猶太人和回教徒而重組的宗教裁判所更為顯著；因為他們偽裝皈依天主

教，暗中卻仍保持猶太教或回教的信仰。這種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作風非常嚴酷，歷任教宗屢次予以譴責。

第十章 中古文化的衰落

（自教宗博義八世於一二九四年即位至一四五三年君士坦丁堡淪陷）

概觀

在十二世紀中葉至十三世紀中葉之間，中古時期的教會達到了最高峰。然而，以後在奉教的社會中卻發生了重要的變化，歐洲的面目已非昔比，顯示這時期將要結束的徵兆。以前奉教的國家被一種共同的文化聯繫著，人與思想都可自由交流，而今各國卻逐漸意識自己的差別，渴望獨立自主，君主也漸漸趨向專制獨裁，現代的國家已在醞釀產生。

在聖教會內，宗教生活不像以前那樣濃厚熱烈。貪財的心——時代的通病——也滲入了神職界，連修會也不像以前那樣熱心。同時，教會遭受了一次極嚴重的打

擊：西方的大分裂結束了中古教會，教宗在一切奉教國家的崇高地位也被推翻。

壹 教宗博義八世和「美男子腓力」的衝突

教會歷史步上新階段的明顯先聲，就是各國的君主都想擺脫教宗對他們的監護。

直到那時，法蘭西國王可說是教宗至高神權最堅強的支持者；然而在十三世紀末，教宗博義八世同法國「美男子腓力」（Philip the Fair，在位期間 1285~1314）發生了劇烈衝突，嚴重損傷教宗的尊嚴。

教宗博義八世當時歲數已高，極有智慧，是一位優秀的法律專家。他同自己的前任一樣，對教宗神權看得很高，自視為教會的領袖、十字軍的贊助人、君王的仲裁者；但他強烈的性格和愛發號施令、缺乏愉悅溫和的態度，令他興辦的一切事業均告失敗；最大的失敗是他與腓力衝突中所遭受的挫敗。

法蘭西國王腓力是一位神祕人物，當代歷史學家對他的評價互相矛盾。但最確實的一點，是他非常寵信擁護古羅馬原則的法學家，那些人對他的政治也最有影響。但羅馬法的基本原則是國王的權柄不受任何限制，國王的意志就是法律，這種思想自然同教宗的思想無法相容。

第一次衝突

第一次衝突起於賦稅之爭。法國因多次戰爭，急需財源。一二九六年他要向神職人員徵稅，神職人員十分反對，因為多年來有一種習慣：無教會同意，國王不能向教會人員徵稅。教宗致書腓力表示強烈的反對，但終於忍辱屈服。

一三〇〇年，教宗為慶祝基督誕生第十三屆百年紀念，為去羅馬宗徒墓巡禮的人頒賜一項全大赦；因此去羅馬朝聖的人很多。這是第一次「猶比來翁」(Judice)大赦(也稱聖年大赦或禧年)，教宗規定每百年舉行一次。

第二次衝突

第一次衝突平息後不久，遠較第一次為大的第二次衝突於一三〇一年爆發。衝突的起因是法王將教宗派去的代表予以拘留。教宗博義對這種侵越權限的行為，以《吾子，請聽一》(Ausculta Fili)詔書提出強硬的抗議；教宗除了要求釋放代表外，還嚴詞指責國王的橫征暴斂，其基本原則大有問題：「那些勸誘你，說你沒有上司不隸屬於教會最高領袖權下的人，是在欺騙你，他們不是善牧羊棧以內的人。」教宗並且特意聲明他之所以干預國王的事情，是因為關心他們靈魂得救的大事。

腓力對這些譴責不但不肯屈服，並將教宗詔書當場焚毀，他的法學家以帶有侮辱性的偽造詔書揭示於眾，欲激起法國民眾對教宗的反感。國王任憑他們散播攻擊教宗的言詞，並計畫召開會議審訊教宗。

教宗對這些侮辱不甘緘默，乃以《至一至聖》(Ubi Sanctam) 詔書作答，重述國瑞七世及諾森三世神權超越世權的道理。教宗絕無意侵犯國王合法的權力，但因他賦性剛直，遂不免有刺傷他人的詞句。

狂怒的法國國王遂決心訴諸武力；於是將他的一位法學家諾格萊(Nogaret)派往義大利。諾氏勾結教宗仇敵擬將其拘捕，並強迫他召集會議以便將他罷免，於是率領軍隊赴教宗原籍阿南宜城(Anagni)，闖入教宗宅第；眾人皆逃逸四散，只剩那位手無寸鐵的長者毅然面對侵略者。他為迎接他們，把教宗的袍服穿好，向他們說：「這是我的頸項，這是我的頭顱，我是教宗，我要以教宗的身分死去。」數日後阿南宜人將教宗救出，他返回羅馬，但不堪乏累與痛苦，一個月後便去世。

腓力得勝，教宗的威望從此衰落；至少在中古世紀公認超越國王以上的教宗權威從此一落千丈。國家不復受人約束，教友惘然若失，因為國君之上再沒有任何道德權威，足以裁判紛爭並護衛正義。

貳 教宗寄居亞味農

教宗遷居亞味農

在其他有損教宗威望的事件中，聖座由羅馬遷至法國南部的小城亞味農一事應占首位¹。

博義八世的繼任人在位不久便去世；之後，選了一位法國人為教宗，取名克勉五世。他最初本無意在羅馬境外正式定居，唯因當時義大利正值混亂狀態，而他又有事需同法王面談，因此滯留出生地，最後索性在亞味農道明會修院內建築了行宮。這事本極為平常，有許多在羅馬外選舉的教宗，雖是羅馬的主教，卻在他處統治奉教的世界。史無前例的是在義大利境外久居不歸：七位教宗相繼在亞味農寄居了七十年之久。因此義大利人稱這段時期為「巴比倫流亡期」或「被俘於巴比倫時期」（因希伯來人被俘於巴比倫七十年，遂以此比擬教宗居亞味農時期）。實際上教宗並非被俘，不過法國人對教廷的影響顯然比重較大，而此時期所任命的樞機又大部分屬法籍。亞味農的第一任教宗克勉五世對法王表示和善易與，這一點在聖殿武士團的訴訟中更為顯著。

聖殿武士團的訴訟

第九章已述及聖殿武士團原為保衛聖地而立，自從巴勒斯坦再陷於回教徒手中後，他們就獻身其他事業。以後該會傳布全歐，以善於理財著稱。許多王公大人為穩妥起見，常把自己大量的財產委託他們經營。武士團的財富逐漸引起了他人的嫉妒和貪心。十四世紀初葉，法國流言甚盛，竟控告他們種種穢褻不端。事實究竟如何，難以判斷，而且無人可以證實。然而，「美男子腓力」因貪圖他們的財富就對他們提起訴訟；一日之間將法國境內所有的武士團員全部加以逮捕。在刑訊之後承認刑役要他們招供的一切。教宗試圖查明真相，該會會長全部翻供。雖然如此，教宗仍批准維也納會議（1311~1312）中議決取締該修會的案件。腓力對該會會長處以極刑，終於在一三一四年將該會總長雅格穆來（Jacques Molay）判處火刑，穆氏臨刑時猶高呼冤枉。

亞味農時期教宗的治績

克勉五世的繼位人，表示更為獨立的精神，對聖座的主要權利尚知保持。其中不乏熱心和才智之士。亞味農教宗的光榮，是他們曾致力推展對近東的傳教事業。

中國第一位主教的委任，就是亞味農教宗克勉五世的政績（參見第九章第柒節）。他們對本國人未免過分袒護，且選舉太多法國人擔任樞機，不免令人有所微詞。

義大利境內的戰亂延續不停，於是教宗在亞味農建築宮殿以為久居之所。那是一座半宮殿、半堡壘式的偉大建築，至今猶存，這樣一來，他們更加樂不思蜀。然而掌管教會統治權者遷往國外的城市，對羅馬城卻有重大不便，教廷陷於無政府狀態。何況教宗距離自己的國土遙遠，財政狀況必感困難，因為缺乏來源。教廷領土的收入既不解往亞味農，教宗的花費又與日俱增；教會也和國家的政府一樣，治權日益集中，機關、辦公廳和職員都日益增多；平定義大利的戰爭、計畫攻打土耳其人的十字軍、藝術的進展，在在都需要經費。教宗除另闢財源外，別無辦法。為此向教會任實職的人員，如：主教、隱修院院長、本堂神父等日益加重徵收賦稅……這些額外的徵收最後引起教友和神職人員的反感，紛紛提出抗議，甚至使教友對聖座喪失愛戴，於是要求整頓教會之聲四起。

教宗返羅馬

羅馬一再向亞味農呼籲，請求教宗返回教會首都。第一次試圖滿足教友願望的是教宗伍朋五世（Urban V，在位期間 1362～1370）；他本為隱修士，被選任教宗後，

繼續度祈禱補贖的聖善生活。他一表示回鑾之意，法王、樞機及教廷人員就盡力阻止他啟行。但伍朋意志堅決，於一三六七年十月十一日隻身回羅馬；但兩年以後，羅馬變亂又起，迫使他又回到亞味農，不幸兩個月以後逝世。繼位的國瑞十一世（Gregory XI，在位期間 1370～1378）仍願繼續前任的素志，無奈阻難橫生，以致屢試屢輟。最後由一位來自羅馬的婦人，人皆待之為聖女，她是道明第三會會員，名叫嘉琳（St. Catherine of Siena，或譯加大利納）；她熱切的苦勸終於感動了教宗，決意返回羅馬，受到了羅馬民眾凱旋式的歡迎（公元一三七八年）。

參 西方教會的大分裂

教宗國瑞十一世回羅馬不久即去世，以致對教會的整頓未能有所作為；他的死亡卻給教會造成一項嚴重的危機，就是歷史上所稱的「西方教會大分裂」（Great Western Schism, 1378～1417）²。

教宗死後，樞機團——大部分為法籍——仍願選舉一位法國人繼任。這卻與義國人民的希望大相逕庭。當樞機前往梵蒂岡參加選舉，由激動的羣眾中經過時，他們高呼：「我們要一位羅馬人作教宗，最低限度當是一位義大利人！」羣眾甚至威嚇說，假如他們不能滿足人民的希望，便要教他們死無完屍。為恐怖所震懾的樞機

團選舉了一位義大利人，取名伍朋六世（Urban VI，在位期間 1378～1389）。他是一位生活非常嚴肅的人，可惜溫良不足，馭下太嚴，重傷了樞機們的感情；以致數月以後，樞機以受威脅為詞，聲言伍朋六世的選舉無效，重行選舉了另一位教宗，取名克勉七世（Clement VII，在位期間 1378～1394）。伍朋既有他的擁護者安居羅馬，克勉七世就去亞味農。這樣一來，產生了兩位教宗，很難分辨誰是聖伯鐸的合法繼任人³。於是奉教的世界一分為二，兩方面都具有真誠和善意，雙方都擁有真正的聖人一事，就足為證明。兩位教宗，一為羅馬所任命，一為亞味農所任命，彼此爭奪教區。政治的野心也不免摻雜其間。法蘭西和西班牙支持克勉七世，義大利及其他國家則擁護羅馬的教宗；甚至這兩位教宗死後，雙方的樞機也各自選舉了繼位人，可見他們的情緒有多麼激動。

第三位教宗

謹慎持重的人，深知分裂對教會為害甚大，遂想加以阻止。不料反而弄巧成拙，試行和解卻使事態惡化。樞機有意勸兩位教宗退位，以另行選舉一位為全體所接受的教宗。於是他們集會，罷免了兩位在職的教宗，另選了歷山五世（Alexander V，在位期間 1409～1410），他們認為他是唯一的教宗，可以使大家團結一致。未料理想過

高，以為那兩位在職的教宗已超然無累，不復有人性情感，豈知他們竟拒絕退位。於是自一四〇九年，出現了鼎足而立的三位教宗。

康士坦斯會議

不難想像當時教友眼看教宗、主教及司鐸各樹壁壘、互相對立、不知所從的混亂狀態，對神權的尊敬已完全喪失，在這種情形下希望教會改革，自然不可能。

德皇西祺門（Sigismund）於是召集會議，讓主教齊集於德國康士坦斯城（Constance）。國瑞十二世（Gregory XII，在位期間 1406～1415）——可能是唯一合法的教宗——自動退位；其他兩位被罷免，也漸為擁護者所棄。於是樞機們再行開會，選舉了一位羅馬世家高勞納樞機（Colonna）為教宗，取名瑪定五世（Martin V，在位期間 1417～1431），教會始得重新擁戴單獨一位領袖。教會一統的恢復贏得了熱烈的歡騰，教會自有史以來所遭遇的最大內部危機始告解除，前後已經三十九年。一位德籍基督教歷史學家格高路維（Gregorovius）曾說：「如果是一個世俗王國，早已覆亡；然而一個精神性的王國，組織如此奧祕，教宗地位的觀念又是這般牢不可破，這種最嚴重的分裂不但未使教會覆亡，反而足以證明她的不能摧毀性。」

分裂的後果

這次西方的大分裂，在中古社會產生了大動盪；教宗凌駕奉教國家之上的威望和優越權也大為降低。

根據教會一貫的傳統，教會的至高權力常屬於教宗，但在大分裂時期，好似出現了一端新道理，認為大公會議已凌駕教宗之上，教宗對它也得服從。康士坦斯大會的議員們堅持這種理論，也特別獲得了巴黎大學教授的支持。但他們情有可原，因為在不知誰為真教宗的混亂情形下，大公會議總算恢復了教會的和平。但是他們想把這種情形定為普遍的原則，就有誤了；因為任何會議，除非由教會的有形領袖——教宗召開，並由其本人或代表主持，則不能代表整個教會⁴。大公會議高於教宗這種錯誤的觀念，許多年後才能從人心去除。

異端

其他的人走得更遠了。他們固然是些熱心且品行端方的司鐸，用意在於整頓教會，卻反對教宗的權威，結果卻破壞了教會組織的基礎。第一是英籍司鐸，牛津大學的教授威克利夫（John Wycliffe，約1320～1384）。他如同許多當時的人，首先起而

攻擊神職界的財富；隨後否認一切聖傳，堅持在宗教的問題上，只有根據聖經的道理方為確實；他否認教宗的首席權，對他而言，教宗就是「反基督者」，樞機、主教、修士、司鐸都是魔鬼的助手；告解、大赦、堅振、病人傅油禮以及對聖人的敬禮，都是人的發明，因此皆應廢除；人升天堂或下地獄都是注定的。這些都是日後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喀爾文所主張的道理。

這些言論由英倫傳至波希米亞（即今日的捷克斯拉夫），該處由胡斯（Jan Hus, 1370～1415）傳播。胡氏被聖座開除教籍後，願在康士坦斯大會中為自己辯護。結果證實了他傳播異端，於是被判焚死。波希米亞人認為胡斯是一國領袖，其悲慘下場激發了人民的愛國情緒，於是建立了一個獨立的國家教會。

肆 中古世紀的結束

中古世紀不但在教會內製造了許多變亂，而且給整個西方社會釀成許多災難，如：經濟危機、饑饉、戰爭。最重要的戰爭是歷史上有名的英法「百年戰爭」（1337～1453）。⁹⁶其他尚有義大利各城間的內戰、中歐教友和土耳其人的戰爭、政黨和社會階級的內戰。各處隨戰爭而來的破壞、劫掠和強暴事件層出不窮，地方不被戰爭蹂躪，就被逃兵搶劫。此外，還有十四世紀中葉（1347～1350）蹂躪全歐的駭人傳染病

——黑死症 (The Black Death)。當時對此病無法救治，被傳染者數小時內立即死亡，甚至整個村莊被消滅，有時一城居民死去十之八九，幾年之中歐洲居民銳減了三分之一。

中古世紀末葉的信仰

不難明白這種災難在感情和宗教情緒上留下的特徵。信仰仍然很活躍，且繼續影響人的生活，然而這是一種痛苦的信仰，往往有過分激烈的表現；痛苦和死亡的思潮常縈繞人心。佈道人員巡行各城，使人追想耶穌的苦難聖死，用通俗而有力的言詞宣講罪過、死亡、補贖和最後的審判。最感人的講道人是聖文生·斐瑞 (St. Vincent Ferrer)。這位西班牙道明會士走遍了歐洲，教訓民眾，使無數人回頭改過，連不懂他話語的地方也是如此。聖納定 (St. Bernardine of Siena) 也有同樣的成績。又有所謂補贖團巡行各城，為平息天主的義怒公開以苦鞭自責，甚且鞭打至皮綻血流。這些作補贖的人起初很受歡迎，不久後弊端叢生，教宗克勉六世 (Clement VI，在位期間 1342～1352) 遂下令解散。

這種宗教情緒上的改變也反映在藝術上：十三世紀時，人們喜愛表現勝利的基督在末日審判生死者的情形，中古世紀末葉的藝術家專心表現的卻是基督苦難最悲

痛、最感人的悲劇。他們喜愛表現的題目之一是「痛苦之母」(Pietà)，就是悲痛欲絕的耶穌之母瑪利亞，把聖子遍體鱗傷的屍身抱在膝上。

神職界

罹患「黑死症」最慘的莫過於神職人員，它不可避免的後果，不僅是司鐸嚴重缺乏，而且補充的人選大半是對司鐸和會士生活沒有充分準備的人。當時尚未成立修院(Seminary)，神職班的修生都在大學讀神學，許多司鐸並沒有讀大學，為教導教友實在學識不足；不少司鐸，連主教也不例外——對職務上連帶收入的關心，比盡職拯救人靈更甚。接連幾個大修會，雖然有部分的改革，但所表現的活力和熱心，已經不如前幾個世紀。像聖道茂和聖文德那樣光耀前世紀的神學家已經絕跡。反之，在義大利、德國西部以及荷蘭，神祕學的寫作卻很興盛，描述人靈因輕視世俗專心祈禱，與天主結合的極高造詣。著名的經典《師主篇》(Imitation of Christ)，常被稱為「出自人手最美的一本書」，就是出自這時代德國某修院中一位隱名作家之手，是一部表現中古世紀熱心的最好摘要。從那時起，一切專務內修的人，無論是最單純或具有高度神修工夫的人，都能從中獲取培養信仰熱忱的食糧⁶。

各處為教會災難苦惱的熱忱忠實信友，都呼籲教會要「徹底改革」。這也是大

分裂結束後所選的教宗瑪定五世和恩仁四世（Eugene IV，在位期間 1431～1447）的願望，然而時代的災禍和教會的混亂狀態，都不允許他們實現全部願望，雖然如此，但他們的生活堪為人師表，也任命了優秀的樞機。

土耳其的危機

除了整頓教會以外，教宗念念不忘的就是對土耳其的鬥爭。自十四世紀中葉以來，鄂圖曼土耳其人（Ottoman Turks）就插足歐洲。巴爾幹半島和匈牙利時常輪流遭其襲擊；這些凶猛的回教徒，有如不可抗拒的海潮一樣衝擊西方，整個奉教世界都感到威脅。拜占庭帝國因內戰削弱國力，無力抵抗，君士坦丁堡已陷於四面楚歌之境。

拜占庭面對著這種危機，屢向羅馬求援。教宗恩仁四世想利用此機會使希臘教會再度與羅馬教會合一，於是在佛羅倫斯（Florence）召開會議。希臘神學家及君士坦丁堡皇帝若望八世均出席，經過冗長的辯論後，簽署了一項協議：東方教會的代表承認羅馬主教的領袖地位，統一已在原則上成立，只等東方的裂教一朝結束即成，羅馬也應許派軍增援。

無奈西方新興國家不思共同的危機，只顧各自私利，對君士坦丁堡的命運不感興趣；除自身感受直接威脅的匈牙利及巴爾幹半島以外，所去的援軍微不足道。另

一方面，首長們在佛羅倫斯所接受的合一未能持久；為政理由而簽署的協議，不能吸引拜占庭人民和神職界歸附；君士坦丁堡反羅馬的芥蒂和仇視依然很強烈；羣眾在市街上高呼：「在君士坦丁堡看見回教徒的頭巾，比看見羅馬的三層冠更好。」

他們的願望真的實現了。公元一四五三年，回教教主穆罕默德二世（*Mehmed II*，在位期間 1444～1446, 1451～1481）圍攻君士坦丁堡，經過兩個月的抵抗而淪陷；末位皇帝與創建者同名——君士坦丁堡陣亡；居民被土耳其人殘殺、被擄為奴的成千累萬。君士坦丁堡淪陷的消息震動了歐洲，教友特別沮喪。拜占庭國民雖然裂教，但畢竟還是教友，因此對他們悲慘的命運不能不感傷，尤其對將來感到恐懼。土耳其人對歐洲和羅馬的威脅，已展現眼前。

結論

由於褊狹國家主義的發展而四分五裂的歐洲，君士坦丁堡的悲慘命運能喚醒它嗎？教宗當然希望能如此；但奉教國家響應領袖的號召，同仇敵愾進攻回回的作戰時期已成過去，繼「基督宗教的中古時代」之後而來的，是近代的歐洲。各國固然還有宗教聯繫，但已為不同語言、利益、精神和習俗等所分化而各自獨立。西方民族逐漸成長，中古時期，他們在教宗的領導下接受智慧、道德和宗教教育，現在已

臻成年，正想擺脫他們的監護人而獨立。這個時期的一切領域內，都處於醞釀的階段，也是資本主義產生、科學技術進展的時期。此時歐洲發明了印刷術，航海家正在尋覓新地，文學和藝術也正在古典中尋求模範。君士坦丁堡淪陷（公元一四五三年）的前一年——許多歷史學家都認為那是中古世紀結束的徵兆——誕生了一位英傑，名叫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他對於各種初生的近代科學和藝術無所不通。這可象徵：一個新型的文化要在基督宗教中古時代的廢墟上產生。這個文化將來還是不是基督宗教的，仍是個疑問。

公正的歷史學家常驚嘆基督宗教中古時代是一個盛大的成就，但那只是人的工作，產生於特殊的歷史環境。教會雖誕生於羅馬帝國，也使它基督化，帝國滅亡之後依然生存。因此她雖然是「基督宗教中古時代」的啟發者，在基督宗教的古古時代消失後，她仍要生存下去，她要在世界一切興衰變化中繼續救世事業，繼續散播她由神聖創立者所接受的教訓。然而她已被其經歷的嚴重危機弄得衰弱不堪，是否還有足夠的活力使這新文化基督化呢？她自身必須先加整頓；然而那只得留待日後了！因為她不久就要遭受驚人的騷擾——基督宗教的改革，把她最心愛的肢體切除，使她幾乎變成殘廢！

註釋

- 1 此時亞味農並非法國領土，實為隸屬聖座土地中的一個袋地。該城於一三四八年為教宗克勉六世購買，直至法國大革命時始終為聖座所有。
- 2 這種分裂的性質與東方的分裂完全不同。東方教會與羅馬分裂，是因他們不承認羅馬主教為普世元首；這次西方的分裂，對於承認教宗為元首無問題，問題在於誰是真教宗，即聖伯鐸的合法繼任人。
- 3 歷史學家今日都普遍認為伍朋六世的選舉合法，但教會對此問題從未表示自己的意見。康士坦斯會議固然為第十六次大公會議，但必須注意，它只能在最後開會期間自教宗瑪定五世被選出之後，才成為大公會議。
- 4 百年戰爭中出了一位女豪傑貞德（Joan of Arc），她於一四一二年生於洛林省的農家。當時法國幾乎全被英國及其同路人占領，地方慘遭戰爭蹂躪，法蘭西國王也已喪膽，毫無鬥志。貞德聽見一個神祕的呼聲要她去「拯救祖國」。一四二九年有人引她面見國王，使人認識她的使命。她被派去領導軍隊、鼓舞士氣，起初獲得未預期的戰果，並使人在理姆斯大堂為查理七世（Charles VII，在位期間 1422～1461）加冕為王。可惜不久被俘，交於英人手中；而同情英國的諾爾曼法庭，竟判她為異端且有巫術。她於公元一四三一年在盧昂（Rouen）被焚死，死時抗呼無罪。公元一四五六年教宗出令重閱案件，為貞德

昭雪。她於一九〇九年受封為真福，並於一九二〇年由教宗本篤十五世（Benedict XV，在位期間 1914 ~ 1922）列為聖品。

6

《師主篇》的作者雖沒有確實證據，人多以為是耿稗思（Thomas à Kempis, 1379 ~ 1471）的作品，他是「團體生活兄弟會」的一員，遵守聖奧斯定的會規。

人名中文索引

四畫

- 巴西略一世 Basil I 107
文才 Wenceslas 86
文生·斐瑞 St. Vincent Ferrer 195
文南爵 Venantius Fortunatus 52
文德 St. Bonaventure 115,134,146-147,196
方濟 St. Francis of Assisi 118,123,129,131-135,139,
161-162,175

五畫

- 加奴特大帝 Canute the Great 83
加西安烏斯 John Cassianus 38
加俾額爾 Gabriel 99
匝加 St. Zachary 55
尼閣一世 St. Nicholas I 72,106-107
尼閣二世 Nicholas II 73,76-78
尼閣四世 Nicholas IV 170
本篤 St. Benedict 38-39,51,129
本篤八世 Benedict VIII 111
本篤十二世 Benedict XII 172
本篤十五世 Benedict XV 201

六畫

- 伍拉帝米爾 St. Vladimir 88
伍朋二世 Urban II 152
伍朋五世 Urban V 189-190
伍朋六世 Urban VI 191,200
伏爾泰 Voltaire 66
休格 St. Hughes 75
安生 St. Anselm 145
安博 St. Ambrose 38
安斯卡 Anschar 83
成吉思汗 Genghis Khan 163-165,174
色辣芬 Seraphim 134
艾崩 Ebbon 83
西略 St. Basil 40
西祺門 Sigismund 192

七畫

- 亨利四世 Henry IV 78-80
亨利五世 Henry V 81
亨利六世 Henry VI 138
伯達 St. Bede 44-45
伯爾達 Bertha 32
何諾三世 Honorius III 140

- 佛提烏斯 Photius 93,106-107,111-112
克勉五世 Clement V 171,187-189
克勉六世 Clement VI 195,200
克勉七世 Clement VII 191
克洛維 Clovis 27-28,35,51,54
克勞帝德 Clothide 27,51
克雷二世 Anacletus II 127
利瑪竇 Matteo Ricci 63
君士坦丁大帝 Constantine the Great 37,91
坎特布里聖恩定 St. Augustine of Canterbury 31-33
希道 St. Isidore 44
狄第業 Didier 56
狄奧多里 Theodoric 23,51
狄奧多修 Theodosius 23
狄奧多修二世 Theodosius II 111

八畫

- 良一世 St. Leo I 22-24,46-47
良三世（皇帝） Leo III 102,104-105
良三世（教宗） St. Leo III 58
良六世 Leo VI 112
良九世 St. Leo IX 73,76-77,108
良十三世 Leo XIII 180
良維日德 Leovigild 28-29

- 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51,145-148
亞威洛哀 Averroes 146
亞爾坤 Alcuin 60,65
亞維襯納 Avicenna 146
亞德一世 Adrian I 56,105
亞德二世 Adrian II 85
亞德四世 Adrian IV 137
佳蘭 St. Clare 134
依市瑪耳 Ismael 98
依莎貝拉 Isabella 180
依來納 Irene 105
依納爵 Ignatius of Constantinople 106-107,112
卦爾白 St. John Gualbert 74
和德理 Odoric of Pordenone 172
孟高維諾 John of Montecorvino 170-174
宜仁 Irenaeus 92
帖木兒 Tamerlane 174
拉邦 Raban Sauma 169-170
拉第斯勞 Ladislaus 85
拉德公德 St. Radegunde 51
拔都 Batu 163,166
波哀丟斯 Boethius 51
肯特 Kent 31
阿尼盎 St. Anianus 22,24

- 阿拉利克 Alaric 19,22
阿提拉 Attila 21-23,47
阿爾奴特 Arnold of Cologne 171
阿羅本 Alopen 63

九畫

- 保祿六世 Paul VI 51
哈拉 St. Harald 83
威克利夫 John Wycliffe 193
威廉 William of Rubruquis 166-167,169
思嘉 St. Scholastica 51
思維二世（本名：日爾柏） Sylvester II 72
柏郎嘉賓 Goivanni da Pian del Carpini 164-165
查士丁尼 Justinian 91,94-97,111,135
查理七世 Charles VII 200
查理曼 Charlemagne 14,35,53,56-61,65,67,72-73,84,93,111,
135-136,152
洪貝特 Humbert 108
胡斯 Jan Huss 194
若望八世（君士坦丁堡皇帝） John VIII 197
若望八世（教宗） John VIII 112
若望十一世 John XI 72
若望十二世 John XII 72-73
若望廿二世 John XXII 172

- 若望廿三世 John XXIII 110
若望瑪達 John of Matha 121
若翰（號「無地王」） John Lackland 139
貞德 Joan of Arc 200

十畫

- 哥倫布 Christopher Columbus 103
恩仁三世 Eugene III 128
恩仁四世 Eugene IV 197
格高路維 Gregorovius 192
烏弗拉 Wulfila 20
納定 St. Bernardine of Siene 195
納德 St. Bernard of Clairvaux 123-129,177
紐曼 Newman 44
耿稗思 Thomas à Kempis 201
郝諾拉 St. Honoratus 38
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194
馬可波羅 Marco Polo 168-169,180
馬而谷 Marcos 169
馬黎諾里 John Marignolli 173
高隆 St. Columban 30,33,40

十一畫

- 勒彌爵 St. Remigius 27

- 啟祿 St. Cyril 84-86,88,90
國瑞 St. Gregory of Tours 51
國瑞一世 St. Gregory the Great (Gregory I) 31-32,46.
48-50,53
國瑞二世 Gregory II 34,36,105
國瑞三世 Gregory III 105
國瑞七世 (本名：希爾德勃蘭) St. Gregory VII 73,77-82.
90,113,135,152
國瑞九世 (本名：伍高理諾) Gregory IX 133-134,141
國瑞十一世 Gregory XI 190
國瑞十二世 Gregory XII 192
康士丹五世 Constantius V 105
梅瑟 Moses 101,104
理奧巴 St. Lioba 34,51

十二畫

- 博義 (本名：文弗里) St. Boniface 33-36,50-51,54-55
博義八世 Boniface VIII 119,183-187
博諾 St. Bruno of Cologne 123
喀西約道魯 Cassiodorus 51
喀爾文 Calvin 176,194
喬治 George 171
斐迪南 Ferdinand 180
斐理二世 Philip II 139

- 斯都弟德 St. Théodore Studite 105
腓力 Philip the Fair 184-186,188
腓特烈一世 Frederick Barbarossa 136-137,140
腓特烈二世 Frederick II 136,138,140-142
華爾登 Peter Waldo 175-176
鄂圖大帝 Otto the Great 73
雅伯 St. Albert the Great 115,147
雅格穆來 Jacques Molay 188

十三畫

- 塞魯來 Michel Cerularius 93,106-108
奧刀瑟 Odoacer 23
奧肋婁 Olga 88
奧弟隆 St. Odilon 75
奧拉夫 Olaf 83
奧東 St. Odon 75
奧斯定 St. Augustine 19,24,26,38,201
業樂 St. Jerome 19
矮子丕平 Pepin the Short 55-56
聖博第 St. Patrick 29-30
路易(九世) St. Louis 121,135,142-143,157-158,166
路易七世 Louis VII 127
路啟三世 Lucius III 178
道明 St. Dominic 123,129-131,134-135,139,162

道茂 St. Thomas Aquinas 44,115,146-148,196

達文西 Leonardo da Vinci 199

達瑪森聖若望 St. John Damascene 105

雷孟 St. Raymund of Penyafort 121

雷定三世 Celestine III 138

十四畫

嘉琳 St. Catherine of Siena 190

嘉禮二世 Callistus II 81

瑪定 St. Martin 38

瑪定五世（本名：高勞納） Martin V 192,197,200

瑪特爾 Charles Martel 54-55,102

瑪業 St. Maieul 75

碧岳十一世 Pius XI 109

窩闊臺 Ogodai 163

維奇 Vigilus 96

維理 St. Silverius 96

赫買日德 Hermengild 28

赫蒂徹 Khadijah 99

十五畫

德菲拉 Theophylactus 72

德奧朵拉 Theodora 94,96,105

德範 Stephen 87

- 德範三世 Stephen III 55
撒里答 Sartga 166
樂牧 St. Romuald 74
熱諾維五 Geneviève 22,51
窮漢瓦爾特 Walter the Pennyles 154
魯波郎 Liutprand 54
黎喀得 Recarde 29
歷山二世 Alexander II 73,77
歷山三世 Alexander III 137,175
歷山五世 Alexander V 191
穆罕默德 Muhammed 92,98-102,169
穆罕默德二世 Mehmed II 198

十六畫

- 諾拉斯高 St. Peter Nolasco 121
諾格萊 Nogaret 186
諾納德 St. Raymnd Nonnatus 122
諾博 St. Norbert of Xanten 123
諾森二世 Innocent II 127
諾森三世 Innocent III 130-132,136,138-140,157,177,186
諾森四世 Innocent IV 141,163

十七畫

- 默道 St. Methodius 84-86

戴奧德鄰達 Theodelinda 50

隱士伯鐸 Peter the Hermit 154

十八畫

羅伯特 St. Robert of Molesme 124

麗莎 St. Elisabeth 121,135

人名英文索引

A

- Adrian I 亞德一世 56,105
Adrian II 亞德二世 85
Adrian IV 亞德四世 137
Alaric 阿拉利克 19,22
Alcuin 亞爾坤 60,65
Alexander II 歷山二世 73,77
Alexander III 歷山三世 137,175
Alexander V 歷山五世 191
Alopen 阿羅本 63
Anacletus II 克雷二世 127
Anschar 安斯卡 83
Aristotle 亞里斯多德 51,145-148
Arnold of Cologne 阿爾奴特 171
Attila 阿提拉 21-23,47
Averroes 亞威洛哀 146
Avicenna 亞維襯鈉 146

B

- Basil I 巴西略一世 107
Batu 拔都 163,166
Benedict VIII 本篤八世 111

- Benedict XII 本篤十二世 172
 Benedict XV 本篤十五世 201
 Bertha 伯爾達 32
 Boethius 波哀丟斯 51
 Boniface VIII 博義八世 119,183-187

C

- Charlemagne 查理曼 14,35,53,56-61,65,67,72-73,84,93,111,
 135-136,152
 Callistus II 嘉禮二世 81
 Calvin 喀爾文 176,194
 Canute the Great 加奴特大帝 83
 Cassiodorus 喀西約道魯 51
 Celestine III 雷定三世 138
 Charles Martel 瑪特爾 54-55,102
 Charles VII 查理七世 200
 Christopher Columbus 哥倫布 103
 Clement V 克勉五世 171,187-189
 Clement VI 克勉六世 195,200
 Clement VII 克勉七世 191
 Clothide 克勞帝德 27,51
 Clovis 克洛維 27-28,35,51,54
 Constantine the Great 君士坦丁大帝 37,91
 Constantius V 康士丹五世 105

D

Didier 狄第業 56

E

Ebbon 艾崩 83

Eugene III 恩仁三世 128

Eugene IV 恩仁四世 197

F

Ferdinand 斐迪南 180

Frederick Barbarossa 腓特烈一世 136-137,140

Frederick II 腓特烈二世 136,138,140-142

G

Gabriel 加俾額爾 99

Geneviève 熱諾維五 22,51

Genghis Khan 成吉思汗 163-165,174

George 喬治 171

Goivanni da Pian del Carpini 柏郎嘉賓 164-165

Gregorovius 格高路維 192

Gregory II 國瑞二世 34,36,105

Gregory III 國瑞三世 105

Gregory IX 國瑞九世（本名：伍高理諾） 133-134,141

- Gregory XI 國瑞十一世 190
Gregory XII 國瑞十二世 192

H

- Henry IV 亨利四世 78-80
Henry V 亨利五世 81
Henry VI 亨利六世 138
Hermengild 赫買日德 28
Honorius III 何諾三世 140
Humbert 洪貝特 108

I

- Ignatius of Constantinople 依納爵 106-107,112
Innocent II 諾森二世 127
Innocent III 諾森三世 130-132,136,138-140,157,177,186
Innocent IV 諾森四世 141,163
Irenaeus 宜仁 92
Irene 依來納 105
Isabella 依莎貝拉 180
Ismael 依市瑪耳 98

J

- Jacques Molay 雅格穆來 188
Jan Huss 胡斯 194

- Joan of Arc 貞德 200
John Cassianus 加西安烏斯 38
John Lackland 若翰（號「無地王」） 139
John Marignolli 馬黎諾里 173
John of Matha 若望瑪達 121
John of Montecorvino 孟高維諾 170-174
John VIII 若望八世（君士坦丁堡皇帝） 197
John VIII 若望八世（教宗） 112
John Wycliffe 威克利夫 193
John XI 若望十一世 72
John XII 若望十二世 72-73
John XXII 若望廿二世 172
John XXIII 若望廿三世 110
Justinian 士丁尼 91,94-97,111,135

K

- Kent 肯特 31
Khadijah 赫蒂徹 99

L

- Ladislaus 拉第斯勞 85
Leo III 良三世（皇帝） 102,104-105
Leo VI 良六世 112
Leo XIII 良十三世 180

Leonardo da Vinci 達文西 199

Leovigild 良維日德 28-29

Liutprand 魯波郎 54

Louis VII 路易七世 127

Lucius III 路啟三世 178

M

Marco Polo 馬可波羅 168-169,180

Marcos 馬而谷 169

Martin Luther 馬丁路德 194

Martin V 瑪定五世（本名：高勞納） 192,197,200

Matteo Ricci 利瑪竇 63

Mehmed II 穆罕默德二世 198

Michel Cerularius 塞魯來 93,106-108

Moses 梅瑟 101,104

Muhammed 穆罕默德 92,98-102,169

N

Newman 紐曼 44

Nicholas II 尼閣二世 73,76-78

Nicholas IV 尼閣四世 170

Nogaret 諾格萊 186

O

- Odoacer 奧刀瑟 23
Odoric of Pordenone 和德理 172
Ogodai 窩闊臺 163
Olaf 奧拉夫 83
Olga 奧肋戛 88
Otto the Great 鄂圖大帝 73

P

- Paul VI 保祿六世 51
Pepin the Short 矮子丕平 55-56
Peter the Hermit 隱士伯鐸 154
Peter Waldo 華爾登 175-176
Philip II 斐理二世 139
Philip the Fair 腓力 184-186,188
Photius 佛提烏斯 93,106-107,111-112
Pius XI 碧岳十一世 109

R

- Raban Sauma 拉邦 169-170
Recarde 黎喀得 29

S

- St. Francis of Assisi 方濟 118,123,129,131-135,139,161-162,
175
- Sartga 撒里答 166
- Seraphim 色辣芬 134
- Sigismund 西祺門 192
- St. Albert the Great 雅伯 115,147
- St. Ambrose 安博 38
- St. Anianus 阿尼盎 22,24
- St. Anselm 安生 145
- St. Augustine 奧斯定 19,24,26,38,201
- St. Augustine of Canterbury 坎特布里聖思定 31-33
- St. Basil 西略 40
- St. Bede 伯達 44-45
- St. Benedict 本篤 38-39,51,129
- St. Bernard of Clairvaux 納德 123-129,177
- St. Bernardine of Siene 納定 195
- St. Bonaventure 文德 115,134,146-147,196
- St. Boniface 博義 (本名: 文弗里) 33-36,50-51,54-55
- St. Bruno of Cologne 博諾 123
- St. Catherine of Siena 嘉琳 190
- St. Clare 佳蘭 134
- St. Columban 高隆 30,33,40

- St. Cyril 啟祿 84-86,88,90
- St. Dominic 道明 123,129-131,134-135,139,162
- St. Elisabeth 麗莎 121,135
- St. Gregory of Tours 國瑞 51
- St. Gregory the Great (Gregory I) 國瑞一世 31-32,46,
48-50,53
- St. Gregory VII 國瑞七世 (本名：希爾德勃蘭)
73,77-82,90,113,135,152
- St. Harald 哈拉 83
- St. Honoratus 郝諾拉 38
- St. Hughes 休格 75
- St. Isidore 希道 44
- St. Jerome 業樂 19
- St. John Damascene 達瑪森聖若望 105
- St. John Gualbert 卦爾白 74
- St. Leo I 良一世 22-24,46-47
- St. Leo III 良三世 (教宗) 58
- St. Leo IX 良九世 73,76-77,108
- St. Lioba 理奧巴 34,51
- St. Louis 路易 (九世) 121,135,142-143,157-158,166
- St. Maieul 瑪業 75
- St. Martin 瑪定 38
- St. Methodius 默道 84-86
- St. Nicholas I 尼閣一世 72,106-107

- St. Norbert of Xanten 諾博 123
 St. Odilon 奧弟隆 75
 St. Odon 奧東 75
 St. Patrick 聖博第 29-30
 St. Peter Nolasco 諾拉斯高 121
 St. Radegunde 拉德公德 51
 St. Raymnd Nonnatus 諾納德 122
 St. Raymund of Penyafort 雷孟 121
 St. Remigius 勒彌爵 27
 St. Robert of Molesme 羅伯特 124
 St. Romuald 樂牧 74
 St. Scholastica 思嘉 51
 St. Silverius 維理 96
 St. Théodore Studite 斯都弟德 105
 St. Thomas Aquinas 道茂 44,115,146-148,196
 St. Vincent Ferrer 文生·斐瑞 195
 St. Vladimir 伍拉帝米爾 88
 St. Zachary 匝加 55
 Stephen 德範 87
 Stephen III 德範三世 55
 Sylvester II 思維二世（本名：日爾柏） 72

T

- Tamerlane 帖木兒 174

- Theodelinda 戴奧德鄰達 50
Theodora 德奧朵拉 94,96,105
Theodoric 狄奧多里 23,51
Theodosius 狄奧多修 23
Theodosius II 狄奧多修二世 111
Theophylactus 德菲拉 72
Thomas à Kempis 耿稗思 201

U

- Urban II 伍朋二世 152
Urban V 伍朋五世 189-190
Urban VI 伍朋六世 191,200

V

- Venantius Fortunatus 文南爵 52
Vigilius 維奇 96
Voltaire 伏爾泰 66

W

- Walter the Penniless 窮漢瓦爾特 154
Wenceslas 文才 86
William of Rubruquis 威廉 166-167,169
Wulfila 烏弗拉 20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天主教史：卷二 / 穆啟蒙(Joseph Motte, S.J.)編著；侯景文譯.--
六版.-- 臺北市：光啟文化，2015.9
面：公分
譯自：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Vol.II)
ISBN 978-957-546-821-7(卷 2：平裝)

1.天主教 2.歷史

246.2

104012376

天主教史 卷二

1965年3月初版

2015年9月六版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著者：穆啟蒙(Joseph Motte, S.J.)
譯者：侯景文
出版者：光啟文化事業
地址：台北市(10688)敦化南路一段 233 巷 20 號 A 棟
電話：(02) 2740 2022
傳真：(02) 2740 1314
郵政劃撥：0768999-1 (戶名：光啟文化事業)
發行人：甘國棟
E-mail：kcg@kcg.org.tw
網址：<http://www.kcg.org.tw>
承印者：永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師大路 170 號 3 樓之 3
電話：(02) 2367 3627
定價：260 元

光啟書號 209002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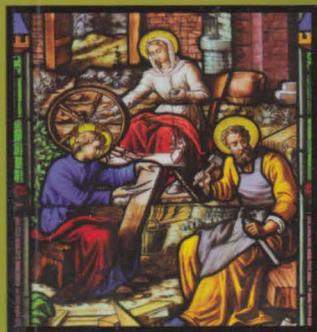
ISBN 978-957-546-821-7

*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

第五世紀時，歐洲的政治和社會都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在日耳曼民族入侵之後，西羅馬帝國正式宣告覆亡，以往統一的文明世界已不復見，但天主教卻成為凝聚歐洲世界的新力量。教會精神滲透了人民的私人生活和公共領域，成為歐洲一致的精神；尤其在文化領域內，教會成了無與倫比的領導者，直到歐洲各國朝民族國家的形態成長，才逐漸脫離了教會的扶持和監護。這種進展直到十五世紀末才完成，並成為近代發展的曙光。

天主教史

/ 卷二 /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SBN 978-957-546-821-7



9 789575 468217

光啓書號 209002b

定價260元

 光啟文化事業
Kuangchi Cultural Group